

圆明园大劫难

伯纳·布立赛 Bernard Brizay

前面的话

为了对几个传教士所遭受的残暴对待予以惩罚，我们以高昂的代价前去中国，但实际上却是为了保护鸦片贩卖和英国殖民者（商人）……奥拉斯·德·维埃尔-卡斯泰尔¹

没有比焚掠圆明园这一胜迹更使人对洋夷恨之入骨的了！吕西安·博达²

中文版序

应浙江古籍出版社之约，谨向中国公众推荐伯纳·布立赛的佳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不胜荣幸和喜悦之至。一部历史著作，只要选题适宜，论述精当，史料准确而翔实，读起来犹如一部小说——本书便是如此——就可谓全面成功。

许多法国人惊讶地发现了我国历史上这不甚光彩的一幕，然而，我们弗洛伊德式的记忆却忙不迭地将它忘掉。

而我本人，对这部力作被译为中文感到高兴，且欣慰地看到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将因此而对1860年以洗劫、焚毁中国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而告终的这一悲惨故事有所了解。对于自己国家历史上这伤心不已的一页，所有中国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段动荡不堪的历史，充满着骚乱与疯狂。

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增强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恶战争这一苦难之源，而这一切于双方都一样。

在此，请允许我引用老子的一段教诲：“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¹ Horace de Viel-Castel，法国当时有名的政论家，反对拿破仑三世及对华“远征”。

² Lucien Bodard (1914.9.1—1998.2.3),法国著名作家，生于中国重庆，父亲曾任副总领事，12岁回国，后成为记者，发表有《柔情中国》《领事先生》《玫瑰谷》《安娜·玛丽》等佳作。

众所周知，我喜欢中国，并乐于前往，我也喜欢中国人，一直很高兴与之面晤。我十分敬重中国哲学家们，尤其是孔夫子的智慧，他曾谆谆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法国能与中国保持互信与友好的新关系，倍感荣幸和自豪。

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

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2005年5月12日于巴黎

中文版献词

中法两国相距遥远，但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令人特别高兴的是，2003年10月至2005年10月，中法历史上第一次互办文化年。这一大规模的双向文化交流，构成世界两大悠久文明之间密切沟通和交相辉映的历史时刻。文化年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中法国界。

去年，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写信给我，并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法文版赠我。今天该书中文版问世，无疑是中法文化年的又一成果。

《1860：圆明园大劫难》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全景式描述19世纪英法联军毁灭这座夏宫的历史著作。该书风格独特，手法细腻，史料翔实，是一部既描绘宏观历史又兼顾微观细节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希拉克总统在写给布立赛先生的信中，对此书“有助于澄清历史而感到欣慰”。我相信，该书中文版的的面世，将使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人类文化瑰宝——圆明园是怎样被大文豪雨果所称的“两个强盗”所焚毁的惨痛历史。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当前，中法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让我们不忘历史，放眼未来，为中法友好的明天而共同努力。

借此机会，谨向布立赛先生，向为中文版问世而奔波辛苦的巴黎《欧洲时报》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向奉献才智的译者——高发明、丽泉和李鸿飞三位先生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中国驻法国大使 赵进军

2005年5月于巴黎

致中国读者：无尽的中国情结

2000年10月，在北京参观了旅游者必到的颐和园之后，我决定乘出租车前往近在咫尺的圆明园。这座早已被西方人摧毁的皇家御苑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10月里一个晴热的日子，到此一游却使我充满了怀旧的忧伤。圆明园几乎一片废墟，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更像一片苍凉的空地。不管怎样，我充满着愁绪。想到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犯下如此大罪，我怒火中烧，握紧了双拳。想到法国人也是罪魁祸首之一，不禁觉得自己也不免有罪。

我当即决定，对人们所说的洗劫圆明园要作更多的了解。于是，我询问了巴黎两家与中国有关的大书店（即“友丰书店”和“凤凰书店”），拥有哪些关于圆明园的书籍。除1987年出版的提及几位法国史学家和建筑师倡议修复圆明园的设想的小册子外，这两家书店无任何与之相关的书刊。既然没有专论圆明园悲惨命运的任何英文、法文书籍，身为记者，而且作为一个曾在索邦大学长期研究历史与艺术的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我何不撰写一部洗劫这座夏宫的专著呢？

我对中国的考察始于1979年，当时有幸加入巴黎吉美博物馆“东方之友”旅行社组织的华夏游。那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年，中国对外国普通游客首次开放，不再像过去那种官方专门邀请的旅行。那年8月，我和夫人经历了4个星期的“发现中国”之旅：北京、大同（云冈石窟）、太原、洛阳（龙门石窟）、西安等，至今仍保留着极为强烈的印象。啊！记得在西安，一个早上，法语导游小姐对我们说：今天咱们将去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我们全团30来号成员，对此竟然毫无反应；这样的考古大发现，当时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团里最内行的卢浮宫博物馆的几位专家，都未听说过。那就去看看这些出土文物吧！一走进那个用以保护兵马俑坑的大棚，我这个考古方面的无名之辈即刻明白，自己面对的是惊人的考古发现。何等之激动！我退到一边哭了起来。我一生中曾有两次因如此激动而流泪，另一次是在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贝勒神庙前面。

这次非同寻常的旅行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有朝一日我会写出完整的游记。自那天起，我的脑海与心思一直留在中国。此前，我通过参观一批藏有中国工艺品的大博物馆，发现了中国艺术。尤其是在美国，1977年，应美国一基金会的邀请，我在半年之内参观了纽约、波士顿、圣路易、丹佛和旧金山等地的许多博物馆。几年后，我再度去中国，游览上海和苏州、无锡、杭州等花园名城；桂林那一次因气候条件恶劣未能去行，但我后来又去了两次。总之，我访华已12次（或许不止此数）。但今后还会再去，因为我远未看够看全。中国实在辽阔，该看的东西确实太多，当然，说这些是老生常谈了。

人家常问我为何热爱中国。我清楚得很，知道答案是什么。因为我在中国感到很舒服，可以说一踏上这块土地，我就如同在家中一样自在。我不会汉语，但能应付自如。我只会“您好，谢谢，干杯”这三个汉语词，并常开玩笑说这足够了！当我跟法国朋友谈及自己的中国情结时，大家都一致赞同，理由也都一样。在我看来，法国人和中国人颇为相像，往往有相同的优点，也有相同的缺点。但在中国人身上我更喜欢的是其非凡的活力，他们很有生活

情趣，活得潇洒，哪怕日常生活中还有困难，他们仍笑口常开，充满好奇心。据曾参加 1860 年对华“远征”的一个法国人当时所言，中国最了不起的，是其人民！我当然喜爱中国的名胜古迹和城市乡村，但更主要的是我热爱其人民是如此多姿多彩，如此民族繁多，如此殷勤而令人喜欢。

对中国的热爱，还让我致力于收集、购买关于中国的各类物品和书籍，如关于艺术、旅游、历史与文学等方面的专著及某些珍本。我个人的书房里收藏了 1200 余种此类书刊。可谓藏书狂，真正着了迷！而拥有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真是其乐无穷。

自《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问世以来，我在巴黎结识了许多中国朋友。他们赞扬我有勇气，把法兰西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写了出来。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坦率地说，我只不过尽了历史学家的一份力，同时尽可能保持客观、精确、严密而已。另一些人也感到诧异，这部主题明确的著作居然长达 600 来页（法文版），又厚又重。

书这么厚，是有原因的。起初，我只想叙述英法联军洗劫和焚烧圆明园。但后来发现，1860 年英法对华“远征”的故事（从筹划到实施的过程），本身就很吸引人，活像一部既有高潮又有悲剧结尾的真正的小说。因此，我就想更细腻地描述这场征战的前前后后。其次，我又为其中各个重要角色的个性所打动，如：英方额尔金勋爵、格兰特将军及巴夏礼领事、吴士礼中校等；法方葛罗特使，蒙托邦将军、柯利诺将军和杜潘上校等；而中方恭亲王和恒祺钦差等。在我看来，这些角色都是不同寻常的知名人士，实像小说中人。再者，查阅外交官、军人、译员和史学家们形形色色的著述及他们的第一手证词又促使我加以大量的引用，使其（在我书中）有更充分的发言权。

现在，得由中国读者来作评判了。不管怎样，我要感谢他们打开这部既与他们本身有关、又涉及他们国家历史的著作——他们有理由因自己的国家而如此自豪。

伯纳·布立赛

2005 年 5 月于巴黎

中文版寄语

法国著名记者、作家和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先生，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大量阅读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文和法文历史书籍后，觉得有些书籍在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有关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内容与观点，同当时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他认为，虽然身为法国人，为了尊重历史，让广大的法国民众能了解当年英法联军是如何洗劫圆明园的，有义务和责任写一本书，还原真实的历史面目。于是，经过多年艰辛，收集整理各种资料，写出了厚达 600 多页的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

《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法国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民间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法国人自己来披露当年

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尊重历史事实，却是进入 21 世纪后法国大多数国民的共识。

我们敬佩布立赛先生尊重历史事实的勇气和敬业精神。在多次交谈中，布立赛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他说，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很感兴趣，他希望能多写几本书，向他的同胞介绍处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世界的发展与和平，需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多交流、多了解，最后达到理解与合作。布立赛先生告诉我们，在完成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后，他又在收集、积累资料，开始撰写关于中国的第二本书。

我们认为，将布立赛先生的这本《1860：圆明园大劫难》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让广大中国读者了解当代法国作家、历史学家是如何反思和评价这段发生在法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历史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00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在纪念这个具有特殊意义日子里，我们如何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珍爱人类、珍爱和平，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正确对待未来。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为人们提供这方面一个新的视角，相信会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

《欧洲时报》虽然是在法国出版的华文日报，读者对象主要是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华侨华人，但是，我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为中法两国人民和文化的交往搭建一座桥梁。我们深信，通过文化交流这个渠道，最能引起不同民族之间的感情共鸣。

《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中文版能准时出版，赶上参加 2005 年 9 月北京国际图书展，首先要十分感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当我们把翻译这本书的设想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的领导沟通时，立即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慨允承担出版任务，并在组稿过程中予以全力配合；我们也感谢三位译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日夜兼程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教授、法国历史专家郑德弟先生，在百忙中校阅了中文稿并作了润色。同时，我们也感谢各方朋友对本书中译本在中国大陆的顺利出版所给予的多方面帮助。

希望《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后，能为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作用。

《欧洲时报》总编辑 梁源法

2005 年 6 月 25 日于巴黎

前言

法兰西第二帝国可谓声名狼藉，拿破仑三世不配进国家伟人祠。法国人民对那个时期并不感兴趣。关于这二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的集体记忆宁愿干脆把它丢开。大家只记得雨果所描绘的“小拿破仑”那副滑稽相。拿破仑三世的

罪过在于，以发动政变起始，又以色当战役惨败和巴黎公社事端而告终。尔后花了半个多世纪，法国的声望才算得以恢复。这足以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成为法兰西最不受爱戴的国家元首，使第二帝国最不为人所了解。

拿破仑三世时代，的确招致诸多不客气的评判，其中既缺乏理解，也没有宽容。提起第二帝国，人们的印象总是连年征战、大发横财、吃喝玩乐。

不论对错，对第二帝国加以谩骂总是容易的，但也有一个历史片段值得从历史陈迹中发掘出来，那就是1860年对中国的“远征”。对帝国的战事，人们主要了解：1854—1855年的克什米亚战争，包括阿尔玛大捷、攻占马拉科夫和围困塞瓦斯托波尔；1859年的意大利战役，包括马让塔和索尔费里诺大捷；1862—1867年间悲惨的墨西哥“远征”，等等。

然而，人们对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冒险情形却知之甚少。

1860年，系法国与英国签订通商条约之年，自由化帝国初露端倪之年。巴黎“恋人乐园”开张，拉比士的剧作《佩里崇先生远游》上演，弗雷德里克·密斯特拉尔发表《米蕾耶》。而瓦格纳和古诺分别为《特里斯坦与伊赛儿》和《浮士德》谱曲。自元旦起，延续至今的巴黎市区新区划（从9个区改设为20个区）正式生效。

假如人们忘记了这次“遥远的征战”（这是当时的称谓），那肯定是因为这一行动结束得“太漂亮”，即军事上大获全胜，且以签订和约作结。事后，胜利被视为轻而易举，加之阵亡人数甚少，给人以一种“军人散步”的印象。然而，大错特错！人们忘记了其中所经历的种种风险与困难，马莱·伊萨克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甚至不提这次“远征”，仅说明法国1858至1860年对华干预，“旨在保护天主教团，维护通商利益”，云云。

而对于这一“远征”的历史意义，一些见证者与学者却有所强调。例如：

*“远征”军事主角之一杜潘上校（原名保罗·瓦兰）：“法国军队进入北京，将是我们时代最奇特的冒险。”

*“远征”官方报告执笔人布隆戴尔将军：“一支小部队，决心坚定，准备赴汤蹈火，朝着陌生的地方挺进……把我们胜利的雄鹰带到远离祖国六千法里之处。”

*外交官拉否例（夏尔·拉沃莱）：“这是一次确实非凡的远征，本世纪无与伦比；而且以不可磨灭的文字写入中国的史册。”

*历史学家恺撒·德·巴赞库尔男爵：“一个伟大的行动就这样完成，将是大事众多的本世纪最惊人的事件之一。”

*“远征”军医疗队长卡斯塔诺医生：“远征虽然冒险，但却带着奇迹的光环和陌生国的声望，故而富有双重吸引力。”

* 内格罗尼中尉：“此次军事之举，大大超过‘金羊毛’神奇之旅和费尔南·科尔泰对墨西哥的远征。”* 《第二帝国史》（1895年出版）作者皮埃尔·德拉戈斯认为，此系“征程遥远、出乎意料的神奇之战……”

* 第二帝国史学家弗勒里伯爵和路易·索诺莱 1928 年曾以抒情笔调描述道：

“人们曾说出征埃及堪称我国历次战争中的传奇故事。而这种称颂，似乎更适合于 1860 年远征中国。的确，还有什么比这小股登陆官兵那几乎难以置信的辉煌历险更动人心魄呢！他们历时近半年，远行六千来法里，来到一个辽阔而神秘的帝国，大胆深入欧洲人从未涉足的地区；他们虽遭遇到多么意想不到的处境，终于来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财富和瑰宝面前，最后伴着鼓乐声步入拥有两百余万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被历史赋予了无数梦想、幻想与幻景的北京！”

* 现代军事史学家雷蒙·布热里和皮埃尔·勒苏夫认为，这是“该世纪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次精心筹划的“远征”，由一小群人物付诸实施，他们无论是陆海官兵还是外交官，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个个“机智勇敢，骁勇善战”。

“远征”中国，历史意义之外，军事方面本身也很引人入胜。但期间发生的违背战争法的英法谈判代表被俘事件，使其在人道方面有其可悲之处，他们遭受的痛苦和酷刑——有的因此而致死——给事件增添了悲惨可怖的色彩。还有一些人，一批法国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因染病在身，未能生还。此次战事，既十分遥远，又极其冒险——甚至到了疯狂的程度——很有可能以悲剧告终，很有可能犯下致命的错误。倘若因厄运降临而惨遭灭顶之灾，那毫无疑问，至今仍会有人谈论它。

可是偏偏走运。本来好多次，命运将导致另一种下场。可以说，除悲惨的“人质”事件外，中国之行“福星高照”，一帆风顺。

到底是“法英联军远征”，还是“英法联军远征”？

在这个问题上，狂热的沙文主义不合时宜。在某些历史教科书或旅行指南中，偶尔有人言及法英联军“远征”中国。其实，这根本不是问题。原因显而易见：千真万确是“英法联军远征”。

理由很充分。英国军队拥有骑兵和大批印度部队，官兵人数 1.2 万名，超过法国军队的 8000 人。整个“远征”期间，无论从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可以说始终是英国人采取主动，虽然蒙托邦将军和葛罗男爵会因此不悦。英国人因长期在当地经营，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在中国沿海设有商行和机构，这对后来的行动十分有利。英国拥有许多海军基地，如直布罗陀、马耳他、开普敦、亚丁、新加坡、锡兰的加勒角，尤其是香港，构成通往中国的必经的中转站。另外，他们还有一批精通中文的翻译人员。如杰出的威妥玛（韦德·托马斯·弗朗西斯）和巴夏礼（帕克斯·哈里·史密斯），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均高出其职务本身。

英国完全可以单枪匹马进行这一“远征”。而法国则不能。即使向中国派遣一支小部队，法国也是既无手段，又无后勤能力去独立完成。

此外，法军指挥，虽说没有完全让英军指挥牵着鼻子走，但在物质条件和精神面貌上均显得略逊一筹。并且随军使节方面也同样如此，葛罗男爵尽管很有素养，但在威望及仪表方面远不如英方代表额尔金勋爵，他不具备额尔金那样的权威和鲜明的个性。毫无疑问，“远征”领导非英方莫属。

蒙托邦将军，虽然因在北京大门口夺得八里桥决胜而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称号，但我们不要因此而产生错觉。无论在物质实力上，还是在兵力上，的确应以格兰特将军为主要军事首领。

因此，的的确确是“英法联军远征”。那么，火烧圆明园的罪责，也都全归英军及额尔金勋爵吧……

为何将矛头指向中国？为何大举远离母国数千海里外的征战？为何有此疯狂之举？直至今日，人们仍然难以理解……

难道仅仅是以自由通商名义而发展诚信良好的交往吗？难道仅仅出于促进天主教团在华传教吗？或者更进一步，难道是出于高尚的意愿，欲使中华帝国享有西方文明“不可估量的益处”吗？

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完全一脉相承。公开承认的目标，就是以武力打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对西方贸易的门户。

这可以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①。第一次鸦片战争，于1839年至1840年由英国策动，是威震四方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查封并销毁2万箱鸦片之后爆发的。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广州和上海成为对外商埠。但是，该条约后来变成一纸空文。于是1856年至1859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第三次鸦片战争，便是1860年的英法联军对华“远征”。

那么，到底为何进行“鸦片战争”这样的冒险征战？

答案骇人听闻，而且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今天比过去更甚。因为答案不可告人！英国使臣，尤其18世纪末马戛尔尼等，访华相继失败，并未使英吉利人打消对华通商的顽念。他们从中国大量购买丝绸、茶叶，还有瓷器等。他们同时还进行“黄奴”买卖，将“黄种人”即中国苦力贩卖到美国加州和古巴、秘鲁等南美国家种植园。可耻的人口贩卖，往往被掩盖……

然而，英国人未能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或印度的产品（如棉布等纺织品）发生兴趣。早期，双方贸易不平衡。中国顺差，国库盈余；而英国金库则不断流失。

因此，英国想方设法，以可能的合法手段或走私偷运方式，向中国倾销数量越来越多的鸦片。鸦片产自印度，特别是孟加拉省一带，专门由那个强大的所谓“东印度公司”从事经营。

的确，鸦片量微价昂，走私带来暴利。两国贸易平衡颠倒过来：英国盈利，中国出现亏空、赤字，钱币流失，结果，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普遍飞涨。

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当朝者愤怒不已。他们看到，不仅国家钱财化为烟雾，而且“洋泥”（鸦片）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尤其国民被这输入的恶习和“神奇迷药”广为残害。法国随军医生阿道尔夫·阿尔芒描绘吸毒后果时写道：“抽鸦片，使人萎靡，冷漠，麻木不仁。精神疲惫影响到胃和消化道，食欲减退，身体消瘦，衰老提前，同时变得萎靡不堪。健康毁，精神垮，钱财空。染上这种恶习，多少智慧、才能和财富统统耗尽。对此，中国人是一清二楚的……”

对于鸦片的严重危害，忠诚的清官（大有人在！）严加谴责。

如 1838 年，江南监察御史袁玉麟向道光皇帝呈递奏折，对鸦片之害发出严重警告。戴遂良神甫在所编著的《历史文献》中曾作过转述，指出“无处不受鸦片交易之害”。袁玉麟在《议开鸦片禁例有妨国计民生折》中，批驳许乃济等人的弛禁论：“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爱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他说，政令应该是划一的，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弁士兵”吸食；因此坚决主张把“走私鸦片列为极刑”。

就连额尔金本人也差不多有过类似的看法。从道义上，完全出于道义，他是当时谴责鸦片贸易的少有人物之一。他指责那些组织鸦片贩卖、大发横财者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说：“这些人带着最自私的目的，践踏着一个最古老的文明，一想到他们，我就感到痛心。”

无论人们是否情愿，哪怕冒着触犯英国人尊严的危险，事实是，19 世纪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应该被视为一个毒品走私国。拉戈斯指出：“在英国商人眼里，巨额收益掩盖着卑鄙无耻的鸦片走私。由于中国人可恶的迷恋，鸦片走私还在日益扩大。”

1839 年至 1860 年（乃至以后），构成整个英中关系的所有争执、战争、谈判与条约，无不以鸦片为根源。而鸦片烟雾之幕，成为两国关系的背景。

第三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焚毁北京圆明园，可以看成是英国强迫中国接受其大规模鸦片走私——最高级别的有组织贩毒！——合法化的最后结果，虽然不是最直接的结果。

据潘尼迦转引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伦敦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证明英国政府一手策划并参与了鸦片走私：

“当我们看到，在东印度公司领土上种植大烟受到严格垄断，鸦片毒品由印度政府大量向市场倾销，目的地非常明确，以至于 1837 年东印度公司理事会公开向该年内驶往中国的商船颁发大奖；当我们看到，议会上下两院各委员

会都十分关心鸦片种植及其给印度带来的丰厚收入，他们深知鸦片的最终目的地，却宣布因收益丰厚故不愿放弃这个巨大财源……更有甚者，当我们看到，内阁成员主持的印度部完全控制着东印度公司，拥有全权阻止任何反对意见时，我们必须承认，把鸦片生意的罪恶仅归咎于有关商人是极不公正的，其实这些烟商的所作所为一直得到最高当局直接和间接的赞同。”

要想迫使中国让步，必须找出合适的理由。倘无正当理由，就得找卑劣的借口。正好 1859 年，在直隶海湾，白河入海口大沽要塞前，英国及法国海军遭兵败之辱。于是，英法联军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既对这次冲突加以报复，也借以强压中国最终向西方利益开放。

英国人和法国人忘记了——而且是有意忘记——这场“远征”以极其卑劣的野蛮行径而告终，用中国人的说法，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劫难”，即洗劫并焚毁圆明园——一座清朝皇帝们最喜欢的夏宫。

1860 年 10 月 7 日和 8 日，法国军队洗劫圆明园；数天后，英国军队烧毁圆明园。这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犯下的无法赎补的罪行。

圆明园堪称世界奇迹之一，它与北京紫禁城和承德避暑山庄一起，共为中国皇家御苑。雨果将它与希腊帕特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和巴黎圣母院相提并论。圆明园于 17、18 世纪由清朝康熙、雍正和乾隆等大帝所兴建，历时 150 多年；占地 350 公顷，包括 200 多座各式建筑，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多为土木结构。

圆明园内还建有“西洋楼”等宫殿及花园，属巴洛克风格，仿普罗密尼、瓜尔蒂尼和比比耶纳等人的作品，系园内的珍奇建筑。“西洋楼”是 1747 年至 1759 年间，按宫廷传教士王致诚、数学家兼天文学家蒋友仁神甫，以及来自米兰的著名画家、建筑师郎世宁等人设计的图纸建造的。这些欧式建筑及花园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整体。人们不禁要惊讶于这一有悖常理的事实：竟然是欧洲人摧毁了中国的欧式宫殿。

圆明园众多建筑群，分布于人工湖泊、河畔及小岛上。周围丘陵环抱，名园胜景散布，运河溪流交错。王致诚称赞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1743 年 11 月 1 日，他在一封长信中对圆明园加以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对 18 世纪在欧洲大兴中华园林之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人往往把圆明园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凡尔赛宫相比拟。其实，圆明园远不止于此。它更为广阔浩大，因有大量皇家宫廷收藏，它的珍宝典籍也更多，尤其是乾隆帝积累下来的庞大而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这座皇宫御苑（兼配有植物园和动物园），亦为博物院和图书馆。

正如在法国出版的《圆明园》一书，作者邱治平所写：“圆明园堪为世界大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料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浩繁，显示出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为文化艺术博物馆。”

不妨大胆打个比方。圆明园之因英法联军之过而毁于一旦，很可能相当于凡尔赛宫加卢浮宫博物院及法国国家图书馆全遭普鲁士军队焚毁。1871年初，法军大败，巴黎被围，若普鲁士人决定那样做的话，必定会是如此！

当时和稍后关于1860年“远征”中国的记载，无论是法文还是英文著述，均为数众多。这些第一手见证录非常宝贵。法国方面，我们查阅到30余部。其中主要有蒙托邦将军的《回忆录》，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还有军人们（巴吕、杜潘、柯利诺、米特雷西、内格罗尼、贝齐亚、布隆戴尔等）的记述，外交官们（凯鲁莱、玛斯等）的记述，军医们（卡斯塔诺、阿尔芒等）的记述，以及一批实录作者（埃里松、吕西、洛图尔、朱雅等）的珍贵记述，另有同时代人巴赞库尔、夏西隆等人的见闻录。

正如洛图尔所写：“由一小撮欧洲人征服亚洲之都的壮举，使得目击者中最超然物外的人都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将它记录下来。”

在英国方面，有关著作约15部。其中有额尔金勋爵的《信札和日记》，诺里斯的《日志》（记录格兰特将军的口述），《军人见证录》（吴士礼、塔洛克、邓恩、芮尼，以及戈登等）、《外交官回忆录》（巴夏礼和罗亨利），领事兼译员郇和以及姆吉牧师的见证录等。这些著述大多为150年前发表，已十分罕见，是我们研究这次“远征”的基础。

对于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对于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

有关中国方面，我们着重参阅由耶稣会士戴遂良神甫20世纪初叶发表的《中国史料集》——著文宝贵，但常被忽视，也偶遭抄袭。

阿兰·佩雷菲特曾就1793年英国特使马夏尔尼赴华之行写了《停滞的帝国》一书，在导言中，他阐述了主导其写作该书的方法或路子：“斯汤达把小说看成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我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通常我只是让他们自己说。”

同样，我们也没有采取其他方法，而是引用了四十来个法英当事者的见闻和著述，他们也都是“埋伏在远征路上的”。我们当代人的判断，只能是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并且不留余地。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

最后，我想说的是，假如这次“远征”根本没有发生，从而使本书失去存在的理由，那该多好啊。

①将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是西方部分历史学家的一种说法和观点。——编者

出版说明

1860年的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和血汗的圆明园。从此，圆明园的废墟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这段历史，尽人皆知，但是很多时候，历史又往往像一团浓滞的雾，只见隐约的轮廓，却不详其具体情形。事实上，火烧圆明园这一事件有很多细节、详情，比如英法在什么样的情形、基于什么样的考虑组成联军，一路上他们做了些什么，到了中国后到底干了些什么，中国老百姓和官府具体是怎样的反应，交战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大部分人还是不甚了了。而本书——布立赛的这本《1860：圆明园大劫难》详尽地讲述了整个过程，从而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细节、详情中有些恰恰是令我们作为中国人感到痛苦的——在英法联军的队伍里有征召的广东苦力，他们同英法侵略军一起抢掠、焚烧，附近的村民也加入了抢掠者的队伍（这在清人笔记里也有颇多记载）；当英法联军攻进城后，百姓的极度贫困，以及麻木的观瞧（这让我们想起鲁迅所说的看客），还有清政府井底之蛙般的自以为是、腐朽……

可是，不管清政府怎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腐朽堕落，都不能成为外国的铁蹄践踏中国领土并肆意抢夺、焚毁圆明园的理由，正如作者布立赛所尖锐质疑的“应该到中国去吗？”，侵略者找尽了种种理由来粉饰掩盖他们的行为，但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为了领土的扩张和鸦片的利益，他们成了不光彩的侵略者，文中频繁出现的“远征”这个词，就是侵略的假面而已！

从一个法国学者的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这一事件的，本书还是有史以来第一部。诚如作者所言，英法联军当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英法国内公众的质疑和抨击，因此这段历史一直是英法联军以及官方所刻意掩盖的。当布立赛以一个热爱和平、珍视人类文化遗产的法国人的良知，比较公正而客观地写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为此深表尊敬和谢意。

当然，作者的叙述和评论，有时仍免不了下意识地站在法国人的角度和立场看待问题，所引用的资料，有时也与事实有所出入，这些都是读者朋友们需要加以鉴别的。此外，也有一些学术观点，如把英法联军的这场侵略战争看成是第三次鸦片战争，而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都需要近代史研究者们展开研究和探讨。

本书法文原著由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布立赛先生在调查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批判了19世纪中叶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故购买了该书中文版权，并将其无偿提供给我社使用。值此本书正式出版之际，我们衷心感谢《欧洲时报》的热情推荐和真诚合作，感谢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译者、校者和提供多方面帮助的新闻

出版总署有关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圆明园管理处有关同志，感谢省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和专家为书稿把关审核，特别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德弟先生，在身体欠佳和时间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为书稿进行了严谨的校审把关，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汪林茂教授等也为我们提供不少帮助，对此，我们深致谢意。

无论历史的车轮碾压过多少沧海桑田，圆明园的废墟始终在那里——它是所有中国人永远的痛，耻辱……但它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永远奋发的塔标。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年8月

总序：相互藐视

法国著名诗人保罗·瓦莱里曾这样吟道：“我们这些文明，如今皆知，都要消亡。”

中国为拥有 5000 多年文明史而自豪。其文明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却是惟一未消失的古文明。苏美尔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就已不复存在；古希腊则在罗马化中归于湮灭；法老埃及在纪元之初也随克娄巴特拉女王和安东尼一同死去；而西罗马帝国已于公元 476 年分崩离析。

只有中国，历经无数的割据与统一，却将文明延续了下来。正如博物学家欧仁·西蒙发自内心的赞叹：“我们这些现代国家，对古人只有旁系继承，不像中国那样直系继承，一代接一代地传袭下来。在中国，世袭现象极为规律而强烈……这正是其最突出的特征，或许也正是其永恒延续之谜的答案。”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以无数发明创造而著称于世，此属老生常谈。中国发明了纸与印刷术、火药及火器、缫丝与纺绸技术、指南针、舵，以及船闸系统，还有其他许多发现。中国艺术，堪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艺术之一。其出土的瑰宝蔚为壮观，而地下神奇之谜远未揭开！

16、17 世纪，中国实为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文明程度，远远超越西欧。18 世纪，大清朝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启蒙时代的欧洲为中国所吸引，对中国很推崇。伏尔泰在《风俗论》中，一开篇就要求读者“关注一个民族，当我们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它早已拥有固定的语言和延续的历史”。伏尔泰和同辈人莱布尼兹一样，崇拜中国，以中国为榜样，极力贬低本国的制度。在他看来，“世人再也设想不出比中国更好的政府”。他眼中的中华帝国，与宗教重压之下裹足不前的欧洲社会迥然不同，讲秩序，重理性，尊法度，倡科举，尤其是君主贤明……

其次，由于荣入宫廷任职的传教士们的记述与描绘，中华帝国已被理想化了。乾隆大帝继承康、雍之志，在位时间甚长，于 1796 年驾崩，其统治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辉煌盛世之一。不过，人们也许会责怪他，负有不愿向外

开放致使中华未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责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19世纪时比如今更为广大，其统治范围远及安南、交趾支那³、暹罗、缅甸和尼泊尔等附庸国。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面积超过整个欧洲，拥有4亿多人口。

中国与西方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的丝绸之路，始于纪元之初，于2世纪直达罗马帝国。尔后，在唐朝，丝绸之路空前鼎盛。13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经远游中国，留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的朝廷中供职。1281年，北京成为元大都，当时的中国对外国人开放。可后来，对西方封闭达200年之久。14世纪初叶，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等，曾在宁波和澳门登陆⁴。随后，欧洲传教士陆续涌向中国。意大利人利玛窦1582年至1610年常驻京城，深得朝廷赏识；17至18世纪的后继者，如南怀仁、王致诚、蒋友仁和郎世宁等，也都如此。

1640年起，中国决意闭关自守，以防止外来侵略，同时也将外国使团拒之门外。外国使者，特别是天主教传教者，往往被视为欧洲经济、政治或军事列强的危险工具。

一边是高山或大漠，一边是大海，把中国与外界隔离开来，中国自己又沿东北至西北领土修筑了代价高昂的浩大防御工程——万里长城。中华帝国自认为独立于世，物产自给自足，一直将邻邦和其他藩国视为应向皇帝效忠的附庸。1793年，乾隆大帝降旨，终止英使马戛尔尼的活动，并在颁给英吉利国王乔治的敕谕中，以羞辱性辞令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⁵故与英夷交换产品丝毫无益，尤其违背中华利益。

1816年，英国使节阿美士德尚未到达天津，嘉庆皇帝就向直隶总督颁下朱谕：“英咭国遣使纳贡来禀所称仰慕中国德威，系外夷表贡常语。其实该国遣使远涉重洋以纳贡为名，恐尚有干求事件。”尔后，嘉庆帝以同样生硬无理言辞致书英吉利国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⁶

阿兰·佩雷菲特从中英两国撞击之中看出两个世界的撞击。可谓“先进社会与传统社会相遇，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 and 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这是自由贸易文明与对抗自由贸易的文明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在历史上独一无二。

巴赞库尔男爵就“远征”中国写下一部重要著作，开头这样写道：“对于我们这些欧洲人，中国仍然神秘莫测。数

³ 1884年，法国侵占整个越南，将其分为交趾支那（今越南南部）、安南（今越南中部）和东京（今越南北部）3个地区，其中交趾支那为法国殖民地，安南和东京为法国保护地。——编者注

⁴ 此处有误，达·伽马的航行只到达印度，16世纪葡萄牙人到达了澳门。——编者注

⁵ 见《乾隆五十八年敕英吉利国王》，引自梁廷《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8-9页，北京文殿阁1935年铅印本。

⁶ 见《嘉庆二十一年敕英吉利国王》，引自梁廷《粤海关志》卷二三，贡舶三，第23-25页，北京文殿阁1935年铅印本。

百年来，其政治、贸易与习俗始终一成不变。西方文明未能达到其遥远的海岸，中国憎恶与洋夷的任何接触，在他们眼里，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是进入他们高墙四围的城中，那对他们不啻是奇耻大辱。

今日中国乃昔日中国。代代相传，毫不纳新。活者对死者一脉相承，仅此而已。对于世纪流逝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谁也不去了解。这个奇特的民族，只沉湎于尊崇、效仿过去，似乎不愿花一天，甚至一小时去学习现在。他们修筑城墙，既抵御外来入侵者，也防止新思想进来；害怕异域蛮族涌入帝国中心，把他们身上不可救药的进步、狂热也带进来。凡中国人，把欧洲商人无不看成冒险家：为了金钱，他们居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祖先长眠之地。由此，他们才对洋夷极度蔑视；由此，对洋夷才有这些不公正而带侮辱性的特别限制措施；由此，才有这种种阻碍与抵抗，清政府欲以此遏制任何外来的贸易。”

17 世纪末，经康熙皇帝恩准同西方通商的惟一口岸是广州，另有附近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再者呢，贸易还必须通过中间代理公司，即十三个官方特许商人组成的行会（史称“公行”）来进行，也只有这十三个商人（行商）有资格与西方商人洽谈生意。而行商因享有特许权，包揽了所有交易。历史学家拉戈斯写道：“中国与欧洲之间来往的‘权宜之计’，多年来便是如此。中国同我们的交往，就像通过检疫站的窗口进行似的。”阿兰·佩雷菲特也同样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

到 1840 年，中国已处于长期衰落之中，但自己却不知道。她继续过着仍属中世纪那样的生活，仿佛长睡不醒似的。她满足于尊崇古制，循规蹈矩。史学家乔治·马斯伯乐认为“帝国没有丝毫的改进和变化”。而明朝当年，出于对先前元朝的反拨，更加重了封闭倾向。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袭用了文明比他们优越得多的中华帝国的传统典章制度。他们闭关锁国，对疆域之外的世事不闻不问，对世界其他国家一无所知。而天子总认为其御座位于全世界中心。如佩雷菲特所言，这“至高无上的模式”，似乎已“僵死在仪轨里，溺毙在自负中”。此外，到 19 世纪上半叶，嘉庆和道光年间，由于沉湎于后宫享乐，皇家世系严重衰退，宫廷权威日趋下降。帝王不主朝事，宫廷勾心斗角，国家衰落加深。反清势力密谋抬头，叛乱此起彼伏。

清朝中央政府的衰弱，并未直接给外国人带来便利。排外戒心依然很重，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仍然是“番鬼”、“野蛮人”，只会搞乱中国的秩序。这种态度，终于给中国带来了危害。史学家雷内·格鲁塞的挚友弗朗索瓦·莱热写道：“中国总想保持自己古老的文明，她做到了。而不幸的是，其古老文明却保护不了她自己。侵犯与抵抗，屈辱与革新，总之‘外来撞击’变得越来越强烈……”

中西两个世界，尚未致力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了解和相互推崇。围绕“叩头”礼，即面见中国皇帝时人人必行的三跪九叩礼所发生的故事，便是例证。18 世纪末，正值法国大革命高潮之际，大不列颠国王派遣特使马戛尔尼勋爵率一重要代表团赴北京。他在圆明园受到接待，对皇家御苑的辉煌壮丽惊叹不已，然而他只见到了正大光明殿周围的建筑。随后，马戛尔尼又来到热河行宫。但他拒行“叩头”礼，坚持只可行鞠躬礼，以及按欧洲宫廷习俗向中华天

子单腿跪拜，到此为止。于是乎，英国使团只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马夏尔尼仆从安德森这样描述他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们的全部经历，可归纳为三句话：来京好比乞丐，居留好比囚徒，走了好比盗贼。”

在中国人看来，对洋夷没有什么平等可言。番使向中国皇帝上贡，须行效忠的“叩头”礼，无任何商量余地。

1816年，对拿破仑的战争终止之后，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又来到圆明园。胜利的英吉利，凭借强大的皇家海军，主宰印度和海上霸权，意欲靠谈判改善英国在广州的存在。阿美士德同样拒绝行“叩头”礼，其使命仍以碰壁而告终。

回国途中，阿美士德路过圣-赫勒拿岛，借机前去隆坞楼拜望囚禁中的拿破仑一世。那是滑铁卢战役后两年。拿破仑得悉英使来访，也深知阿美士德中国之行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伦敦内阁犯了严重错误，竟然不令阿美士德遵从中华帝国礼仪。不然，何必派使前去！据拿破仑的私人医生爱尔兰人奥梅拉在1822年发表的《回忆录》记载，拿破仑曾对他说，在意大利，人们乐于亲吻罗马教皇绣十字的白拖鞋，并不视之为可耻。为证明其观点，他还开玩笑地反过来强调，只要求中国人遵从英吉利宫廷礼仪，显然极不妥当。他一边说，一边做着动作，不禁流露出法国前皇帝粗俗的口吻：“英式习俗，倘若不是亲国王的手，而是亲其屁股，难道得让中国皇帝脱掉裤子不成？”大概是出于谨慎吧，拿破仑并未当着阿美士德的面提及“叩头”礼之事。

故而，英中关系一直僵持在礼仪对抗上，数十年间原地不动。甚至到1859年，在向中国皇帝本人呈递书信并被要求行“叩头”礼时，美国公使华若翰也强烈抗议，声称美利坚是共和制国家云云。他还声称，即使在本国总统面前，他也绝不跪拜，只有在“上帝和女性面前”，才肯屈下双膝！好自负的回答，史册上有记载……只不过，华若翰也被礼貌地撵回了他登陆的北塘。

如此礼仪问题，表面上无足轻重，但充分说明，双方的高傲同样极端和过分，以致不可调和。英帝国要求平等相待，毫不怀疑自己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而中国人所知道的英吉利，不过是一个23万平方公里、仅有800万人口的小岩岛而已……

中国1848年出的一本世界地理教材，倒把不列颠王国描述得较为恰当：“英吉利，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岛，何以突然变得富有而强大呢？“其骤至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⁷

纵观整个19世纪西方列强与中华帝国的关系史，人们会惊异于这种误会的根深蒂固。对此，马斯伯乐这样评述说：“中国天子自比君王之主，各番邦首领在他面前，均系臣属，不仅言谈举止，而且行文辞令，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仪规定。其次，他深信对番夷已无比仁慈，已给予他们甚为重要的特权。”皇上虽然承认西方“蛮夷”在海上占有优势，但他自信在陆地上能迅速使其听从摆布。

⁷ 见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七，英吉利国，第21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

而英吉利人（以及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和美利坚人），则相信自己拥有绝对优势：军事优势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思想意识上的优势，即白种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优势。中国人称他们为“蛮夷”，他们感到好笑。他们满脑子殖民思想，有些人的身上还表现得特别强烈，不可一世。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举止何其可耻、可恶！他们同中国人打交道，光凭威胁、大棒政策和诉诸武力。如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就因对华人的残暴而臭名昭著。

甚至像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那样深思熟虑的人，在与中国当局交往中也主张采取强硬方式。额尔金勋爵呢，对西方人向中国人施加暴力，他表示遗憾；对打着贸易自由神圣之名而向中国输出越来越多的鸦片，他也感到愤慨。这样的人，实属个案。然而不幸得很，正是这个额尔金下令火烧了圆明园！

中国的当政者，也深信其数千年文明及文化的优势，他们自认是天底下惟一的文明。由于对现代世界的变化知之甚少，他们的思想依然停留在这点上：确信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和天下主宰。他们蔑视西方人，将本国的众多祸患归罪于洋夷，他们不需要西方肆意强加的产品与技术。北京的朝廷梦想保持一个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帝国，因为凡是外来的，都是有害的、致命的。其实，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不受干扰地过自己的安生日子。

中国人反抗西方侵略，可谓悲怆悲壮。莱热认为：“为了击退蛮夷进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且不脱离万有天朝的梦想，古老中国不惜倾尽全力，但却显得软弱无力，实为可悲、可钦、可叹。”清廷及其官员有时在压力下被迫屈服，他们就玩弄以拖待变、出尔反尔、消极抵抗等种种手腕，加以敷衍逃避。而对已签之约，不经事先通知中止，即弃置不予履行。在他们看来，所谓承诺，仅对愿意信守承诺的人起作用而已。

在西方人眼里，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只能加重他们的罪状，可又拿不出更严厉的言辞回击他们的欺诈。欧洲人觉得，中国人言而无信，尽人皆知。于是他们便从中寻找借口和时机，以便步步紧逼，抛出更加强硬的要求。中国当政者稍有抗拒，便被视为挑衅，进而被视为蔑视王权，更甚而至于被视为“宣战”。任何挑衅都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惩罚，所以戏只能以悲剧收场。

工业革命并未波及比欧洲落后百年的中国。此时，处于蓬勃发展、实力强大又十分傲慢的欧洲，已经前来敲击中国的大门。的确，对于垂涎三尺胃口极大的洋夷，中国实系诱人而易于捕获的猎物。历来，天朝令人向往，而这一次，中国所吸引的，不再限于那些勇敢的传教士和前来发财的单个商贾，而是西方更众多的商人、实业家、银行家以及军人、海员等；他们深受英吉利强大的鼓舞，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至于鸦片贩子们，因得伦敦撑腰，更是无孔不入。

鸦片，虽念兹在兹，却从未公开提起。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叙述的马戛尔尼使华，其目的就是说服大清帝国与英通商。而在他接到的御令中，当然从未言及鸦片之事。所以，他不提及此事，但对鸦片走私的重要性，他不会不知。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严重财政困难。它进口大量中国茶叶，但反过来，未能向对方卖出一产品。如乾隆帝谕旨所称，中国不需任何东西。然而，鸦片除外！印度鸦片！几十年来，鸦片走私已渐成气候。18世纪80年代，鸦片走私发展飞快。后来，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就能自由、合法地输出鸦片，就无需进行走私了！

凡外交官失败之处，鸦片贩子都得以成功。偷偷而奸诈地得手！佩雷菲特写道：“外交官们曾试图打开中国的正门，可一无所成。鸦片走私贩子，则从后院进入，从内部把门户全部打开。”与惯有说法相反，吸食鸦片在中国并非一直存在，过去有少量使用，但仅限于药物。吸鸦片，完全是由英国走私犯创造或发明出来，并强加给中国人及当政者的一种恶习。

在鸦片贩子中，有两个人最臭名昭著，即查顿和马地臣。他们可为鸦片战争的策动者。

查顿（William Jardine 1784—1843）生于苏格兰，早年为英国货船外科医师，1822年在印度孟买成为鸦片走私贩子，后久住广州。1832年与马地臣合伙创办“怡和洋行”（Jardine & Matheson），成为鸦片大王，拥有香港湾80艘快帆船中的四分之一，压过有13艘船的大对手“颠地洋行”。在中国沿海进行大量鸦片走私，大发横财，回乡购置土地，兴建豪华古堡。因在一次斗殴中头部被重击却未受损，故中国人送他混名“铁头老鼠”。1830年起鼓动英对华干预，系鸦片战争策划者。英外交大臣拉塞尔曾写道：“威廉·查顿，眼见商船从印度运往中国的毒品和暴利买卖遭受中华帝国一位大忠臣的威胁，便凭借其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对远东掌握的所有情报，竭力怂恿英国政府进行对华征战。”世界上两个最大的鸦片走私贩子，大发横财，成为超级巨富。1841年，查顿当选英议会下院议员；两年后在其豪华古堡病逝。应验英国迷信说法，凡鸦片走私暴发户终将不得好死。其后代于1973年在香港修建“查顿大厦”，1984年离港迁居贝尔穆德斯，1995年退出香港交易所。

马地臣（James William Matheson 1796—1887）生于苏格兰，初在印度加尔各答助其叔父经商。1818年到广州，与查顿合伙进行鸦片走私。二人开办怡和洋行，变本加厉。林则徐禁烟时将其驱逐出境。1847年也当选议员，与压力集团一起推动1860年对华“远征”。1882年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准男爵，5年后选为皇家学会成员。花巨款购置苏格兰一小岛，兴建豪华古堡。死在芒东，无嗣。

而颠地也是大鸦片走私贩子。1807年东印度公司代理巴林创办“大卫荪洋行”，他曾为骨干，后借机在广州开设“宝顺洋行”，拥有最大的快艇“水妖”号等，与“怡和洋行”的“红海盗”号等竞争。林则徐禁烟时也将他列入查拿的鸦片“渠魁”之一。

向中国走私输出鸦片大获成效！终于抵消了中国正常的茶叶出口。这正是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甚至远不止此！19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中国的茶叶出口平稳增长，鸦片进口却爆炸性扩张。

可是，这带来双重恶劣后果。鸦片摧毁了中国吸毒者的身躯，同时破坏了国家社会的基础。一监察御史上奏道：民若吸上鸦片，夫不顾妻室，主不管仆，师不为生所敬。另有某亲王力劝皇帝：圣上对此若听之任之，国将无兵保江山社稷，也无钱发饷。又如湖广总督林则徐上疏痛陈鸦片之害：“若尤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其次，银两滚滚流出中国，以偿付腐蚀社稷的毒品！据史学家爱德加·霍尔特的说法，1833年，中国对外贸易首次入超。当年中国对英贸易逆差为两百多万英镑。鸦片占中方进口额的四分之三。朝廷翰林院贤士警告：国家每

年为日益增加的烟民流出白银上千万两。

佩雷菲特写得更尖锐：“鸦片以双重危害的恶性循环而摧毁中国。总之，鸦片加速清帝国衰退，腐朽没落。”

1834年，在未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人施压下，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权。印度史学家潘尼迦写道：“中国南方新来了一大批半为商人、半为冒险家的英国人。他们国民性中的狂妄自大，使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不想让步，而且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常驻印支代表马斯伯乐指出，英议会的决定在远东乃至整个世界揭开了“新的时代”。事实上，这个决定使英国政府赤膊上阵，正式开始与中国对抗。政府向广州派驻商务总监，这位律劳卑爵士，后来因行事愚鲁莽撞，最终被两广总督赶走。

对拿破仑的战争取胜后，英吉利似乎成了潘尼迦所说的“世界巨人”，当时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国家否认英国在政治、经济和金融乃至精神上的霸权地位。1815年至1848年，英国在东方以惟一强国的面目出现。工业革命使其大大领先于各个竞争对手，并在海上占有全面优势。

大不列颠以胜利者和主宰者自居，不再忍受中国对其商人强加的侮辱性限制。英国人认为，经济自由化是与神圣权利相同的法理。一些国家政府关闭商品自由流通，是反自然的，非道德的。如潘尼迦所言，他们甚至妄称，“打开中国通商门户，哪怕要诉诸武力，也是有利于和平、进步和文明的”。律劳卑（名字意为“臭包工头”）致帕麦斯顿首相的信件，充分暴露了此人的狂妄倨傲，他根本拒绝了解中方的观点，还深信英国没有什么事做得不妥；居然还问心无愧！

英国商人，尤其是那个在广州的洋行寡头查顿，以“自由独立，不受限制经商”的捍卫者自居。他竟口吐狂言：“我们的生意及利润，英国和印度全都受益，决不能轻易受人任意摆布。只须在该城边上停泊几艘军舰，发射几发炮弹，便可解决问题。”

竞争使鸦片价格下降，需求扩大，销售猛增。从此，广州五十多家洋行竞相走私鸦片。葡萄牙人和一些私商也加入进去。这是“买办者”的黄金时代，中间商获得暴利。中方“叛逆商”们也广为效仿。1800年以来，朝廷一再下令禁绝鸦片走私，但由于官吏腐败，屡禁不止。

1839年4月，钦差大臣林则徐，禀承皇帝谕旨在广州查禁鸦片。他从停泊在港口的洋商船上查获了20,282箱鸦片（每箱20公斤，值2500法郎，总计5000多万法郎）。道光帝降旨就地销毁鸦片，百姓及各国商人观看。6月3日虎门销烟，戴遂良神甫这样写道：“为大造声势，震慑走私，林则徐选择海滩一明显之处，围以栅栏，将全部查获鸦片运去，倒进深坑池子，浸泡盐卤水中，再浇掺石灰，即沸腾，鸦片随之燃烧，后于落潮时冲入海中。”

巴赞库尔称颂林则徐是一位“勇敢而坚定的人物”；潘尼迦认为林则徐的“廉正、节操和精忠报国，不容置疑”。他以禁烟打击了英国贸易利益核心。英人视其犯下十恶不赦的危害贸易罪！当时，英远东商务代表皇家海军上尉义律，与60多家商人乘船逃往澳门，后来逃到香港，竟然要中方赔偿销毁鸦片的损失。在他们看来，清朝当局不能碰

鸦片生意，总之不能以这种方式处置……当年，鸦片销售占印度政府收入的 1/6，而英对华贸易为其本土上预算的十分之一。

翌年 1 月，林则徐曾给年仅 20 岁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据说女王从未收悉。函中写道：“……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鸦片、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并闻来粤之船，皆经颁给条约，有不许携带禁物之语，是贵国王之政令本属严明，只因商船众多，前此或未加察。……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有敢再种造鸦片者，重治其罪，此真兴利除害之大仁政，天所佑而神所福，延年寿，长子孙，必在此举矣。”⁸

鸦片之患导致战争。道光皇帝降旨，立即停止英夷贸易。勒令停泊当仓库的欧洲船只全部开走。驻广州英商面临私贩鸦片被判处决的境地。而在伦敦，议会中拥有 40 名议员的东方贸易压力集团大为恼怒。实际上，该集团由贩毒大王、显赫的香港“怡和洋行”所主导。

1840 年 4 月 7 日，在英国下议院，一位尊敬的议员先生大放厥词。此君大名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是英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于是，1840 年 4 月，斯当东以政治和道义、信誉为代价使下议院采取了支持对华开战的立场。此公大言不惭：“我们进行鸦片贸易违反国际法了吗？没有。既然广东巡抚用自己的船贩卖大烟，那么谁也不应对洋人做同样的事表示异议。”针对中方威胁要处死贩烟英商，他叫嚷道：“要当心！我们一旦在华失去尊重，不久将在印度，甚至一个接一个，在全球失去尊重。正在酝酿之中的战争，是世界性之战。战争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因战争结果的不同而截然相反。我们无权放弃战争。尽管有所遗憾，但我仍然觉得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势在必行。”话音未落，全场报以劈劈啪啪的掌声。

出于维护英国贸易安全考虑，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也提议，“先痛打一下中国，然后再作解释”。

然而，当时也响起一个勇敢的声音，反对向中华帝国开战，这完全出于道义。在野党中，托利党年轻激进议员威廉·格拉斯通坚决反战，因为他反对鸦片贸易。他愤怒地声讨这一丑恶行径：“就其根源而言，如此非正义的战争，策划得如此精心却要使国家永久蒙羞的战争，在整个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不列颠国旗在广州上空骄傲地飘扬，居然只为保护卑鄙的走私而升起。”

经过 3 天的辩论，英下议院以 5 票的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帕麦斯顿赢得支持。虽然对鸦片之事只字未提，但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军 40 来艘战舰，载着从孟加拉调来的 4000 余士兵，掠过广州未停，直接北上，开往扼守天津的要塞大沽。伦敦当局向北京朝廷提出要求，其中有赔偿鸦片损失，开放新的口岸，签订海关协议等。清朝皇帝装着让步，最终什么协议都未能达成。于是，广州、厦门和上海，相继被英军占领。1842 年春，英军舰队夺取舟山群岛，直上长江口，兵临南京城，切断北京物资供应线。

⁸ 见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第 384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同年8月29日，皇帝陛下的代表耆英等与取代义律任商务监督的璞鼎查将军，在南京签署《南京条约》。此系欧中外交关系史上第一阶段。《南京条约》条款十分苛刻。其中包括：向英国（也向美欧商界）开放4个新通商口岸，即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英商关税优惠；英有权设领事馆等。

更主要的是，该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这符合“怡和洋行”的愿望。香港作为世界最佳天然良港之一，从此成为英国在华存在的主要支点。此外，还要为1839年销毁的鸦片赔偿白银1500万两。说的正是鸦片！这就等于说，鸦片与其他产品没有什么两样。鸦片走私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合法化。另外，垄断与西方人交易的官许“公行”被解散。

中华长城突破口打开了。按1844年所签的《望厦条约》，美国也同样得益，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据此，中国应给予愿意与其贸易的所有国家最惠国待遇。而美国政府为表诚意，则承诺禁止鸦片走私。

法国不甘落后。自路易十四以来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官方使团，由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刺萼尼率领，以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名义，于1844年与钦差大臣耆英签署了《黄埔条约》，性质和英美所签之约相似。法国人进而获得在通商各口岸自由传教之权。而且，后附有“弛禁”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

《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条，对于法国天主教团甚为重要。如明确规定：“凡佛郎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郎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另外，“倘有中国人将佛郎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被称为首批不平等条约。在尔后的70多年间，这些条约使中国主权逐渐削弱，以致整个国家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这一名为“瓜分”的过程，确立了西方各列强的影响。潘尼迦愤慨地将此看成历史奇耻大辱：“他们何以利用条约‘把龙缚住’，并掩盖其对中国资源的大肆掠夺。汉唐明清泱泱帝国，何以沦落到如此软弱无力之地步，以致欧罗巴诸国可以从容不迫地将其辽阔的领土分割为一个个‘势力范围’，随意霸占飘扬着其国旗的土地。这段历史简直是绝无仅有！”

《南京条约》及另外两个条约，莱热称之为“极不公道之约”。他认为，这在中国一代代人意识中播下了复仇的种子，使他们从屈辱激起的愤恨中汲取力量。更为严重的是，在中国有识之士眼里，“西方在物质、技术、知识乃至思想上带来的真正进步，将可能被其可鄙的干涉所玷污，被19世纪中叶最强的欧洲国家首次公然干预中国事务并强加不人道、伤害至深的鸦片走私这一事实所玷污”。

因此，这是西方打开中国门户的重要一段。1853年，拉否例在《两个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战争，至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肯定算为19世纪最令人不忘的行动之一。一个人口达3万万之众的民族，被一小撮欧罗巴人打败，亚洲最大的帝国向西方贸易与文明开放，这便是现代史上占有独

⁹ 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特地位的这场斗争之结果。”莱热补充道：“西方三大主角在华的表现各具特点，并长期保持了各自的特点：英吉利坚决维护并扩大对华贸易，美利坚以慈善的色彩掩盖它的惟利是图，而法兰西则关注保护天主教团。”

直至今刻，几乎互不相识的两个世界，于是开始学习了解对方。远东从此进入欧洲外交和经济着眼点之中。而中华帝国被迫打开一直小心戒备的门户，并走出闭关锁国的状态。马斯伯乐指出：“于是乎，中国不再掌握自己的命运。”几乎天天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关系行将确立。英、美、法三国政府深信，困难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以为，中华帝国明白自身软弱和“蛮夷”文明的强大，一定会遵守所签的条约。马斯伯乐指出：“他们这样想，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国人的心思。”的确，后来发现，清朝皇帝对这些条约仅部分得知，而特命全权代表并不具备使政府履行承诺的真正实权，他们只是希望，只待洋人战舰一开走，一切便不再提起。

1851年，19岁的新帝咸丰登基，继承在位30年的皇父道光。据说，他体虚智弱，且生活放荡；至少欧洲人对他是如此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位国君，要对付西方列强一而再、再而三提出的种种要求。咸丰帝对屈从英夷利益痛心疾首，励志重整基业，复兴大清王朝。他憎恶与欧洲有关的一切，决不再作退让。他即位后采取的举动之一，就是处治商签《南京条约》的穆彰阿、耆英和牛鉴等要臣。他以朱笔宣示穆彰阿、耆英之罪，曰：“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负皇考付托之重欤？……”皇上指责他们接纳西夷主张，欺瞒先帝，罪该重罚，“贻害国家，厥罪维钧”。穆彰阿“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耆英“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¹⁰

自1850年起，外来压力继续增强。英国人利欲熏心，一再得寸进尺，迫不急待地要攫取新的特权。在广州，他们已受不了只在代理行里经商。西方人感到，修改条约已成必然。他们要中国对通商和航运等更加开放，给予他们外交官常驻京城的权利；而且，天朝何不也向西方各国派驻代表呢！

中国人对此充耳不闻。英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对《南京条约》不像欧洲人那样重视。戴遂良神甫写道：“对于中国人，那不过是解决所谓对外与周边问题的一点小小的损失，所以无关紧要，也几乎毫无约束力。相反，对欧洲人则不然，鉴于对外通商和国际扩张均建立在这类文件之上，故《南京条约》代表着第一个决定性的进展。”神甫甚至断言：《南京条约》的谈判内容和条款提法，根本未送呈北京朝廷。他甚至说这是一个“假条约”，签约者无非是一些“挡箭牌”，他们指望欧洲炮舰一旦开走，条约便无任何意义。

清廷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武器——敷衍外交。对清政府而言，敷衍即外交题中应有之意。他们以种种借口，尽量设法阻碍通商。古伯察神甫以撰写赴蒙古、中国传教记而著称，他曾这样写道：“连最没有洞察力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政府的做法旨在使欧洲人失去兴趣，最后与他们断绝往来。”

此外，欧洲人仍像过去那样受到粗暴对待，基督教徒遭受迫害。对西方人提出的抗议，清政府置若罔闻。蛮夷诉苦，不值一提……

¹⁰ 见《清史列传》第十册，第3169-3170页，第317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尽管如此，鸦片走私仍年年有增无减，25年间翻了3倍。由1830年1.68万箱增至1840年的4万箱，到1855年超过6.5万箱，直至1870年高达8.3万箱。鸦片从印度输入，大部分由英国船只运来，主要通过香港两大公司，即“怡和洋行”和“颠地洋行”。英属印度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对华鸦片输出，属当时单一产品最大宗的买卖。

不过在初期，西方的威胁尚未对大清国构成主要祸患。而主要祸患在国内，就是那“可怕的”太平天国起义，系中国当时经历政治社会危机的表现。

1851年至1864年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运动，险些把清王朝卷走。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首领、拜上帝会创始人洪秀全，戴遂良神甫这样描绘道：“洪秀全出生在广州附近一个穷苦人家，自幼好学，两次科举未中。后去广州结识一些欧罗巴人，接受耶稣教影响，自创教派，到处布道，传授《圣经》，自诩‘天父次子，耶稣之弟’！举起反清大旗，要推翻满人王朝。他认为，大清皇帝已经失去‘天命’，无力维护中国根本利益，抵挡不住洋人入侵和鸦片泛滥……”

洪秀全自金田揭竿而起，率领太平军从广西打到广东，两年内攻下长江中下游地区，1853年定都南京，在江南建立起一个与清朝分庭抗礼的天国。太平天国运动持续14年，波及16个省六百多个城市，堪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

对这场差点推翻清朝的大起义所带来的不安宁局面，西方人已有所意识。其次，这也威胁着他们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在上海。英国人在决定要对因内战而削弱的清朝开战时，是否想到，因为清朝被迫分兵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种混乱局势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成功呢？1859年秋，不论有无太平天国运动，英法两国决定联合派兵“远征”中国。

对英法联军来说，问题在于：是与宣称基督教徒和现代派的太平军和解呢，还是要消灭他们？是与被大起义严重削弱的清帝国打交道更好呢，还是甘冒前途莫测的种种风险（包括贸易风险）而为推翻清朝助一臂之力？

最终的反常现象何其出乎意料：赴华向清政府开战的英法联军，却调转矛头攻打决意推翻清朝的太平军！不过，太平军的威胁，以及联军担心他们进攻上海的阴影，一直笼罩着1860年的这场“远征”。

第01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马赖神甫事件

厦门检查船舶

包令态度强硬

烧毁商行
英国政府倒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炮轰广州
英内阁再次倒台
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被任命为全权特使
额尔金镇压印度起义
广州陷落
叶名琛被俘
4月1日最后通牒
夺取大沽炮台
《天津条约》签订
互致敬意
对中国诚意打问号

两个事件导致了西方对华的双重干预，即法国马赖神甫之死和挂英国旗的“亚罗”号船被搜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的条约，理论上使中国既对西方贸易开放，也对基督教开放。而1844年由刺萼尼特使与中方签署的《黄埔条约》，已使法国成为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的官方保护者。传教士享有自由布道的权利。可是，这阻止不了某些清朝地方官吏为信教自由设置障碍，并继续迫害传教士。

1856年2月，马赖神甫在广西西林被杀，激起法兰西舆论强烈反应。即使马赖神甫被指控为非法传教，这一事件仍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因为他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同一时期，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在北京东面的直隶和其他地区也相继发生。

在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竭力使西方人日子难过。他自己清楚，若不对西方番夷保持距离，就会很快被革职。按弗朗索瓦·莱热的描述，叶名琛“对外界一无所知，对与之对抗的军力毫无概念，不去调查了解。他总以为高傲加拖延足以使欧洲人罢手。当英美法方面觉得条约的某些条款务须修改，并就此与其交涉时，叶总督仅回复不予受理。”

在此背景下，另一事件又带来新的对抗。1856年10月8日，叶总督下令搜捕挂着英国旗的中国商船“亚罗”号。地方当局指控该船犯有海盗行为，无权悬挂英国旗（因为当局认为该船挂英国旗的期限已满）。中国当局此举是有道理的！于是，船上水手全被捆绑送到官方舰艇上，英国旗也被降下、撕毁。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当场强烈抗议，要求向英方道歉。征得英国全权代表兼香港总督包令的完全赞

同，巴夏礼与海军上将西马糜认为只有采取强制手段，才能迫使中方补偿对英国国旗的羞辱。

拉否例就此指出，将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小题大做，当成可笑的借口，这便是英国人称之为“亚罗之战”和 1857 年—1858 年“远征”中国（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出发点。

10 月 23 日，奉包令总督之令，西马糜率军炮轰广州，冲入城内。叶名琛发表公告，揭露英夷伺机寻衅，欲取羊城的企图。11 月，英军摧毁许多中国人的帆船，攻占了数座炮台。

12 月，民众受当局鼓动群起反英，涌进洋行，放火烧之。洋行约有 13 家，位于同一条街上，包括办事处、住宅等。骚动威胁着外国人的安全。香港出现恐慌，澳门粮食奇缺。“俱乐部大楼”图书馆和印刷《中华百科》的厂房被捣毁。作为报复，英军也烧毁了城郊四五百家店铺和民宅。起初，法国保持中立，待时机成熟时再站在英国一边。在巴黎，马赖神甫遇害引起愤慨；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伯爵致函法国驻广州代表处秘书顾随，强调：“马赖先生之死给皇帝政府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故我政府有义务要求光彩的补偿。”

英国则打算利用这种愤慨情绪，拉法国同征中国。12 月底，海军大臣阿穆兰上将向法国驻中国海军司令里戈上将发出命令，要他准备北上，驶入通向离北京不远的天津的白河。而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则接到指示拟与清朝政府重开谈判，争取协商签订新的条约。总之，法国海军和外交官均受命与英国同行配合行动。

关于英法两国在华的共同利益，史学家高第这样概括道：“务须让西方列强进入中华帝国的北方口岸和首都。马夏尔尼那时的岁月已经远去，如今法英两国要与天子本人，而不是地方代表，要在朝廷宫中，而不是在总督府等衙门，继续商谈已从帝国南部或中部重镇开始的关系。法英双方由克里米亚战争结成的共同利益，使这两个列强策划对中华帝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外交上、军事上找个干预借口，难道不是易如反掌吗？”

然而在伦敦，包令因“亚罗”号事件作出的强烈反应，则被看成太过分；他对中国大肆报复，毫不顾忌后果。就连包令的好友、自由贸易鼓吹者里查德·科布登也转而反对他。而本来势不两立的格莱斯顿和狄士累利则联合斥责包令。经过 4 昼夜辩论，英国下议院投票通过惩戒案，赞成和平，保守派和自由派混合在一起。帕麦斯顿勋爵不愿辞职，他建议女王解散议会，呼吁采用全国公决。这可是一个极端而罕见的举动。就这样，中国事务导致了英国政府倒台。

可是 1857 年 4 月，全民公决支持帕麦斯顿，自由派获胜。正如包令预言：“对华宣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英国政府对清政府的“指控”，在高第的统计下，有三十多项。——这的确可以为对华采取强烈行动而“辩护”。

詹姆斯，这位第八代额尔金勋爵、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被任命为新驻华全权使节，取代包令，负责进行新的谈判。布尔布隆竭力安抚他的英国同行包令的自尊心，因为他还不知道同样的命运在等着他：法国任命葛罗男爵取代他出任与额尔金平级的驻华全权特使。

印度北部大起义使英对华行动推迟。额尔金路过新加坡时，便得知驻印总督请他派出所拥有的全部兵力前去增援，以对付印度土著军队的起义。6月底，额尔金抵达香港，随即赶赴加尔各答。他亲率所有援军，把派往中国的部队开向印度。这些援军“拯救”了英属印度：勒克瑙得救，新德里被攻占，莫卧儿帝国灭亡。

8月10日，额尔金返回香港。10月中旬，葛罗男爵抵华。英法使节和海军将领面晤会商。双方达成一致，决定先在华南猛攻猛打，然后向北展开外交攻势。

英国人继续封锁广州城，击毁珠江上的帆船。美国公使列威廉和俄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等静观广东事态发展，暂时保持中立；后来他们都参与了英法的交涉。据高第的说法，很明显，美国人尽量起中立或调解人的作用，以便“不放一枪，分文不花”获得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利益。而普提雅廷上将认为，攻打广东无济于事，就算拿下广东，中国皇帝也不会让步。依他之见，惟一办法就是夺取天津，直逼北京。后来的事态证实了俄国公使的见解很有预见性。

可英法联军坚持攻打广州，深信惟有强硬手段才能迫使钦差大臣叶名琛就范。额尔金与军事首领西马糜上将和范斯特劳本茨将军商议，两将声称有把握拿下广州，但对久占该城有所保留。葛罗男爵则去征询里戈海军上将的意见。12月10日，叶名琛被告知广州已被封锁。公告要求百姓慎加躲藏。与此同时，葛罗致函叶名琛，就马赖神甫被杀提出赔偿，并要求遵守《黄埔条约》，但他只得到不值一提的答复。对额尔金亦如此，中方不理睬相关警告。

于是，（联军）勒令广州投降。1857年12月28日清晨，总攻发起。一支5500人的精锐部队（法军900人）迅即登陆，直逼城下，安营扎寨。炮声隆隆，两天不停。叶名琛总督府被摧毁。29日上午，攻越城墙；下午2点，战斗结束。广州城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攻陷了。联军15人战死（法方2人），130人受伤（法方30人）。

1858年元旦，英法联军进驻广州城，俘获了叶名琛，并得到了一批档案和价值5000皮阿斯特¹¹的珍宝。叶名琛被视为“挑起战端的祸首”，他试图乔装改扮逃命，但路上被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认出，起初被押到一艘英国船上。但他对自身命运似乎已完全置之度外，整天只管画画写字，漂亮的手书为英军爱好者争抢。他只问是否将被处死，不过仍很关注别人对他是否尊重。英国人感到，他待在广东海上

¹¹皮阿斯特，法国钱币，1皮阿斯特相当于当时的150法郎。

碍事，必须让他离开，却又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叶名琛被英军押往加尔各答，两年后死去。

夺取广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广东巡抚柏贵（英国人很快给他起了“匹克威克”的外号）降英，取代叶名琛进驻广州。额尔金仍摆出好战架势，要挟中方赔偿。葛罗稍有节制，希望把广州事件与北京的事情分开。1858年2月4日，广州封锁解除。葛罗感到其使命的第一部分已在广州完结，接下来要与北京宫廷谈判，四国全权代表决定3月底聚会上海。

这期间，要求赔偿战争费用和马赖神甫家属的公函已递交北京清政府。函中还有涉及将来的让步条款，如：

- 各外国政府有权在北京派驻代表；
- 向欧洲开放通商口岸；
- 欧洲人有权持护照在中华帝国游历并直接购买商品；
- 修改税则；
- 信仰自由。

答复限期为4月1日。葛罗男爵要海军上将里戈把“一支重要海军部队”供他支配。在上海，他住进法国领事敏提尼之处，由秘书贝莱库和孔塔德子爵陪同。

由于答复限期已过，额尔金、普提雅廷和列威廉便离沪北上，开往直隶湾。葛罗男爵不久也随之前往。20日，法国公使去舰上拜望额尔金勋爵，并向他提出联军下一步应采取的方案，即：除非最后的对话尝试获得成功，否则就封锁大运河与白河，攻夺沿途炮台，占领天津，然后在天津或北京进行谈判。对于这些建议，额尔金完全赞同。

4月25日，里戈海军上将与葛罗男爵在直隶湾会合。上将带来了2艘驱逐舰、4艘小护卫舰、1艘通信舰和4只炮艇。关于那一带环境的荒凉及设防情况，高第这样描述道：白河入海口一片苍凉。在狭窄低平的河岸上掩蔽着5座炮台，2座在左岸，3座在右岸，由壕沟和土墙联接，架着多门大炮。大沽村坐落在河南岸的一个沼泽湖中，渔家和船夫房舍散布，一片贫穷凄惨景象。

一个月过去了，四国使节与中国当局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毫无成果。5月18日，英法两公使和两上将决定攻夺大沽炮台，并向天津推进。2天后，见警告无效，便向炮台开火，几乎不战而夺。不过，一座火药库爆炸，造成法军突击队很大伤亡（4个军官、数名水手死去）。联军人马迅即登陆，中国防守官兵落荒而逃。英法军旗飘扬在城墙上，缴获150多门大炮。联军炮舰沿河而上，直至天津，未遇抵抗。数天后，5月29日，英法全权公使同时来到，住进一处寺庙。开往天津的联军兵力达到五千余

人。北京朝廷专派钦差大臣桂良大学士前来议和。谈判总算展开了，最后与英、法、俄、美签订了《天津条约》。

但是，与英方的谈判极为困难。额尔金不顾一切，硬要中方准许英国商人可自由往来于通商口岸之外的地方。他还要求应允英国公使常驻北京，而且要住在紫禁城附近。在京城常设外国使团，一直被清朝政府视为不可思议、难以接受的要求。额尔金如此要求，也是想以此抵制已使他有所担心的俄国的影响。葛罗男爵不赞同英方的要求，认为太过分，甚至危险。

1858年6月26日晚，英国提出的包括56项条款的和约在天津签订。西方列强取得了20年来一直想要的一切。其中第三项条款给予英公使驻京权。尽管朝廷迟疑不决，但长江仍对西方贸易开放。10个新口岸对外通商（原《南京条约》已开放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除外）。英、法还获准在天津设租界地。同时，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在中方赔偿损失200万两白银并另行赔付200万两战争费用后，英军将撤离广州。

法国所拟的条约原本也应在6月26日签署，而且应在英中条约签署前的下午1点钟签字。但据葛罗男爵说，“中方文本当时未能就绪！负责译写的文人宁肯沉醉于天天抽鸦片，也不愿去管似乎有辱他们的物质利益”。

这样，法中条约推到6月27日才签署。条约共有42项条款（在高第著作中占整整18页），与英中条约并无多大差异。其中，天主教宗教活动自由得到确认，尤其是传教士到中国内地居住得到许可。另有条款规定，杀害马赖神甫的知县革职不用。向法国赔偿战争费用和1856年12月在广州被烧抢机构的损失，共计200万两白银。6月17日和18日，列威廉先生和普提雅廷海军上将已代表其各自政府与中方签定了条约¹²。

葛罗男爵在向巴黎报告这一消息时不禁满意地说道：“今天，我高兴地宣布：中国终于向一切文明的真正源泉——基督教开放了，也向西方各国贸易和工业开放了。”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又是一个新的侮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是咸丰皇帝被迫接受的。的确，在中国皇帝看来，鉴于他只承认进贡国和附属国，因此，任何条约，从定义本身说便是侮辱性的。为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中国人允诺在外交文件中放弃以“蛮夷”指西方国家的提法。西方观念所珍视的本质平等因此而得以恢复。

但《天津条约》需要正式批准，批准手续应于第二年在北京完成。戴遂良神甫评述说，英法联军以为“已在人们心中埋下害怕他们武器的阴影”。欧洲人心满意足，且很自信，“获得承诺，相继离开”。额尔金先去日本，再到中国南方参观，后返回广州。1859年5月回到欧洲。他本以为从此不会再来中

¹² 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日期是6月13日，中美《天津条约》签订的日期是6月18日。——编者注

国了。途经锡兰，他见到了已被任命为驻华公使的弟弟普鲁斯和取代西马糜的贺布海军上将。而葛罗男爵则在北京郊游，观赏了万里长城，然后也前去日本。1858年10月9日，他在东京与日方签署了两国第一个《和平、友谊与通商条约》。翌年3月，他经上海回国。

可不久，看来中方官员根本无意履行已签的条约。英法联军撤离天津不到1个月，朝廷在《京报》发表公告说明中方对事件的看法，显示皇帝鄙视那些打败中国的人，而且不重视强加于他的条约。公告中可以读到，对竟敢开战舰来津的蛮夷，“吾朝钦差严加痛斥，勒令他们滚开”。显然，咸丰帝竭力阻止《天津条约》生效。

高第认为，《天津条约》签字者们获得的直接成果固然有“可喜之处”，但是“若看不到英方条约包含着新的严重困难的苗头，则是缺乏远见的”。7月3日，葛罗男爵在给外交大臣的信中写道，用额尔金的话来说，清朝钦差大臣是在“枪顶着脖子”的情况下被迫同意英方所有要求，接受开放长江口岸，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另外，英国商人可到中国内地各地区做生意。

人们的确会问，英国人是否太苛刻？他们想要的太多、也太快，可能有损于未来。史学家拉戈斯指出，英法联军，尤其是额尔金，尽管对中国外交奥秘有所领教，但仍然不懂得“与中国人打交道，难点不在签订条约，而在于要保证其付诸实施”。

第 02 章 “六二五”惨败

大沽炮台前

海军上将贺布过于自信

攻打大沽

“六二五”惨败

贺布上将和特里科司令负伤

责任全在贺布

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同受盘问

僧格林沁大胜

导致第三次鸦片战争

现在的问题是要批准额尔金和葛罗与中方在天津所签的条约，双方批准文书的换文时间商定为一

年。

1859年6月2日，由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分别接替额尔金和葛罗）率领的英法代表团相继抵达香港。两使节各受本国政府委托，将在北京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中方条约签字者之一、钦差大臣桂良，已得到他们将抵达天津的通报。

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先到上海，收到桂良“敷衍推诿”的答复。钦差大臣避而不提去年所作的承诺，显然是想把两使节留在上海。两使节决定不见桂良；并且毫不延误，一同上路，直去北方。其实，他们有意要在天津而不是在别处，交换条约批准文本，然后进驻北京。

布尔布隆充满自信。6月14日，他致函外交部说：“从此毫无疑问，我们的北京之行将和平而无阻地完成……”

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军舰队跟随普鲁斯和布尔布隆两使节开入直隶湾，经大沽炮台前，打算沿白河直抵天津。美国公使华若翰也跟随前来，仅带了2艘船，作为观察员。

问题出现了。中国当局建议英法舰只停泊在荒凉的北塘附近海岸，有关代表取陆路去天津和北京。在普鲁斯等英国人看来，这不能接受。怎么？英法这样的西方两大列强只应从“偏门”进入吗？他们这不就像是来向皇帝朝贡的！

于是，普鲁斯要求沿白河直去天津。中国人表示反对，不愿联军船只经过大沽炮台。而且，清政府不同意英使由众多军队护送进京。普鲁斯征得布尔布隆赞同，认为中方的拒绝已使任何外交行动中止。因而，双方处于战争状态。

贺布上将6月7日来到当地，观察沿河堤坝，发现控制白河的大沽炮台设防明显加强。在回答布尔布隆的担心时，贺布认为，强行通过炮台确有难度，但又自信地保证必定成功。故而，英法双方都仍然相信，一切都如同去年那样轻而易举。

事实上，贺布低估了中方新防卫的有效性。现在的驻防与一年前截然不同。设防已按“欧式”重建，配有内堡，工事加高，架设水平射击大炮，交叉火力可对河纵射。此外，入河处布置了三排尖利的铁桩、拒马和桩基防栅等，以阻止通行。总之，由清廷统帅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新近设置的众多障碍物，实在令人生畏。另外，据一些传教士提供的情报，去年守卫大沽炮台的清兵已全部换防，现由骁勇善战的鞑靼¹³官兵把守。

¹³ 鞑靼一词如今仅在欧洲使用，包括汉族中国人以外的中国北部各民族，主要指满族人和蒙古人。——编者注

见证人夏西隆男爵认为，“攻打整个这套防御工事，要有强大的手段才行”。再说，贺布已作的侦察未能摸清有多少炮眼，事后才发现炮眼全用草席掩蔽，那里藏着粗口径的大炮，皆为英俄制造。联军舰队几乎完全由英国战船组成。英军派出 16 艘战舰，其中有 2 艘驱逐舰、3 艘护卫舰、9 艘炮舰和两艘联络舰。这些战舰除水手之外，还运送 1500 登陆士兵。而法军只有 1 艘蒸汽护卫舰“杜舍拉”号，悬挂法国旗，由一艘刚从美国人那里购买的小舰“诺萨加赖”号相随，可沿河直上天津。交趾舰队和里戈上将能供法国赴华使团调遣的便是这些。

6 月 21 日，普鲁斯征得布尔布隆认同，把联军作战事务交由贺布上将指挥；贺布下令强行打开白河通道，扫除沿河障碍物，直开天津。在联军眼里，这不过是个形式而已。看来，他们非冒必败之险不可。

24 日到次日早上，三处障碍一律扫平，中方没有丝毫动静，英法联军以为白河可以通行。两艘炮舰于是先行，中方仍无反应。但是，突然之间，联军舰队处于密集火力轰击之下，炮火来自大沽要塞，而此前那儿一直静悄悄的。贺布站在“普拉弗”号旗舰上，按“皇家海军”传统，在枪林弹雨之下视死如归。当时，他也许想到当年英勇阵亡的纳尔逊上将。1805 年 10 月 21 日特拉法加战役中，纳将军高喊着“谢天谢地，我尽了职”之后倒下。

据芮尼医生转引一位目击者的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普拉弗”号 2 点半向前开进，贺布上将站在舵手舱顶，法军中校特里科在他对面。3 时许，他臀部受重伤，白色军裤染满鲜血。舰长脑袋中弹横飞，8 个士兵被打死，22 人受重伤。甲板上，场面更可怕，水手几乎全被击毙。战船失控，偏航飘走。贺布转移到另一艘炮舰“负鼠”号上。他始终靠在主桅边上站着，头部受伤；可桅杆塌下，将他摔倒在甲板上，好几根肋骨折断，后被抬到“鸬鹚”号上。贺布只得终止指挥。参战炮艇大部分失去了战斗力。局势更加危急。

美国海军统帅达底拿，尽管因中立地位不参战，但获悉贺布上将受伤，即决定前去救助。他叹道：“血浓于水。当白种人在自己眼皮底下遭杀害，我若袖手旁观、见死不救，那岂不下地狱！”在水上遭遇 3 个多小时中国守军炮火之后，联军决定从陆路继续攻打中国炮台。此时已近傍晚，大海退潮露出了一片宽阔的泥泞地。在夏西隆看来，“正是在这里，一场新的灾难又将降临在联军头上了”。

英皇家海军一支小分队和法军一批海军陆战队员由特里科率领登陆，试图去夺取左岸的炮台。特里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表现出众，是一位刚强的军官。尽管这次他带的登陆队力量过弱，仅有 86 个士兵，却坚持要去夺取炮台。

对这次拼命的行动，杜潘上校这样写道：“负责强攻行动的法国驱逐舰中校特里科冲在前头，士兵紧跟其后，冒着一阵炮弹，进入炮台壕沟。官兵全都筋疲力尽，气喘吁吁，而且陷在齐腰深的淤泥里。于是，只得放弃跨越壕沟，竭尽全力坚守着已经夺得的阵地。但是，在如此艰难条件下，他们实在顶不住了，必须尽快撤退。”凌晨一点，幸好几艘船赶来，接走了幸存者。

巴赞库尔男爵指出，这次“勇敢而徒劳的行动”，灾难性结果是严重的。6月25日，正好是索尔费里诺战役的第二天，参加强攻大沽炮台的英军有1500人。结果464人伤亡，其中8个军官被打死，28人受伤，4艘炮舰被击毁。法军方面，大部分军官都受了伤，包括勇敢的指挥官特里科左臂被子弹打穿，6人被打死。

英法联军撤退到上海，进行反思……提出不少疑问。夏西隆这样概括说：“贺布上将军事上做得对吗？他对大沽炮台的侦察是否足够全面？行动将结束时的登陆是否恰当？”既然英国公使普鲁斯拥有全权，那么单单由贺布上将承担责任显然不公平。

布尔布隆则派使团一等秘书米歇尔·克莱兹科夫斯基伯爵回巴黎，负责向政府解释有关情况。而普鲁斯也遣密使回伦敦。两人于7月14日乘船启程。

1859年5月，在香港交谈时，普鲁斯曾向布尔布隆阐明他们同往大沽炮台所要采取的行动方案。他说道：“无须掩饰，以我们在白河口的威慑力量，比我们到了天津要强大得多，因为在天津我们仅有几艘炮舰和少量部队；不过在天津还是比在北京强，因为我们只能携带完全和平的器具抵京。因此，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对此我们要有所预料——我主张宁肯预先解决它（甚至诱发它），这样，在实施我们建议之前，我们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可清楚地看到普鲁斯当时的思想状态和他攻打大沽炮台的决心。

事件发生后，6月30日，布尔布隆从上海向国内发去一封辩解性的长信，强调若因横在英法联军路上的障碍物而停止行动，那只能增强清朝政府使已签的条约无效的决心。而普鲁斯和他本人均受本国政府指示，要把国书呈递到中国皇帝手中，并在北京设立外交使团。

布尔布隆鉴于法军力量较弱，能给英军提供的救援较少，因此认为在此事件只起“咨询作用”。他解释说自己完全信赖贺布上将的保证，因为贺布作为“军事问题惟一评判者”，坚信能扫除障碍。

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忘记提及5月25日那天上午9点钟，即发起攻击前几小时，一条小船给他们送来了直隶总督恒福的信件，告知总督已到北塘（大沽北侧不远处一个小港），正在等候桂良大学士抵达，还说他奉命在那里接见英法使节，然后陪同前去京城。大概此信到得迟了一点，因为10时许，攻打大沽炮台的决定已经作出。

尽管如此，夏西隆男爵身为见证者，揭露“普鲁斯先生所采取的粗暴而冒险的策略，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偏见，而且得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特别顺从的支持”。他认为，两公使墨守国内指示，缺乏判断力和灵活性。他们“在白河上仅仅 1 天之内，竟然将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以充分毅力和随机应变、花 18 个月才出色完成的事业毁于一旦”。

夏西隆斩钉截铁地指出：自 1859 年 6 月 25 日起，1858 年 6 月 27 日在天津所签的条约已不复存在。

在巴黎，布尔布隆的态度遭到广泛批评。人们指责他只与英国公使和海军上将协商，未能听取特里科舰长的意见。海军大臣阿穆兰上将向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伯爵表明惊讶之情。布尔布隆为何把维护法国利益的权力交到英军上将手中，忽视法军也在当地？阿穆兰对此甚感遗憾。华勒夫斯基也致函布尔布隆，转达政府的意见，认为他“未能以必要的小心谨慎行事”。外交大臣认为一切手段用尽都无济于事，方可诉诸武力。

高第在所著的《1857—1858 远征中国》一书中，严厉谴责普鲁斯与贺布的态度：“须得承认，英国人行事极不谨慎，过于匆忙，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他们必须取道大沽，而不是北塘前往北京。普鲁斯实在固执己见……”在后来写的另一本书《中国通史》之中，高第进一步阐明他的看法：“要是贺布不那么骄傲自满，普鲁斯不那么顽固不化，布尔布隆不那么软弱无能，联军舰队，尤其对此事件应负责任的英国人，便可免遭这样侮辱性的惨败。”

尽管如此，联军发现，靠了他们，中国人学会了打仗，而且在当时情况下已显示出出人意料的军事才能。蛮夷首次丢尽脸面，清朝当局悬挂彩旗庆祝。僧格林沁得胜，成为民族英雄。

从这一倒霉的事件中，巴赞库尔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大失败。这次失败于一天之中，一小时之中，毁掉了联军在这遥远海岸的光荣声望，毁掉了作为这一声望首要基础的士气影响。这次失败既把过去的所有成果全都抹去，又摧毁了体面得来的《天津条约》，同时也是对英法旗帜和两公使的莫大侮辱。若加以巧妙利用，一项如此的战功必然会带来重大的胜利……无须掩饰，必须与英国并肩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一场应当使用更加强有力行动手段的战争。”

1859 年 6 月 25 日事件之后，英法两国又将发动新的对华战争。这一次，根源并非是借口——如“亚罗”号被搜查，而是联军真正的军事失败，伦敦和巴黎都称此失败为“流血冲突”。因而，中国人大沽要塞保卫战的胜利，才是英法“远征”中国的第三次鸦片战争的根源。

第 03 章 尽职召唤

蒙托邦将军“应召”
柯利诺准将期待第三颗星
埃里松欣喜
葛罗作出的牺牲
洛图尔为幸免平庸而得意
格兰特将军相信“吉兆”
额尔金远不满意
巴夏礼对没有被忽视而高兴
“可敬的”姆吉神甫
踏上尽职之路

“1859年11月份，当我在鲁昂指挥第二管区时接到陆军大臣朗东元帅办公室主任里布上校的来信，问若有人提议我担任拟议中的对华远征司令将作何答复。我当即回复接受，但很想知道在何种条件下进行指挥。过了两天，陆军大臣发来电报，指示我马上前去贡比涅宫晋见皇上。24小时之后，皇帝陛下接见了。”这是库赞·蒙托邦将军，后来的“八里桥伯爵”，在其《回忆录》（至1932年才发表）中，叙述他如何出任1860年“远征”中国法军总指挥的。

在另一著作《二十四天的陆军部》（1871年出版）中，蒙托邦叙述被征询任职时的惊异心情。他承认说：“我曾隐隐约约从报上听说过这一远征。但我必须说，此举在我看来是如此奇异，以致不大相信它会实现。”

* * *

1859年10月 巴黎

“将由蒙托邦将军统率的中国远征筹备完毕。据听到的传闻，我可能被宣布为一个旅的指挥。如果是那样，我将把如何进行这次远征的愿望公之于众。”

1859年11月16日 巴黎

“陆军大臣朗东元帅通知我，本人已被任命为赴华军队指挥。能让皇帝看中，实属三生有幸。其实须得承认，将领中积极响应去冒险者为数不多……”

这次远征在军队中引起很大轰动。对所有不怕危险和痛苦、希望晋升和获得十字勋章的军人，这

是大好机会。可以说，这股赴华激情，这种好胜心，实为好兆头，使我高兴不已。

至于我本人，我要去谋求第三颗星。出发赴华之时，我感到浑身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像是坐牢五年快窒息时，牢门一下大开那样的感觉。这是我生命又开始的新一页。待这一页结束，我才可以考虑好好休息，回忆所经历的事件和命运把我推到何种程度。

记得我把前去中国的想法告诉朋友之时，他们差不多都以为我丧失了理智。有的惊讶地说道：‘到中国去，您发疯了不是！您在巴黎多安稳，前途无量，怎么想把这些都扔下，而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冒险。起码等人家下了命令再说嘛。’

以勇猛闻名的准将、马拉科夫战役的战斗英雄柯利诺，自告奋勇前往中国，他并不掩饰个人的雄心：带回少将军衔。可惜后来他在那里牺牲了，并不知道自已赢得了第三颗星。他一直忠于其座右铭：‘哪里需要哪里去’。”

夏尔·库赞—蒙托邦（Charles Cousin-Montauban 1796—1878，也译作孟斗班、蒙他板、孟托邦），生于军人世家，父亲让·安托万·库赞为军官，母亲阿戴拉伊德是洛奈少将之女。

早年毕业于索缪骑兵学校和军事参谋技术学校，曾在北非法军服役多年，参加过许多战役，十次受到表彰。1841年7月8日谢里夫战役中军功卓著，但胸部留下枪伤。后任北非骑兵第二团上校，正是他迫使阿尔及利亚埃米尔第一次投降，这使他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1844年获准在姓名后加上祖先姓氏蒙托邦。1851年晋升准将，1855年底出任奥兰军区司令，1857年奉调回国，先后在里摩日、图尔和鲁昂军区任职。当他在诺曼底首府任第二师师长时被选为对华“远征”军司令官。后执掌里昂大军区。1862年元月拿破仑三世加封他为“八里桥伯爵”。1870年普法战争中帝国面临倾覆之险时，他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大臣24天，直至9月4日帝国垮台，之后流亡比利时。1873年1月赴伦敦出席拿破仑三世葬礼。1878年在凡尔赛去世。

据纪实作者描写，蒙托邦“四方脸庞，蓄心形小胡子，仪表堂堂，带有贵族气质”。巴赞库尔赞扬他是“刚毅的将领，无畏的战士”；杜潘认为这个北非老兵“思想少有的细腻，举止分外的平易”。格兰特称他为“英俊勇猛的军人”，而有的史学家却指责他是联军征战中“傲慢的碍事者”。

* * *

我在兵站已经7个月了，期待第二天下达任命。正在这时，一名负责军邮的下级军官递给我一封信，令我惊讶不已。信中这样写道：先生，部里刚刚下达决定，拟派您随本官前去中国，作为私人秘书兼通译。接到此信，请去您的上校处告假8天；凭信中所嘱，给您放假。您当天去巴黎。然后，到吕布

饭店来找我。您一报到，身份即合法化。

顺致

敬意！

蒙托邦将军

就这样，年轻人莫里斯·伊里松（后来封为埃里松伯爵），当时仅为驻亚平宁山一个骑兵团的普通战士（那时意大利战争即将结束），奉蒙托邦将军之命，调来身边任秘书兼译员，并负责协调与英军司令的关系。

伊里松（即后文埃里松）后来成为《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的作者，他欣慰地写道：“我对旅行情有独钟，接受命令准备赴华！七个月中，在花名册上仅有一个登记号，突然间一下子被一位少将以‘先生’相待！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可谓梦一般美妙！我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高兴，为我的将军感到高兴，为生命感到高兴。”

莫里斯·伊里松 (Maurice Irisson, Comte d'Herisson 1840—1898) 原为驻意大利的法军第六轻骑兵团普通骑兵，活泼，机智。经佩利西埃元帅和弗勒里将军的推荐，被选调任蒙托邦将军私人秘书和译员，并负责与英军的联系。他在对华战争中，详细记录了蒙托邦将军的言行和军事部署，回国后着手写作，发表《当代中国研究》一书。1870年，埃里松调到巴黎总督特罗叙将军身边任职；1871年任（国防政府成员）朱尔·法夫尔的助理。1867年，据塞纳省民事法院判决，莫里斯·伊里松和弟弟乔治恢复了祖宗原有的“埃里松伯爵”的姓氏。而据高第解释，这一贵族称号其实是伊里松先生们从多菲内地区一户埃里松贵族人家的末代传人手中买来的。

1886年，埃里松推出《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这是一部为蒙托邦歌功颂德的著作，同时带有反英倾向；但其中对圆明园的描写十分精彩，常为后人所引用。阅读该书须提防其某些偏见和不公正之处。

该书还被几位美国学者译成英文，因为这些美国人感兴趣于1860年与1900年之间的比较。埃里松还发表过一些历史普及读物。1898年死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

* * *

“皇上离开时拉着我的双手，深情地向我致谢，对我说道，五十人中无一个会接受如此牺牲”。另

一方面，葛罗男爵被迫再次接任赴华全权使节之后，皇上将他托付给英国大使额尔金……

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1793—1870），法国著名外交家。早年接受贵族教育，关注远东事务。30岁时进入外交界。1829年出色完成赴埃及使命，查理十世授予其男爵称号。后相继在墨西哥、波哥大和玻利维亚及伦敦任职。1850年担任全权公使，赴希腊等地肩负微妙使命。1957年5月作为拿破仑三世派往中国的全权代表，和英使额尔金一起与清朝钦差大臣桂良议订《天津条约》（1858年6月），回国后被拿破仑三世指定为参议员。1860年3月7日拿破仑三世委派他为特使再度参与对华战争。他仍与额尔金联手，逼迫清政府签署《北京条约》。1862年，出任驻英国大使。著有《黄皮书日记》一书。

“皇上很想让我加入这场将于北京结束的军事和外交远征之中，并委托我从事某些研究。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切更能使我满足了，因为此行将使我超越我们的小天地和孤陋寡闻的局限。”埃斯凯拉克·德·洛图尔伯爵为摆脱平庸环境的前景而欣喜，然而，他应该为参加了“远征”而深感遗憾……

* * *

“鉴于我们1859年攻打白河炮台遭到的惨败，英国政府决定派兵远征中国，以要求执行1958年6月27日由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与中方）所签订的《天津条约》条款。法国也同样坚决派军队和我们并肩作战。

（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恩准英军总司令剑桥公爵殿下的提名，很高兴任命我为远征司令，授少将军衔。这种恩宠本人甚为珍视，之前从未直接或间接有过这样的奢求。”

在其所著的《1860年对华战争相关事件》一书中，霍普·格兰特将军正是以这样很正式的语言，记述他如何被授予少将军衔和出任“远征”中国总指挥的情形的。

詹姆斯·霍普·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 1808—1875，也译作克灵顿），出身于苏格兰望族，曾在爱丁堡和瑞士上学，喜欢音乐，善操大提琴；1825年在一个枪骑兵团开始军事生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来华，参加攻占镇江等战役；据说，因陪上司拉琴，受赏识而获晋升。1858年镇压印度起义有功，获巴斯勋位“大十字架”勋章。1860年出任英对华“远征”军司令，执行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命令。

这个苏格兰人惟一的读物是《圣经》，一副粗野的军人模样。瘦高个，背略驼，杏眼，薄唇，脸部很有特征；部下说他的样子“活像瘦高挑老太婆”。蒙托邦认为，“他人很正直，有时也很勇敢，但并无多大军事才能，完全对额尔金惟命是从”。但也有人不同意蒙托邦的看法，认为格兰特竭力主张的攻占大沽炮台的战略十分出色。英军中有这样的说法：格兰特语言表达能力极差，简直说不出完整的有条

理的话，以致他参谋部里的军官们只能根据他断断续续的词语来揣摩他的想法。

* * *

统领这次“远征”，有一个人以其性格、能力和资历，被一致公认为非他莫属。1860年4月17日，时任英国外交国务大臣的拉塞尔勋爵正式致书额尔金勋爵，告知他女王陛下“决心运用一切手段与清朝皇帝缔结和平，再次召他作为全权公使赴华，以其杰出才干完成这一重大目标”。

在额尔金《日记信札集》出版者沃尔朗看来，这一任命是顺理成章的。不过，詹姆斯这位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又要抛弃“温暖的苏格兰家庭”和妻儿老小而重返中国，他自然不很高兴。其次，他深感内疚的是，又把法国老伙计拖入这一新的冒险之中，他说道：“一见老友葛罗男爵，就感到犯有双重罪过：一是接受担此重任，二是强迫人家也作同样的牺牲。”

詹姆斯·布鲁斯·额尔金（James Bruce Elgin 1811—1863），1811年生于伦敦，著名外交家，出身世袭名门望族。祖父罗伯特·普鲁斯勋爵曾为苏格兰总督；其父托马斯·普鲁斯1799年—1802年任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期间，曾抢购并掠夺了希腊雅典的大量文物和石雕（大多卖给了伦敦大英博物馆）；后因躲债于1820年流亡法国，1841年死于巴黎。故雨果称“额尔金这个名字具有让人必然会想起巴特农神庙的特性”。而“额尔金主义”这一字眼也成了破坏和掠夺艺术品的同义词。

詹姆斯·额尔金童年（1820—1825）在巴黎度过，但已无家产。14岁就读于伊顿公学，后上牛津耶稣学院，并结交未来的精英人物，如未来的外交大臣坎宁等。他与日后担任首相的格莱斯顿也过从甚密。他本想从政，但是1842年继承的第八代额尔金伯爵和第十二代金卡丁伯爵的爵位未能使他自动进入议会两院，后在南安普敦当选议员，于是他选择了外交生涯，30岁出任牙买加总督；1846年调任加拿大总督，在处理法裔加拿大人事务中充分展现了其灵活的外交才干。

1856年受委派来华，发起攻占广州，俘虏叶名琛总督；后北上和法使葛罗一起，威逼清朝钦差大臣桂良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4月维多利亚女王委派他为特使，再度主导英法联军对华干预。他狡猾奸诈，以战逼和，下令火烧圆明园，强迫恭亲王签署《北京条约》。回国后，经帕麦斯顿首相举荐，被委任为印度管辖区总督，就职20个月后因心脏病复发，死于达兰萨拉。

* * *

斯坦利在1901年于伦敦发表的《巴夏礼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去香港同额尔金勋爵会谈后回来，又陷入老一套公事之中，毫无被召往前线的希望。他将在战场上缺席。额尔金特使身边已有威妥玛当译员。他成天无所事事，待在老衙门里，只得耐心等待来自北方的消息。无论额尔金对他个人有什么看法，他忘记了上海有两个人很希望在已露端倪的棘手事情中得到巴夏礼的有力

支持：普鲁斯先生对这位倔强的特派员赞不绝口；威妥玛急不可待地希望有他在身边。于是，额尔金致函询问他是否能放下繁重的公务立即北上与他会合……

他当然可以……行动之时被遗忘在后方真不是滋味……几年前，面对来自额尔金勋爵这样的邀请，他定会发出满意的欢呼！可如今生活变得暗淡，他已没有了这种激情。

然而，如果说他认为，对有机会在这场大行动中发挥作用不应感到高兴，那是在骗自己。一到战场，他的烦恼厌倦便一下烟消云散了。尽管要经历意料之中的种种危险和困苦，但他不愿错过下文将要讲述的这一冒险之举。”

然而，本书主要人物之一巴夏礼，当时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巴夏礼是个“中国通”，1860年时在华已20年。1828年生于苏格兰工人家庭，5岁丧父母，后被送往伯明翰一所学校；他两个姐姐投奔嫁给德国新教传教士的远房亲戚。这个传教士叫郭实腊（郭士立），曾将《圣经》译为中文，并为在中国沿海走私鸦片的商船任通译，后任英首任驻华公使璞鼎查的秘书。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两个姐姐把13岁的弟弟从英国招来，送到澳门，在璞鼎查另一秘书马儒翰家里学中文。他聪明伶俐，汉语学得很好，颇受璞鼎查宠信；从22岁起，常向英外交部汇报中国情况。1855年回国报告对华事务，受到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和首相帕麦斯顿的赏识。翌年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对英远东政策起很大影响。他把璞鼎查的那套狂妄自大学了过来，策划一系列对华挑衅与冲突。1858年1月，在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是他在难以置信的条件下抓获化装潜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额尔金把他招在身边，既当翻译，又当顾问，并担任谈判代表，虽被扣作人质，仍为联军攻入北京出谋划策。后出任英国驻上海领事。1865年，任驻日本全权公使。

* * *

“1859—1860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我在家中，坐在暖烘烘的柴火前，由一个朋友陪伴。尽管日常生活有些烦恼，但我很高兴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尤其对自己的命运心满意足。正在看书之时，有人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是一位老友的手迹，简直惊异不已；刚读了几行，就发觉是要我前去参加对华远征（从香港发动的）。即使一枚炮弹穿越房顶，在我脚边爆炸，也不会比这一切更令我惊愕！我挥舞着信嚷道：‘我要去中国了！’朋友合上书，抬眼望着天花板，差不多和我一样震惊。好几分钟，我俩不说一句话，脑海里浮想联翩，胸中热情激荡。我自言自语，这便是我的尽职之路，我要毫不犹豫地前去赴约。”在英军可敬的牧师姆吉神甫眼里，这也是通往北京之路。

* * *

在通往北京的路上，我们将有许多机会遇到1860年对华“远征”的各种角色，如英法联军两位总司

令格兰特和蒙托邦，两国全权特使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法军准将柯利诺，年轻翻译官埃里松，学者洛图尔，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及随军英国圣公会牧师姆吉神甫等。

第 04 章 巴黎、伦敦与北京

巴黎、伦敦与北京巴黎反响强烈

法国决心已下

“北京”一词的魔力

伦敦的强烈反应

英国犹豫不决

拉塞尔勋爵的暗喻

强硬路线占上风

伦敦和巴黎同意联合军事“远征

英法联盟并非自动而就

拿破仑皇帝的种种理由

朗东元帅：英国为钱财，法国派教团

英法联军攻打中国大沽要塞吃了败仗的消息，直到 1859 年 9 月才传回欧洲。当时拿破仑三世及宫廷成员全在西南海滨名城比亚里茨；自 1856 年以来，王室每年 9 月都在此行宫理政。

攻夺大沽炮台，法军投入兵力小，故法国方面的反应本应与参战程度相称，即“较小”。然而，事实上反应却很强烈。海军上尉巴吕发表《1860 年中国远征纪行》，一开头就不无夸张地写道：“长久以来，文明首次在我们所称的野蛮面前止步了。”

在巴黎，政府毫不犹豫地要对这一被视为侮辱的事件作出反应：法兰西国旗严重受辱，必须要予以报复。好战情绪占据了上风。巴吕还激昂地强调：“法兰西国旗的荣誉，以及我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强国地位为我们指明了行为准则。远征中国应坚定不移。”

自 9 月 17 日起，英驻法大使考利就询问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为了“给予清政府以应有的惩罚”并使英法两国在远东的利益安全获得必要保证，法国皇帝陛下的意图如何，并将采取何种适当的部署。

9 月 24 日，华勒夫斯基伯爵致书法国驻上海代表布尔布隆说，“皇帝政府决定因中国如此明显违反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而给予应得的惩罚”。他本人正与英国政府协商，争取明年初春可以动手。这一决

心，又因中国政府一直拒绝赔礼道歉而增强。

数周之后，10月17日，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向皇帝呈送中国事件长篇备忘录。其中提及要求中国赔款，尤其要“夺占一块中国领土，供我国军舰和商船停留”，就像英国人在香港那样。在巴黎，对华交战原则似已确定。

公众舆论呢？起初，舆论倾向于赞同；其实，“远征”之事与他们并不相干，他们不过逗逗乐而已。第二帝国史学家奥克塔夫·奥布里指出，“人们一谈起中国，便得出复杂而幼稚的概念，奇幻而可怕的想法：中国人似乎是由无数残忍而无主见的人组成的民族。”对于这种看法，即中国给予“民众截然不同的看法”，史学评论家安德烈·贝莱索解释道：一种看法是，中国古老而粗俗，曾很深奥，又显冷酷；城市臭气熏天，宫殿错综复杂，庙寺供奉着巨大的偶像。另一种印象是，滑稽可笑的人民，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在《嘲弄声》幽默杂志中，这两种印象交织于一幅漫画，即一个肥胖中国人，弓箭大刀全副武装，双手朝天高举，大声喊道：“我真遗憾发明火药！”洛图尔则指出，“远征中国在欧洲遭到反对”，“伦敦老城和巴黎沙龙从我们两国所进行的战争中，看到了对一个善意的民族的罪恶侵略”。

第二帝国史学家塔克西尔·德洛尔对这次战争的必要性持十分保留的看法。他认为：“为恢复法国国旗的荣誉而进行新的远征，相当不受民众欢迎。事实上，法国在中国无任何重大利益要维护，无需进行任何征服行动。因为两国完全缺乏经常通商的基础。”1873年，第二帝国垮台后不久，德洛尔曾是国民议会议员，故也是以政治人物身份作出反应的。为此，他更容易考虑这一问题：法国从1844年与中国所签的条约中究竟能得到何种利益。他解释说，俄国和美国都与中国保持着远比法中关系更为重要的关系；他们与中国和平相处。如果说英国与此不同，那是因为“它惯于手拿刀枪，向中国倾销鸦片”。

尽管如此，仅仅北京这个名字就令人魂牵梦绕。海军上尉巴吕以好战口吻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意图：“北京就是目标。以武力渡河，打开通道，夺取天津；签约不成，挺进北京，此系皇上钦示的计划，必定实现。”他还狂喜地声称：“我们要深入中华帝国，超越所走之路；远征的全部魅力，都因一个神奇字眼而引起：北京。”

* * *

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件”（帕麦斯顿所用的非常英国式的辞令）的消息11个星期后才传到伦敦。人们对此的反应是对立的。普鲁斯和贺布两人那样做对吗？他们采取的是惟一可行的方式，或是相反——他们操之过急、甚至是轻率从事吗？他们该强行通过白河口吗？普鲁斯不应该采纳中国官员指定的经陆路去北京的方案吗？总之，问题和答案同样之多，使英国政界分裂，额尔金也认为贺布的行动完全像“疯子”。

不论对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回答是“是”或“不是”，英国舆论的最初反应和巴黎的一样，都要为英国旗在大沽炮台前遭受的侮辱复仇。不列颠军队在亚洲的声威需要付出这一代价。大英帝国的影响和商贸利益也如此！报刊大肆鼓噪，《泰晤士报》撰文叫喊：“英国要与法国一起，必要时甚至单独行动，好好教训一下这些不讲信义的乌合之众；要使欧洲人的名字从此在他们整个领土上成为令人敬畏（如果不是令人喜欢的话）的通行无阻的保障。”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已 75 岁，3 个月前再度执政）对于如何处置这一事件犹豫不决。初期，他似乎不准备采取极端手段。但他所要依靠的正是那些不赞成他过于谨慎的人。巴吕指出：“在英吉利这样的国家，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赞成对华干预，一种反对干预。”

帕麦斯顿致函外交大臣约翰·拉塞尔，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中国人对辱英表示后悔，比如派一支海军攻占北京。但同时，帕麦斯顿也希望，事情能不采取战争手段而得以解决。他不愿在世人面前被看成完全为某种可鄙的复仇心所驱使。他尤为担心的是，一旦军事干预，清朝皇帝往北撤离，以期待严冬驱逐入侵者。10 月 29 日，他又致书拉塞尔说：“此时我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摧毁清朝皇宫，然后撤回战舰。”摧毁中国皇宫的主张，早已在泰晤士河两岸传播开了。

拉塞尔显得克制。英政府还希望避免向北京挺进，认为那样太大胆、太危险。在英国人看来，占领北京“将使联军陷入严重困境”。仅就财力而言，新的对华战争经费庞大，这迫使帕麦斯顿内阁，尤其财政廉·格莱斯顿三思而后行。

这些犹豫因素之外，还有对中国国内局势的考虑。几年来，一场大起义，即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最富庶的省份。外来干预会不会加剧事态，并导致清王朝垮台呢？这种可能性将带来难以预料的种种后果。在随即可能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下，英国可能丧失通商利益（出于羞耻不提鸦片走私）……也将丧失茶叶供应！英国将缺茶叶吗？假设令人不安……

拉塞尔讲了这样一个暗喻性故事：“某君子与鄙人商定协议，拟某日前去其家中确认。到了那天，我抄近路直奔此公住处。见路上插有小木桩，我便试着拔掉。就在此时，他从篱笆后面朝我开枪，打死我好几个随从。此系犯罪呢，或是可原谅的过失杀人？这便是我要问的问题。我得说，这属谋杀，应受严惩。”

拉塞尔于是征询前任克拉伦登的意见，克氏表示支持强硬路线。副外交大臣哈蒙德也持同样态度。起初，拉塞尔致书普鲁斯说，“出于人道考虑”，英政府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必进行攻占中华帝国京城的军事“远征”。但是，他要普鲁斯就批准《天津条约》向清朝皇帝发出最后通牒，同时要求赔礼道歉。拉塞尔还说，在等待中方答复期间，英政府抓紧部署，拟派出大型舰队将在季风转换期从印度赴

华，并启碇北上。一旦遭到拒绝，便可发起陆路进攻。

英内阁希望和平并避免新的征战，这种态度延续时间不长。英国人清楚，他们将被迫以武力方式打开通往北京之路。事实上，普鲁斯从上海回复国内，他不相信中方会对最后通牒积极答复，更不会道歉。确实，从中国方面看，强硬路线占了上风。大沽出奇制胜使僧格林沁将军冲昏头脑，故不愿妥协，甚至认为“教训这伙好斗而贪婪的洋夷”的时候到了。

法国政府方面，一直认为对华战争不可避免。拿破仑三世承诺筹备更大的“远征”。法国人的决心使英国人朝战争方向倾斜。而在英军总司令剑桥公爵的心里，决不许法国人独自前往中国。对法方紧锣密鼓备战，帕麦斯顿也甚感不安，为了英国的“名誉”以及它在亚洲的声望，他认为英国的参与不能逊色于法国。正如美国史学家费正清所言：“大沽炮台之辱，催化了英国的强硬路线。”

伦敦和巴黎，帕麦斯顿和拿破仑三世，一致同意联合发起对华军事“远征”。法英两国这次结盟并非理所当然。英国舆论一直对法国怀有一种混杂情绪，可谓蔑视与害怕交织在一起。诚然，1854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两国结盟反对沙俄。那时，克拉伦登任外交大臣，曾就法国皇帝发表评论道：“随着对他了解的加深，我觉得他越来越好。”帕麦斯顿也对拿破仑三世的自由化思想颇为欣赏，称之为倡导自由化欧洲的惟一元首。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时为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甚至急不可耐地表示赞同。维多利亚女王和英国绝大多数舆论对此大为愤慨。帕麦斯顿与路易·拿破仑在伦敦结识，曾在家中接待过他，一直留有美好印象。

英国人还可以指望拿破仑三世的亲英情感，这种感情由来已久，甚为强烈，这首先起因于他个人对曾受英方殷勤接待感激不尽。1838年，路易·拿破仑亲王曾移居伦敦。1840年8月，他正是从英国出发，试图在布洛涅登陆。而1846年从阿姆堡越狱之后，他又去了伦敦，一直待到1848年回国，并当选制宪会议成员。拿破仑三世在伦敦有许多朋友，始终保持交往。莎士比亚祖国的语言，他讲得非常流利，在此无须细说。

1855年，拿破仑三世正式出访英国，大获成功。拿破仑一世的这位侄子，在“世敌”、“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①受到隆重接待。英国百姓热烈欢迎法国皇帝。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阿尔贝亲王很欣赏其魅力，女王对欧仁妮皇后关心备至。数月之后，即8月份，女王由丈夫及自己的哥哥姐姐（威尔士亲王和维多利亚公主）陪同，对拿破仑三世进行了回访。在法国访问期间，一切同样尽善尽美。10天节庆之日，巴黎不惜代价搞好接待：隆重盛大的欢迎仪式，凡尔赛宫镜廊国宴，圣克卢宫演出，歌剧院大型晚会，市政厅舞会，参观为1855年世界博览会而建成的工业宫（即如今大小宫展览馆位置）等；最后还冒着夏日暴雨参观拿破仑一世墓，其象征意义令人叹为观止……女王后来致信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写道，她“非常高兴，快乐，备受关注”。对于拿破仑三世的个人魅力，女王继续大加赞扬：“无须故作姿

态以博取好感，外表毫无引人之处，却有着难以置信的迷人魅力……”

然而 1859 年，时代变了。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又煽起了昔日的恩仇。1858 年 7 月 14 日，当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前往歌剧院时，3 颗炸弹投向宫廷车队；皇帝夫妇虽安然无恙，但 8 人当场被炸死，148 人受伤。主犯费利斯·奥西尼¹⁴，自称意大利爱国者，恨死了拿破仑三世，认为他背叛意大利事业。结果奥西尼被判处死刑，当即执行。

但是，案情调查显露，凶手在英国同伙，炸弹系在伦敦制造。于是在巴黎，民族主义愤怒大爆发。报刊推波助澜，数千军官签名请愿书，恳求皇帝颁诏，到英国缉拿相关凶手！面对舆论压力，外交大臣华勒夫斯基向伦敦发出一个干巴巴的照会，要求修改英国关于外来难民立法。

出乎人们意料，帕麦斯顿对此采取和解姿态，甚至按这种意见拟了一份相关文件。但是，英国舆论是好斗争胜的。在野的托利党指责帕麦斯顿平时何其强硬，此时怎么竟然拜倒在“吃青蛙者”（英国人给法国人起的绰号）脚下。政府的有关法案已被下议院驳回，首相便向女王递交辞呈。拿破仑三世对此事件表示遗憾，责备请愿官员，召回被认为过于粗暴的驻英大使佩西尼，由佩利西埃元帅马拉科夫公爵取代，以示共同纪念克里米亚战争。双方决定事情到此为止。不过，法英联盟已深受损害，魅力中断。昔日积怨重新横亘于两国之间。伦敦甚至有人当真认为，拿破仑三世正在策划入侵英吉利！

其次，自《天津条约》签署以来，欧洲时局有所改变。拿破仑三世的欧洲大陆政策不重视英国维持欧洲和平的考虑。英国人则不赞成法国在意大利的战争（1859 年 4 月底至 7 月初），怀疑第二帝国打着维护意大利统一名义所进行的解放之战，实际是要把半岛置于法兰西皮靴之下，以此来部分恢复拿破仑的辉煌时代。

数月之后，按 1860 年 3 月 24 日《都灵条约》，意大利统一的代价是皮埃蒙特地区把尼斯和萨瓦割让给法国；英国人对此亦不给予好评。至于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值开凿初期），英国人更斜眼看待，觉得是对英国统治印度的威胁。

而法国天主教徒则怀疑英国新教徒同情支持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因为太平军领导人声称信奉某种耶稣教。另外，拉芒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公众舆论，仍然把路易·菲利普在位时首次达成的法英“友好协约”视为违情悖理的联盟。

不管怎样，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起码在中国事务上坚持与法国人继续合作。而且，他声言，这是遏制巴黎野心的最好办法。法国对处于变化中的印度支那垂涎三尺，英国人对此甚为不安。再者，他们害怕看到法国人仿效英国吞并香港而要求中国补偿，如要求割让长江口外的舟山群岛。1856 年初马赖神

¹⁴ 意大利烧炭党人，暗杀未遂事件在法国激起强烈的反英运动。

甫被处死后，法国人决意与中国人争吵；英国人对此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担心以传教士保护者自居的法国人，在已经有所流露的理想主义情绪驱使下，要对这一杀害加以报复。

不过，拿破仑三世本人并不愿做任何可能使英国人气恼的事情，特别在中国问题上更是这样。此外他想向欧洲表明，法英结盟依然充满活力。上层种种考虑，无不主张对中国进行干预。史学家拉戈斯从地缘政治角度作出这样的解释：“第二帝国处于过渡时期，它既看到旧大陆的残酷冲突仍在继续，又看到把后人目光引向远东和远西的热忱正在诞生。”

的确，第二帝国时期可谓法国海外扩张时期。作为军事独裁制度，帝国必须满足其军队的需要，靠枪杆子追求声望。对那“远方诗歌般的想像力”，帝国不能无动于衷。遵循拿破仑传统，三世皇帝要放眼欧洲之外。其皇叔拿破仑一世的远东海市蜃楼，不正是中国吗？且看那句著名的预言：“当中国觉醒之时，世界将为之震撼。”

据史学家高第无数次解释，法国在远东国家曾谋求其影响。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暹罗、交趾支那以及日本，法国政策都摇摆不定，缺乏连续性，因而一无所成。正当法国在交趾支那进行征服、殖民之时，绝对不能接受其在远东的声望有丝毫损害。

同时，拿破仑三世对法国经济利益始终牢记在心，绝不疏忽。正如英国政府一样，他也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总想进行可能的工业品出口。他也打算在华建立海军基地。其不可告人的想法，当然是要与已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站稳脚跟的英国作对。的确，在中国各口岸，人们只知道英国领事、英国旗和英语。与英国合作，既可遏制它，又可瓜分其利益。

然而，法国官方的决定性动机，却与英国的打算相去甚远。这可以说是海峡群岛、拉芒什海峡两岸思维方式差异意味深长的写照！英国人重物质利益，只想讲金钱、生意、出口和移居香港等等；法国人和拿破仑三世作为理想主义者，却在回答什么是“天主教东征”。

作为天主教政体，第二帝国确实想安抚天主教保守派，因为后者对意大利政治局面重组中保留给罗马教廷的命运甚为担忧。拿破仑三世不会忘记教皇对“12月2日政变”给予的“完全认同”。凭借军事行动帮助传教士在中国传布《圣经》，可以被看作极好的对内政策。皇帝本人对教务虽漠不关心，但希望天主教教士推动人们投他的票。何况欧仁妮皇后正热忱地支持着宗教利益。此外，正如1900年樊国梁主教所写的：“欧洲人不会因这一失败而罢手。”

在1877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法国陆军大臣朗东元帅把各方面的动机作了精辟的概括：“在孟加拉英商眼里，《南京条约》成了他们继续以麻醉品毒害中国人而获取千百万银两的手段。法国则要求加入与这些地区的诚信通商。法国对华贸易额可惜不大，但在中国有更高的利益，即派去传教士；他们

尽管冒着各种危险，经受各式各样的困苦，终于在天朝各省甚至最偏远的地区建立起许多天主教区。这实属基督教文明事业，我们予以支持甚感光荣。”

《天津条约》签署后不久，僧格林沁即向皇帝呈送一份长奏章（西尼巴多·德·玛斯曾予引用），对天主教神甫们发展新信徒的热忱表示担心。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以下内容，大意是，外夷执意传教，诱骗愚蠢，归依氓民，扩建教堂……儒家弟子必遭轻视，如此则可憎的夷教定居上风，吾人终将沦为洋奴。

第 05 章 周密筹划的“远征”

共同筹划“远征”

举荐蒙托邦将军

任命冉曼和柯利诺为将军

法国“远征”军组成

英军总司令格兰特勋爵

英国“远征”军组成

朗东元帅训示

英方军令

法军出发

阿尔芒医生的热忱

1859 年 9 月中旬，一得知大沽惨败，拿破仑三世即责成海军大臣阿穆兰上将和陆军大臣朗东元帅为筹备对华“远征”打好基础。——“远征”应当基于四大支柱之上：

——组成陆路部队；

——组成作战舰队；

——运输和军需站；

——制定作战计划。

最初的考虑，是组建一支大的“远征”军，大约 1.8 万人。欧仁妮皇后竭力赞成展开大规模的对华“远征”。陆军部一度计划筹建 4 个新的朱阿夫轻步兵团，以志愿兵为主，再加上千余名比利时士兵组成一支部队。但是，由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经济因素，尤其为了不使英国担心，法国在正式审议方案时把计划兵力削减了不少。事实上，英国人不会同意法国向中国派出大量的超过英军的兵力。其次，

法国还明智地放弃了向中国派出战马，亦即骑兵队的计划。杜潘上校对此甚感遗憾，不过表示理解，他说道：“……与英国结盟的要求，使这些过于庞大的计划破灭……不过，既然我们邻邦极度的敏感性从此得到了尊重，我们因此可希望，英法间的友好协约将保持平稳了。”

伦敦和巴黎共同研究了军事“远征”如何组织并制定了作战计划。两军总兵力确定为2万人，英军1.2万人，大部分从驻印部队抽调；法军8000人。

在“远征”军筹组中，法国海军上校布热瓦起了重要作用。1859年10月，他由阿穆兰上将派往伦敦，负责预先与英方沟通，并与之一起筹备法英联军将在同一战场进行的联合行动。布热瓦上校代表海军部，里布尔上校代表陆军部，与英军代表研究了未来“远征”的各个方面，如：兵力配置、联军间的协调，人员与物资运输，后方基地，进攻目标等。对夺取天津的方式——取陆路或水路——也作了研究。至于夺取北京这一最高政治目标，联军当时尚在犹豫之中。

“远征”军总指挥尚待择定，挑选并非易事。朗东元帅最先想到1859年蒙蒂贝洛之战得胜者弗利将军，他曾率4000兵勇打退1.8万名奥地利人。拿破仑三世皇帝拒绝这一人选，认为他虽刚毅，鉴别力强，但他对人态度生硬，性格耿直古板，不适合与盟军灵活处理关系。

拿破仑三世倾向于年轻而敢想敢干的特罗绪，他是索尔费里诺战役的英雄，紧急关头表现得卓有见识、沉着冷静。皇帝很可能会提升他为元帅。特罗绪与出生地贝尔岛联系紧密。不过，他对主宰意大利战争的无序状况怀有不愉快的记忆，他要求同时拥有外交和军事全权，最后他以家庭原因为由婉拒此任。拿破仑三世的副官弗勒里伯爵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皇上曾对他谈到，“难以找到一位精力充沛、且能与英国人保持融洽态度的帅才管理者和组织者”。于是，他想到举荐蒙托邦将军，这一保举被接受了。弗勒里记得1837年他作为青年志愿者入伍赴阿尔及利亚，蒙托邦曾热情欢迎他加入由他指挥的驻奥兰的北非骑兵团。

任命一位骑兵军官统率一支几乎完全由步兵组成的法国“远征”军，定然令人大为吃惊，但这是很适宜的选择。其实，蒙托邦身上兼有士兵加组织者的优点，广受赞扬。大家知道，他刚毅过人，处事有方，然而一直手头缺钱。蒙托邦少将作为驻非洲老战士，大半生在阿尔及利亚度过，在那里享有盛誉，为此赢得过约12次嘉奖。最突出的战功，是在摩洛哥边界俘获埃米尔阿卜杜勒—卡德尔。

即将以地形测量处主任身份参加“远征”的，对这一任命十分赞赏。他认为，蒙托邦除军人优点外，还有“非同寻常的性格，即集坚毅、机智却又随和、通融于一身；这在肩负与高傲而敏感的盟军融洽相处的使命中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后来看到的情形，却并非全都如此……对于蒙托邦将军的个性魅力，记者兼史学家德洛尔持保留看法，更多强调其机会主义的一面。“作为驻非老兵，非洲战争养成的优缺点他身上均有，而缺点多于优点。不过，他精明能干，才智横溢，平易近人；其军人习惯使之不

越过阿拉伯办公室所划定的谨慎行事的界限，待人接物随机应变，故而能很好地与敏感的盟友相处。”

年已 63 岁的蒙托邦将军，在贡比涅行宫受到拿破仑皇帝接见。和枫丹白露宫一样，这里也是皇家最喜爱的度假地，每年 11 月 15 日圣欧仁妮节起，皇帝喜欢在此理政。拿破仑三世问他，是否感到有足够力量经受得住可能持续很久的“远征”劳顿，以及可能炎热或寒冷的恶劣气候。蒙托邦满怀豪情地回答，他在非洲度过了 27 个春秋，从未生病，身体反而因战争劳累变得更结实了。皇帝从御桌上拿起一张中国地图递给他，随后让他去见哥士奇伯爵。哥氏是法驻华使团一等秘书，大沽事件时在场，被派回国向政府汇报这一惨败情况。这位外交官负责向蒙托邦将军介绍他对中华帝国人与事的所有知识。接着，蒙托邦以对华“远征”军总司令的身份，被介绍给了宫中达官显贵，以及欧仁妮皇后。11 年之后，在 1870 年夏天那个悲剧性的时刻，已成为摄政者的皇后还记起蒙托邦其人……

受命担任对华“远征”军总指挥之际，生性谨慎、且惟恐失去其特权的蒙托邦将军非常关注并让政府为其详细说明任职的条件。1859 年 11 月 13 日政令明确了他的职权。按其要求，蒙托邦将军获得了全权。除法国“远征”军陆军司令外，他还担任海军总指挥，而且有权处理外交问题。他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拿剑之手，也应握笔”。人们将看到，此等广泛的职权，大部分不久就被收回了。

鉴于战区遥远，蒙托邦将军还拥有一些特殊职权，如有权任命上校以下的各级军官和授予荣誉军团四级以下的勋位。

然而，令蒙托邦不太高兴的是，他要求带一个科学家和艺术家委员会随军出征，并在“自从与路易十四（确切地说应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同时代的乾隆皇帝以来，欧洲人未曾深入到中国内地去收集所有带来好奇的历史与艺术文物”。这一要求未得到满足。蒙托邦心中想的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随行的那个著名的由一批杰出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其非凡的业绩成为埃及学的开端。

说到委员会，只有一位学者，即洛图尔伯爵随军参加了对华“远征”。这是蒙托邦最大的不幸！他还曾要求带一名摄影师，竟被拒绝，实在遗憾。这样，联合“远征”中许多情景及场面，后来全由英军垄断拍照，并且主要归功于才华横溢的费利斯·毕托。

总司令之下配有两位副手：冉曼和柯利诺准将。第一副手冉曼将军在总司令不能分身时可代行其职。蒙托邦在《回忆录》中写道，两副将中，“前者性情沉稳，忠心耿耿，刚柔并济。后者军事才干和资质，属深受推崇的将领之一，性子火爆，且多疑，但非常直率。”不过，正如柯利诺所指出的，第二帝国众多将军中，自荐赴华者寥寥无几……

拿破仑三世还钦定身边副官之一的施密茨中校为“远征”军参谋长。而炮兵由本茨曼上校指挥。工兵部队则由蒙托邦将军亲信、当时在交趾支那执行任务的戴鲁莱中校带领。行政事务由助理军需官杜比

负责，但他本人（在组建“远征”军时）无须从中国折回了！

法军骑兵指挥官雷布尔被派往英军任特派员；而英军弗利上校则来蒙托邦将军身边任联络官。还有一批无具体职务的额外军官随同“远征”，一旦需要……即顶替正式任职者……

杜潘上校以行家眼光强调指出了实施这类“远征”所带来的各种困难。他写道：“组建用于远征的舰队和军队是一件比人们通常的想像更为困难的事情。将领的选配，士兵的素质，发布清楚准确的命令以便控制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避免冲突，规定卫生预防措施，需要运送的各种军需辎重的数量和质量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由战斗力评估和特种军需组成的整体，若要使这个整体配合得好，就要有很强的分寸感，尤其要靠丰富的经验。”

授职仪式一结束，对华“远征”军总司令即走马上任。蒙托邦将军有两个月用于准备；其实，时间很紧迫。当时已9月底，12月份首批部队就要离法。在此期间，他要对克里米亚战争和意大利战争的不足进行总结，做出结论。他知道，此次到世界另一端肩负使命能否成功，大半取决于准备的充分与否。由皇上指定的有效班子，朗东元帅和弗勒里将军会大力协助他。

一种与英国人竞争的强烈情绪主导着备战，而且在整个“远征”进程中依然继续着。英国人一向以办事严谨老练、有条不紊而著称。法国人决不能被人家看成缺乏准备、办事轻率或粗枝大叶。这关乎法兰西帝国的荣誉和名声。

自11月7日陆军部长将征募志愿兵的通知发到各军区起，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部队都报了名。据夏尔·德·米特雷西伯爵称，“由于军中各团报名的军官、士官和战士众多，陆军部难作决断”。对这种报名热情，杜潘上校认为应打个折扣：虽然士兵们踊跃应召（因为有特殊待遇吸引，如提高军饷，“远征”回国后有1年假期等），但在军官中热情没有这么大，而高级军官中响应者更少。

对于“远征”部队，无论军官、士官，还是普通士兵，挑选都相当严格，只有最强健的军官和最壮实的战士才被选上。正如德拉格朗热中尉报道的，“所有体弱者，统统被淘汰”。被选中者，有许多是意大利战役老兵。可以说，这支对华“远征”军，皆由精锐部队组成。

作战部队包括2个步兵旅，属于不同兵种，共5600人，其中有1600名海军官兵。第一旅由冉曼准将指挥，包括四个步兵营（两营轻步兵）、第101步兵团和2个工兵连320人）及1个工程排。第二旅由柯利诺准将指挥，也包括4个营，其中有奥马莱上校率领的第102步兵团，瓦索涅上校率领的第二海军陆战营，和4个炮兵中队（1200人）以及1连架桥兵与1排引信兵。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远征”军中没有骑兵，仅有一支50来人的轻骑兵小护卫队，负责跟随总司令和外交代表一行。蒙托邦将军还可依靠法国现代化的海军及一支适合的舰队（已有钢铁船体、蒸汽机与

螺旋桨结合一起的军舰)。拿破仑三世上台以来，在海军经费上并不吝啬。海军部长阿穆兰上将则忙于集结必需的部队运输船，同时从英国购置3艘快速蒸汽巨轮（即“日本”号、“欧洲人”号和“威悉河”号），加速造新船，包租商船等。法国舰队共有42艘螺旋桨船，6艘轮船，13艘帆船，以及87艘用于运输的租船或包船。

当然，不要忘记已有的21艘战船，其中16艘炮舰均能越过白河沙洲，并溯河而上。这些铁件可拆卸的炮艇配有30厘米口径有膛线的大炮。火力强大而且机动，它们将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可是，必须指出的是，海军的实力在复核时可能被削减了。从法国各港口出发的舰队将与已在中国海的舰只会和。

这次“远征”还配备了一个医术很强的医疗队，由首席医生卡斯塔诺带领，包括40名军医和8位药剂师。另有宗教处，有随军高级牧师特雷加罗神甫，同时也有一位新教牧师朱雅神甫。

* * *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初期，英国军队相当僵化，几乎没有战斗力。虽然自1815年以来，英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军队在处于赫赫有名的统帅惠灵顿勋爵一成不变的控制下，自滑铁卢战役以来实际上并无进展。甚至可以说管理非常混乱，指挥无能，军需很差，医疗勤务更是缺乏。总之，官多懈怠，兵无斗志。不过，英军的全面恢复活力却是迅速和彻底的。

根据剑桥公爵的提议，对华“远征”军总指挥权托付给了霍普·格兰特中将。格兰特将军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古老的家族，经历丰富，尤其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数次印度战争。在镇压印度大叛乱中，他恰好刚刚立下卓越战功。

英国“远征”军由一批享有盛名的团队组成，其主体部分同样是2个师。第一师由米启尔少将（相当于当时的法军准将）率领，辖两个旅11个团（其中印度团3个）。第二师由拿皮耳少将率领，辖两个野战炮兵中队，1个攻城炮兵中队，它们是经埃及从英国派来的，配有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用炮门架射。3个炮兵队由克罗顿准将（相当于上校）指挥。另有1个女王工兵连和骑兵队，由巴特尔准将调遣。

英军骑兵有1340人（军官40名，英国士兵400人，印度士兵900人），包括2个“女王卫队龙骑兵”队，2个非正规的印度锡克骑兵团，分别由范纳和普罗宾少校带领，两个少校后来在“远征”中可谓出尽风头。普罗宾少校指挥的锡克骑兵第一团全由志愿兵组成，驻扎在印度中部勒克瑙。该团18天内急行600英里，再乘火车赴加尔各答，从那里上船开往英军聚集地香港。

正如英国纪实作者吴士礼、塔洛克等后来着重指出的那样，英军特别注意设立管理和医疗服务

处。只有从开普敦来的一个辎重营略为欠缺些。对于英国人来说，筹组“远征”军较为容易。他们在印度及开普敦驻扎着许多部队，步兵骑兵皆有，可以比较容易地经香港派往中国大陆，其辎重运输问题同样减少了许多。他们在开普敦买了许多马，装在舰船上送往战地。

英军在中国海域已有一支舰队，由海军上将贺布率领。上将强攻大沽要塞负伤，现已养好。英远东舰队继续加强，有 61 艘螺旋桨战船，其中多为炮艇，10 艘轮船，16 艘大帆船。其次，英国包租的商船数量庞大，有 135 艘之多。在总兵力上，英军明显比法军多，约为 1.26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印度。另一些人的估计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如果相信英史学家米切尔·曼的说法，英军数量甚至高达 1.65 万人。在陆军兵种配备上，英军比法军协调更为严密，因为后者无骑兵。英国人预计，战斗打响后，在初期可投入的实际兵力约 1 万人。

同克里米亚战争时派去的 6 万兵力相比，英法对华“远征”军才 2 万人，只能算一支小军队。不过，如果相信英军营地军需助理吴士礼中校的话，英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一旦开战就派出组织得如此周密、又如此有效而精良的部队。就连涉及士兵医疗卫生与舒适所需的一切都没有忽视。他甚至敢说，这次“远征”准备得“十全十美”。

然而，额尔金勋爵却认为，这次“远征”代价巨大，与其目标极不相称。

* * *

1859 年 12 月 15 日，蒙托邦将军接到朗东元帅的训示，他认为训示“太简单”，其实却很明确、审慎而且全面。这六点训示很有意义。朗东元帅首先强调，这不是一次“平常的征战”，故对“远征”军司令有“特别”的指示，包括下列 6 个方面：

（一）嘱其谨慎对待“海军”指挥官的敏感性。

（二）要求特别注意与英国人协调一致。嘱咐他务必与英军司令融洽相处。保持与“盟军将领日常交往中”的和谐，丝毫不能疏忽大意，以确保作战时看法统一、齐心协力。

（三）出征目标已确定。要突破 1859 年两使节行程受阻的地方，即大沽炮台；要进驻距北京最近的“坚固且具威胁性”的阵地——天津。训示明确要求，“最适当而重要的是停在天津驻扎固守，决不后退”。朗东元帅认为，一旦拿下天津，盟军的存在“将对中国政府的决策起重大作用，可能足以促使其决定按我们所强加的条件讲和”。当然，必要时向北京挺进的可能性也作了考虑。不过，在陆军大臣心中（甚至在拿破仑三世心中），这不是最可能的假设。届时将由蒙托邦将军来确保“这次新进攻的决定性成功”。

（四）关于作战方式，训示要求最大限度利用舰队作为后方基地（军需仓库和医院等）。

（五）“远征”军总司令同负责与中国人和谈并起草条约的外交官之间应当保持的关系也被作了认真考虑，因为这种关系必然难以处理。

（六）至于与英军统帅的关系，希望法方将军（和英方将军）表现出“对共同事业忠心耿耿、互相提携的精神”。最后，训示要求法军将领“慎之又慎”，切勿考虑“可能出现的个人问题”，以便不给“如此遥远的征战增加困难”。

这些最新嘱咐，并非徒劳无益。正如蒙托邦将军后来致陆军大臣的信中所承认的，有好多次，他都竭力克制自己，严格服从训令。

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这场军事征战的结局，法国陆军大臣表示乐观。在他看来，“敌人并不可怕”。“攻占皇帝钦定的阵地，是你们赴华使命中最轻而易举的部分……中国军队尽管上次取胜，但算不上可怕的敌手；不是小看他们，我们有把握攻击之。他们的力量在于在自己土地上为保卫家园和信仰而战的全体人民，而他们在对其起保护作用的气候条件下作战，而这种气候对其敌人却往往是致命的”。朗东元帅觉得，困难主要来自气候条件。

帕麦斯顿首相对英国“远征”军只下达总的指示。具体训示则由陆军大臣悉尼·赫伯特给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下达。格兰特将军接受的训令，和蒙托邦将军的类似。训令中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的目标，旨在获得对“白河口侮辱事件的正式谴责和道歉，随后保证批准《天津条约》”。（关于与法军的关系）训令以一种表现出优越感的口气嘱咐英军司令，在任何情况下给予法国盟军“以各种支持”，并“真诚坦率地与其将领们联合行动；这是对于远征成功必不可少的英法协约的最可靠的基础”。

当蒙托邦将军带着军事与外交全权即将离法之时，英国政府却还在考虑是否要请额尔金勋爵重返中国。

法国“远征”军应从海军运输船只集聚的军港土伦启程。在部队上船之前，蒙托邦将军认为必须亲自前去查看出发准备情况。视察后他很不满意。“军官安顿太差，士兵挤在太窄的空间里，而直至好望角的航行中途是不停靠的”。如此不舒适，他甚感不安。他强调说，习惯航行的人迫不得已时可能挺得住这些条件，而陆军肯定不行。他有言在先：“若坚持那样，到了上海，我手下与其说是一支军队，倒不如说只剩了一所医院。”

他向朗东元帅表示了对阿穆兰上将的不满。皇帝即派身边副官之一卡斯特尔诺上校前去土伦了解情况，后者确认了蒙托邦将军的担心与批评在理。为此抽调了更多运送船只，出征官兵在船上的活动空间有所扩大。其次，船队预计中途在加那利群岛、好望角、新加坡和香港停靠，然后抵达上海，完成第

一阶段征程。

蒙托邦将军关心部队福利，值得推崇。在 19 世纪的军队中，人们还不习惯于为此类问题操心。克里米亚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时期的士兵可以为此作证！其实，关心部下福利，也是要保证他们健康平安抵港。蒙托邦对这一做法颇为自许，他毫不犹豫地断言，靠了这些措施，部队虽经长途跋涉，但到达上海仍精神抖擞，“即可投入战斗”。

将军秘书兼翻译莫里斯·埃里松敬佩地赞扬司令的组织才干，说他一切都要预作准备，细致周到，关心士兵生活。在他看来，蒙托邦将军并不属于“设法应付派”，即意大利战役中那些有办法的人。他进而断言，“远征中国堪为组织工作的奇迹”！出征伊始，将军脑海里已有全面计划……“并筹备各种要素，甚至治疗发热病人的奎宁”。

当年 12 月，法国远“征军”大部（陆军步兵）从土伦登上 9 艘蒸汽运输船：“敢闯”号、“山林女仙”号、“汝拉山”号、“涅夫勒”号、“卢瓦尔河”号、“卡尔瓦多斯”号、“加龙河”号、“莱茵”号和“伊塞尔”号。翌年 1 月初，“快帆皇后”号（向民间购买）、“杜佩雷”号（老帆船，在中国海面当医院用）和 3 艘运炮艇的蒸汽船“威悉河”号、“欧洲人”号及“日本”号，也驶上了开往好望角的航道。第二轻步兵营搭乘“罗纳河”号从布雷斯特出发；另一个轻步兵营和一个海军陆战团也聚集在大西洋岸边洛里昂、瑟堡和布雷斯特等港口，准备登上三桅驱逐舰。

总共有 16 艘军舰和百余艘运送食品、煤炭和作战物资的商船从法国港口启航。

卡斯塔诺医生叙述了部队出征时的心情：“出发时的喜悦，与这场无先例的远征的难料结局所引起的忧虑感交织在一起，这从所有人的脸上都看得出来。因为就要去冒险天涯，却不能肯定将要展开的战斗能否成功，甚至不知道能否回国，这自然令人忧虑。”这位军医补充道：法军士兵也带着这样的想法出发，即他们“进行光荣的远征是为了复仇并重竖法兰西的旗帜”。

另一位随军医生阿尔芒在记叙开头这样写道：“我们为能够参加对华远征深感荣幸，20 年梦寐以求的旅行就要实现了。远洋航行的吸引力，途中观察研究各种气候变化，法国军队将要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最遥远的征战，尽管前景未卜，但一切全都汇集起来诱惑着喜欢冒险的人。今天，我们在鼓乐号角声中满怀激情地出海，船员和部队官兵不停地高呼，皇上万岁！法兰西万岁！”

1859 年 11 月 19 日，蒙托邦总司令从巴黎向出征部队发出第一号命令：“在拿破仑三世皇上和法兰西国家的庇护下，你们应召进行一场遥远而光荣的征战。

你们的使命，不只是为了为已使法兰西享有盛誉的所有征战添上新的一页。你们要以严明的纪律，向众多民众表明，你们并非他们所想像的那些夷人；同时要以尚武的激情，向他们证明你们的勇敢。我

国国旗第二次与英国国旗联合起来。这种联合将是胜利的保证，正如两个民族结盟是全世界和平的保证一样。你们要完成的任务是伟大而美好的。而成功取决于你们对皇上和对法兰西的忠诚。待回到祖国的那天，你们将自豪地告诉同胞们，你们把国旗插到了不朽的罗马在其全盛时代也从未想过派兵深入的地方。

皇帝陛下赋予本人统帅之职，我感到荣幸之至。我深受恩宠，只能以尽心尽职、时刻关心满足你们的需要予以报答。战斗打响之日，你们靠我，我靠你们：我们要高喊着‘皇上万岁！法兰西万岁！’去夺取胜利。”

巴赞库尔男爵和米特雷西伯爵一样，在引述蒙托邦将军这道命令时还补充一句：“愿上帝保佑这支小军队，飘洋过海，远离故土五千海里，去为基督教与文明的神圣权利而复仇吧！”

朗东元帅向蒙托邦将军庄严地宣布：“现在请接过法兰西国旗！”

第 06 章 漂洋赴华

法军参谋部出发

途经马耳他、埃及、亚丁、锡兰

在新加坡感到惊讶

抵达香港

海军准将巴热拜访蒙托邦

蒙托邦向巴热提出异议

有益的停留

普罗宾和范纳率领的锡克骑兵

用英式阿姆斯特朗大炮还是法式来复线大炮

蒙托邦抵达上海

运送士兵

路过开普敦

抵达吴淞口

额尔金受命

葛罗男爵复职

一同远行

“马拉巴尔”号沉没

特使抵达香港

1860年1月12日中午，蒙托邦将军从马赛港登上“黑豹”号商船（英国P&O公司汽轮），前往亚历山大港。他选择了经埃及苏伊土地峡这条最近的线路，这可使他比部队早一个月抵达上海。

随行的有身边副官和传令官及其儿子夏尔·蒙托邦上尉，还有参谋长施密茨中校、炮兵司令本茨曼上校和军需助理杜比等。蒙托邦指出每人至香港的路费是4000法郎（相当于如今3万欧元），所以他理解法国政府只肯为务必先去备战的人预定这艘航船。船上同行的还有拟返回上海的法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及夫人，以及蒙托邦将军秘书兼（英语）翻译伊里松，路费3000法郎将军自掏腰包；这个年轻人后来晋封埃里松伯爵，著有《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等。

同时，船上有许多英国人。让埃里松感到庆幸的是，出发半小时后，“这群兴高采烈的冒险者便互有好感，融合了起来，仿佛大家久已生活在一起似的”。但1月份的地中海，对于晕船者实在可怕。蒙托邦将军直到马耳他才让秘书放下了心，秘书说道，将军固然有点儿晕船，但主要是因为从前在非洲作战，胸部中弹一直未能取出，故在波尼法斯海峡浪大颠簸时感到难受。经过这条危险的海峡时，乘客们不禁想起4年前“快活”号沉船的遇难者（约800人死亡），其中有开往克里米亚的第八轻骑兵师的1个中队和一批水手。

终于到了马耳他！“黑豹”号要在那里加煤。在首都瓦莱塔，蒙托邦将军受到礼炮的迎接。1798年，拿破仑·波拿巴在统兵前往金字塔的途中，占据了马耳他。埃里松心里想，波拿巴当初若让此地留在骑士团手中，那么，如今依然在这里的应该是骑士团骑士，而不是英国人了！大家游览市容。将军去看圣-让大教堂骑士团骑士墓厅，该教堂是为纪念骑士主保圣人让-巴普蒂斯特而建的。埃里松等去逛上城、石板街和一排排白房子，只见拱廊下穿梭着身裹黑披风、目光亮如钻石、走路细腰在颤动的马耳他女子。

船驶向亚历山大港，颠簸一直不断。元月20日抵港。码头上，有毛驴队等候。要进城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埃里松记道：“一头毛驴一个赶夫。毛驴倒相当漂亮，赶驴的人却丑得很；毛驴温顺安静，赶夫指手划脚、吆喝不停，像着了魔似的；驴耐心地驮着你，而赶夫则竭力想控制你。”埃里松自以为人家为他提供的是“德莱斯普斯先生的毛驴”，这种荣幸总是乐于被接受的！这样他感到犹如坐在地峡（即苏伊士运河）开凿者费尔南·德莱斯普斯本人那头雄驴背上，进入了法老们的土地。直至他发现所有的战友都坐在同样牌号的驴背上！

蒙托邦将军发现，尽管在埃及总督默罕迈德·阿里时期进行过整修，亚历山大大帝城依然“破败不堪，肮脏至极”。于是，他干脆乘火车到开罗，参观城堡、宫殿和默罕迈德·阿里清真寺。走出寺外，发现远处三座灰蒙蒙的山头。“那就是金字塔！”将军惊叹道，急步赶过去。在这些满载历史之地，将军一行有权重温那场著名战役的历程。他举着手杖，指着沙漠中某些想像的所在解释道：“波拿巴就在这里，那儿便是方阵遗址；马穆鲁克骑兵正是从那儿发起冲锋。”于是，随行人员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位骑在白色战马上“头发平直的科西嘉人”。

还是乘火车，穿越那令人沮丧的沙漠，从开罗赴苏伊士。在苏伊士，大家统统下车。没有时间到城里转了，因为轮船（催人上船的）铃声响得很急。况且，实在太炎热。“复仇女神”号倒是一艘漂亮的巨轮，可容纳 600 名乘客。埃里松称该船“如贵妇小客厅般舒适，像新钱币那样干净”。船上坐满了“黑豹”号的乘客和从英国南部南安普顿出发的旅客。

“复仇女神”号就是著名的“英印快邮”，乘客去往锡兰、印度、中国、日本，以及荷属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等。船上有许多妇女，她们有的是英驻印部队军官的妻子，前去与夫君团聚，有的要去见未婚夫（有时甚至是尚不成熟的未婚夫）。还有一些长着红棕头发或黑头发的西班牙男子等。能乘此船，埃里松不觉得遗憾，并特意在“日记”中留下了饶有兴趣的一个章节。

红海。晴空万里，十分炎热。每日五餐，“不吃饭时消化，不消化时吃饭”（埃里松语）。左舷沿着吉达城航行。一阵大风骤起，让乘客们吃足了苦头。船停靠亚丁，加煤和淡水。蒙托邦身着军装，由幕僚们陪同下船，受到英驻军长官接待。这是埃里松首次施展翻译才干的机会。他对亚丁的蓄水池很感兴趣。航行继续，照将军的说法，“感觉极好”。

2月5日，停靠锡兰岛西南部的加勒海角。蒙托邦将军及其幕僚们美好的“豪华之旅”结束了，众人遗憾地离开“复仇女神”号，该船继续驶向加尔各答。他们登上小岛，但没有礼炮欢迎将军！驻防该地的英军少校没露面。锡兰总督住在科隆坡，距此数海里，当时也不在！埃里松记述说，将军十分恼火，“直摸胡子，没有一丝笑容……不作任何拜访，像普通人似的待着，而且缩短了日程。事后加勒海角和科隆坡之间频频互致信件。那位少校受到斥责。”埃里松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补充道：“瞧，人们多么快就适应了显要地位！”

这个小事件很能说明蒙托邦将军好发火的脾气。这位骑兵军官非常看重自己的身份所应享有的尊敬和特权。人们为此替他惋惜，因为在锡兰停留毕竟是美妙的。他在《回忆录》中，对此事件只字不提。相反，却对岛上自然风光之美赞不绝口。他遗憾自己不是墨

客骚人，未能赋诗吟颂。然而，他还是描写道：“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土地上，蔚为奇观地生长着千姿百态的树木，如椰子、菠萝、香蕉、肉桂及其他数以千计的树种，有的甚至将根部深扎于海中。这片繁茂的草木，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而埃里松对这块“人间天堂”之“奇观”，也不乏赞美之情。

在锡兰，蒙托邦将军从来自香港的英文报刊上获悉一个悲伤的消息：驻交趾支那的法军工兵中校戴鲁莱被炮弹炸成两段而身亡。其侄子保罗恭敬地将弹片妥为保存，以示悼念；保罗是第三共和国著名政治家、爱国诗人，创建爱国者联盟，著有《战士之歌》等。蒙托邦将军十分喜欢这个军官，因此说在“远征”筹备及计划在上海建大型军用仓库方面，失去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助手”。

蒙托邦将军一行在“复仇女神”号之后搭乘的是“恒河”号。照埃里松说来，这是一艘丑陋的小船，建造粗劣，设计糟糕，通风太差，看上去笨拙不堪，活像一口大棺材。而且“恒河”号经不起风浪。这在孟加拉湾是令人懊恼的，因为这个海湾“通常总是浪急波涌，以致我们的小船即便停泊避风也仍在左右摇摆、前后颠簸，好比杜伊勒利公园水池上一个榛子壳，到了海面上则更是胡乱晃荡”。

再者，从货舱里冒上来一股经久不散的恶心气味，令人倒胃口，处于迷迷糊糊、昏昏欲睡之中。大家都感到很不舒服，但谁也猜不透原因。那么究竟什么缘故呢？原来这艘地狱般的“恒河”号上，直至舱口都塞满了运往中国的鸦片箱子！这一发现使我们的纪实作者埃里松愤慨不已：“我们被包围在令人厌恶的黏糊糊的东西中，船上携带着疯狂、罪恶与死亡。但这批货物价值连城，意味着仁慈的英吉利将收获巨额的英镑。”

我们在马来西亚北端槟榔屿作短暂停留，观赏茂盛的草木。然后穿过隔开马来亚半岛和苏门答腊岛的马六甲海峡，成群结队的“鼠海豚、鲨鱼和会把海水吹得老高的海豚陪伴着我们”（蒙托邦语）。2月16日到达新加坡。

在新加坡，蒙托邦将军对英驻军当局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他一到达，礼炮鸣响，部队夹道欢迎，总督府邸由他支配。总督确实不在，正外出视察。对方告知将军，因有老虎出没，城中不太安全……人家果然给他看了一只死虎，体型颇大，是前夜在不远处被击毙的。埃里松则断言有幸亲眼见过一只活虎，很漂亮，关在笼子里，也是头天夜里在不远处捕获的。

在新加坡，法军将领们首次见到中国人。该城有6万居民，多为华人。埃里松在此度过了十分快活的两天，有时躺在宽阔的草坪上，典型的不列颠草坪！英国人不论走到哪

里，都善于再营造一个英式小角落。埃里松赞赏这种才能，“他们所建的农舍式小别墅，像是从伦敦郊区仔细开列构件并用大箱运来似的。一个英国人一旦能在地球某个角落生活，便在那里栽种彻头彻尾的英吉利。”

蒙托邦将军利用暂短的逗留开始接触中国戏剧。他虽然很难讲清楚戏的内容，但承认已被“一个漂亮的女演员”迷住了，尤其欣赏“她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他向陪同观看的英军少校谈了自己的观感。少校逗笑道：那个演女的，其实是男人！（的确，在中国和日本，如罗马那样，女角色都是男子装扮的。）

现在驶往香港。中国海以坏天气出名。“恒河”号航行得空前之差，并在暹罗湾遭遇到一场真正的风暴。但是，很快香港在望。2月26日晚上，终于抵港。

香港岛，1842年按《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时人口为8000左右，到1860年已增长10倍。城中类似伦敦斯特兰德、摄政街或皮卡迪莱街上那样的漂亮房子，不少银行和商行，但未给埃里松先生留下深刻印象。这和米特雷西的看法相左，他认为香港城“既大又美”，尤其港口为世界大港之一，能停泊众多船只。正是这点吸引了他：“英国人善于充分利用这个天公作美的良港，以满足通商之需，他们还把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足以满足我们就要发动的军事征战的各种需求……锚地一派繁忙景象。锚泊的军舰之间不断穿梭着汽轮、商船和满载人员的帆船。”

其实，香港是英军集聚与军需品供给之地。来自英国本土、好望角和印度的船只均在此集结。英国部队驻扎在对面的九龙，那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仪用区区500银两的年租金向清政府租用的。

香港总督鲁滨逊将港府部分公馆供蒙托邦将军及其参谋部自由使用。官邸位于维多利亚峰山坡上，由掩映于大树浓荫下的花园包围，眺望锚地一览无余。蒙托邦向好客的总督夫人拉迪诚致敬意，称其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迷人女性”。米特雷西伯爵也对总督夫人家庭主妇的优点赞口不绝：“拉迪·鲁滨逊以其精神才华、艺术鉴赏力和特有的亲切感，有效地致力于使总督府主办的晚会别具魅力和吸引力，每个晚上法、英、美等国外交官济济一堂。”来宾中有法国驻上海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及使团一等、二等秘书哥士奇伯爵和韦诺义；英国驻华使团一等专员诺曼先生（半年后在香港惨死），驻上海公使普鲁斯及其翻译威妥玛；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先生（前一年曾赴北京），以及其他使团官员等。

蒙托邦将军刚到香港，便接待了法军驻交趾支那海军司令巴热准将的来访，巴热刚刚死里逃生便前来听候将军调遣。他们商谈对华战争事宜，准将早就想亲自领导建造50余

艘登陆小艇和预制件码头。他还下令购置了4艘小汽船用以增强作战舰队，以及1艘抗季风的轮船担负大沽和上海之间的联络。事情看来进展不错。

巴热准将向将军介绍了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将军达成的一项预先攻占舟山群岛的协议；由于面对长江口，那儿的锚地舒适，资源丰富。之后，在整个征战期间，蒙托邦将军一直惦记着舟山群岛，曾梦想法国占有这些岛屿，以便与已占据香港的英国竞争。

随后，蒙托邦将军前去贺布将军的舰上，受到很好接待，就“我们的共同大事”交换了意见。将军去年攻打大沽炮台受伤，至今仍感到伤口疼痛。他详细介绍了那次招致重大损失的事件。贺布急于动手，甚至不想等英陆军司令格兰特到来了。事实上，格兰特将军于3月13日才抵华。贺布很想尽快攻占舟山群岛，这也是法国海军的愿望。

但蒙托邦将军对此提出异议。夺取舟山群岛会违反国际法，因为英法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已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对方30天内接受和平条约。换句话说，条件就是1858年所签的《天津条约》各款项，包括要求战争赔款，向法国赔偿1859年被袭击的一艘船只等。蒙托邦将军认为，发动战争行动之前，最好等候北京方面的答复。将军的谨慎使英国海军将领感到吃惊，但是后者得服从他的意志。此系法英联合行动的首次分歧。

另外，蒙托邦利用停留香港之机筹措军费，安排与国内的通讯联系等。他随后到达广州，受到“显要人物”法驻军司令阿博维海军上校的迎接。在“远征”军军需处处长杜比陪同下，他还在澳门视察了海军医院。但他更关心筹集和供应陆海军部队所需的物资与食品，如肉类、面粉、葡萄酒及朗姆酒等。炮兵所需的马匹问题，已经使他大伤脑筋了。

英国人则利用他们在广州之便大力招募华人苦力（亦称脚夫，此词源自印度），负责运送食物和弹药等。这些广东苦力每月可领9个港元，尽管这份工钱很有吸引力，人们却并不急于前来应招。原来，老百姓中谣言四起，说是一打仗英国人要他们冲在前面当炮灰，而英兵则卧在后面战壕里安稳地向敌人开枪！况且，据柯利诺将军报告，中国当局力图阻止招募苦力，“违者处以最残酷的肉刑：竹鞭抽打、火铁烙脚、斩首、绞死等”。

一个2500人的苦力队终于招成，但是苦力统统来自广东及香港居民中最危险的阶层，他们穿着滑稽可笑的制服：中式上衣的胸前和背后都画了个大黑圈，上面标有各自登记号和连队番号。他们头戴锥形斗笠，上写“C.C.C”字母（即“广东苦力队”英文缩写），全都光着脚。英国外交官郇和称他们为“怪物”。

苦力队由英国水师官兵统率。凡会几句英语的苦力即升为伍长或上士！

法国人依样画葫芦。阿博维上校也在广东招募千人的苦力队，分为五个 200 人的连，受海军上尉鲁维埃指挥。关于苦力队所起的辅助作用，海军上校巴吕这样评述道：“这些雇佣兵给予对华战争以一种特殊的面貌。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每个士兵长途行军后仍能打仗，因为他们不再像此类远征中通常会发生的那样去充当干粗重活计的人了。”而这些辅助人员经过培训也可用于交通运输、修筑工事和搭建营地及其他工作。

雇用苦力可能是在印度支那兴起的。而在华北，那些身强力壮脚夫可派更大的用场，可惜未能更多地招募。杜潘上校抱怨说：“法国行政管理的大缺陷就是在有益甚至必要的事情中往往过分看重节约。”

不过，招募于英法国旗下的广东苦力，可能不只是因充当脚夫甚至参战而出名，还由于抢劫成性、敲诈勒索，以及种种与其同胞背道而驰的癖好而恶名昭著。据说，他们离开后，广州和香港的犯罪率明显下降。

在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人们从未见过军队如此集结调动，好奇者争先恐后驾着舢板去观看那些战士。最引人注目的是范纳和普罗宾两少校指挥的两团印度骑兵。他们骑在阿拉伯战马上，像人马合一似的。他们可配带手枪和步枪，也可任选兵器，一般喜欢长矛与剑。普罗宾率领的骑兵队选自印度原有的部队，而范纳所带的骑兵队则是专为本次“远征”而刚刚组建的。

普罗宾身材高而瘦长，长得结实，很有男子气概，一副传统英俊模样。他仪表堂堂，性格刚柔兼备，但又令人猜不透究竟是其亲切殷勤抑或是坚毅果断占据上风。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范纳个子不高，蓄着浓密的胡子和唇须，几乎遮住了下半张脸，俨然一副尚武姿态。

香港居民之所以成群结队地穿越港湾来到九龙，还因为想要来观看“拔木桩”训练，就是骑兵快马扬鞭，用长枪将地上固定帐篷的短木桩拔掉。听说，漂亮的夫人小姐们竞相找点借口，前来观看这种庄严的骑士表演，特别是要看来自印度而高裹绚丽头帕的两位指挥员及其骑兵队。

九龙还是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的试用场。除靠炮门装弹这一特点外，其炮弹爆炸时 42 块弹片，使其具有摧毁一切的杀伤力。阿姆斯特朗大炮和法国制造的有来复线的山炮，在对华征战中激烈地比试高低。到底谁拥有最精良的炮兵？米特雷西在《远征中国日记》

篇末发表了炮兵少校拉里东的一篇论著，拉里东更倾向于认为法国大炮占优势。但作者不怕援引《泰晤士报》的一篇赞扬文章，该文声称“如果阿姆斯特朗炮在准确、轻便、射程及杀伤力方面占上风，那并非法国人的错……显然，阿姆斯特朗大炮是战争中从未使用过的最好武器”。

不过，阿姆斯特朗炮并不完全符合英国人的希望——发炮十下后必须清扫一遍，这在战斗中并非易事。故而法国炮手说，“这种大炮操作较难，不是适合的作战器械”。米特雷西指出，法国来复线炮不积垢，在射程和射击准确性方面均占上风，起码与英国新制大炮一样。他承认英国新式炮弹比法国的威力大，但也强调法国大炮轻便、灵活，这就抵消了英制大炮的优势。

3月6日，蒙托邦将军登上“福尔班”号护卫舰，驶向上海；他急于前去那里。埃里松记述了航行的情景：“我们在‘福尔班’号舰上，好比装在麻袋里的核桃那样摇晃了整整一周，而当船不像婴儿吊床那样摆动时，舰首俯倾冲浪，却又如鸬鹚捕鱼。”离开海域，“福尔班”号驶入长江口，沿黄浦江航行，至欧洲人租界地对面抛锚。时值3月12日。经过2个多月的飘洋过海，蒙托邦将军一行赴华之旅终于结束。眼下，只盼假道好望角、现正在途中的“远征”部队按预计于4月底5月间到达。

* * *

关于法国“远征”军出发时的情景，随军纪实作者米特雷西曾夸张地叙述道：1859年12月初，远征部队从土伦港启程。“民众争先恐后赶来送行，向象征荣誉、文明与自由的法兰西国旗再次致敬；官兵们怀着喜悦心情向他们告别。”

上了船，人们终于关注起部队的生活设施了。随军医疗队队长卡斯塔诺医生对航行条件作了如下描写：“每人夜间有位置规定的吊床睡觉；白天，甲板上和炮位之间有足够的自由活动空间。一日两餐，饭菜丰盛，……每个战士有一份酒，水几乎可随便喝，精加工的优质干菜大量供应。”

海上航行12天后，首次停靠加那利群岛特纳里夫岛圣克鲁斯港。法国副领事贝特洛热烈欢迎陆海军官兵。那里气候温和，小城讨人喜欢，居民十分好客。

柯利诺将军在漂亮的驱逐舰“山林女仙”号上，由海军准将卜罗德陪同。他知道自己决心投身的“远征”危险四伏——有海上的、战争中的、气候及流行病等方面的风险。出发时的欢腾雀跃已经消失，他感到孤独，不禁思念家人，此去可能再也不会团聚。这位自学成

才者，细心研读随身所带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他还讲述了元旦那天过赤道的趣事，即凡首次经过赤道的人均需经历的“已成惯例的趣味仪式”。“我由两个扮成宪兵的水手带到‘赤道老人’（也叫‘热带老爹’）面前。‘赤道老人’跟我说了几句严厉的话，然后命令我接受洗礼。与那些首次过赤道的人通常被泼大桶圣水不同，本人只被洒了几滴花露水。随后，我要求通过赤道。我悄悄往‘热带老爹’手中塞了几块金币，于是得到应允。”而在“汝拉山”号上的贝齐亚中校并不赞成这种习俗，认为这太滑稽可笑：“通过赤道不能被当成娱乐性消遣。这像一种相当令人讨厌的纵情狂欢，带点神话与宗教的色彩。”

过赤道后，自1月中旬至2月底，船队静静地穿越“赤道无风带”。船上出现了第一批伤寒症病人。又航行56天，好望角在望，可见背靠桌山的开普敦城。内格罗尼上尉赞叹道：“到了开普敦锚地，从未见过比这更美的景色，四周高山环抱，群峰与蔚蓝无比的天空相连。”运送部队及物资的船只于元月23日至2月15日间相继到达，平均在此停泊半月左右。冉曼准将着手设立医院收治一些伤寒病人及患发烧、坏血病和天花的病人。

开普敦，曾属荷兰，1815年为英国所占，堪为“一眼看去美不胜收”的城市。在米特雷西所著的《远征中国》一书第一卷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家家房院低矮，宽敞的花园环绕着，邻接平台。街道笔直、宽阔，十分干净。店铺像是稀奇古董收藏馆，来自非洲、印度、中国和日本及欧洲的物品应有尽有。开普敦城因其位置成为印度对英国贸易的天然货物集散地。”柯利诺则觉得开普敦是座“美丽、宽阔而舒适的城市，和英国人所建的一切一样”，“这里全都欧化，甚至有时比欧洲还欧化。惟一较为别致的街区，是葡萄牙侨民所住的地段；他们是巴泰勒米·迪亚斯发现开普敦后定居下来的葡人后裔”。

当云层把俯视开普敦的大山之巅笼罩，法国人和英国人便有幸观看素有“桌山浓雾”之称的那种气候奇观了。这座平时极为安静的城市，随着英法军舰及官员水手的到来与离开而变得热闹非凡。米特雷西觉得，开普敦似乎“成了英法备战的真正场所”。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两国士兵。蓝军装（法国兵）和红军装（英国兵）融为一体。照杜潘上校的说法，“与留长发穿紧身裤的英军相反，我们官兵剃平头、穿肥大裤子，这种穿着打扮在开普敦年轻女子中引起了混乱，她们一时以为法军中正盛行裙裤呢”！不过一阵阵雄壮的军乐声和舞蹈者们的大胆行为很快把她们吸引了过去……

事实上，正如米特雷西所述，原来这只是“正式晚宴与舞会结束时人们在频频举杯，共祝两国和谐一致及联军出征成功”。法国领事奥古斯特·奥斯曼好客殷勤，深得好评。而在“山林女仙”号上，人们也组织了盛大的欢庆活动，英国总督和法国领事应邀出席。……

阿尔芒医生记述说，“很快结成四对舞的众多舞伴，尽管船有点摆动，大家仍跳波尔

卡、华尔兹舞，男舞伴邀请那些相互熟悉的迷人女士一起跳，并一同参加军政当局联合举行的酒会，品尝两国的佳肴风味。4 时许，大家举杯畅饮，互致谢意，欢快聚会结束……”

大概据米特雷西笔记，柯利诺将军有幸品尝了当地知名的葡萄酒，如“康斯坦”（坚韧）和“沃若园”等非洲品牌酒，“尽管略浓稍甜，但实为芬芳可口”。随军牧师朱雅神甫对法国加尔文派教徒胡格诺人移居开普敦的后代很感兴趣，他们在当地拥有一些很美的农场和葡萄园，起有思念祖国的名字，如雨果、卢梭、迪普莱西 - 莫尔奈、贝朗热等……

杜潘中校认为，“这次放松令人非常愉快，它激发士气，给士兵们提供了聊天话题，以便消除旅途中的烦恼，较容易忍受在船上沦为一只包裹的命运。”

舰队又开始长途航行，驶往新加坡。船上，部队卫生状况良好，战士情绪也不错。大家尽情娱乐，打牌、玩跳棋、骨牌、罗多游戏¹⁵。舞会化装与否，均受欢迎；音乐会上还冒出了优秀歌手。文艺演出时，滑稽歌舞、喜剧、歌剧，“卖座极好”，演员脱颖而出。一位英国军官赞叹道：“这些法国淘气鬼，在船上或地上，在北极或赤道，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那样快活！”

这些消遣活动只能持续一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1860 年 4 月，“迪佩雷”号舰遭遇可怕的暴风雨，不间断地一直持续了 8 天；船只，完全在黑暗中行驶，无法保持平衡。船组人员和官兵们再也受不了，几乎全都病倒。舰长特里科刚强无比，令人佩服：连续 8 天 8 夜站在甲板上指挥，每日只休息 1 小时。经过 53 天航行，只有望水兵高喊：“见到陆地啦！”新加坡已进入了视线。

一大批各国船只停泊在新加坡掩蔽甚佳的锚地。对这块象征大英帝国实力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殖民地，法国人大为吃惊。内格罗尼上尉由于晕船，未能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在“山林女仙”号学说英语，但被新加坡所吸引，称赞这是“一座特别国际化的城市，居住着许多欧洲人、阿拉伯人、犹太人、爪哇人、马来人和华人等”。而卡斯塔诺医生则对马来人居住区尤其感兴趣。

但是，柯利诺却作过这样辛辣的评述：“新加坡居民中包括很大一部分海盗。英国商人把武器弹药卖给他们；然后，英国海军追捕海盗，夺走这些武器弹药。似乎就是这样，始终利用同样的枪支弹药，先卖掉，又夺回来，再卖出去，周而复始。这很不寻常，却完全是英国式的！”

¹⁵ 罗多游戏，一种摸子填格游戏。

香港同样使抵达的法军官兵慑服。柯利诺准将赞不绝口，和年轻的埃里松一样发表类似的观感：“这里成就的一切是个奇迹，令人赞叹。走遍世界，强大的不列颠王国的扩展能力给人以强烈印象。在开普敦、新加坡，自本人离法以来见到的如此众多的英国船只，已使我大为震惊，而在这里，我更加惊讶不已。越远离英吉利，越觉得它就在眼前……我们所走的路，似乎只是从在不列颠开始的英式之路的延长而已。每当周游世界，凡需停留之处，便可见到英国人。虽说不是只有他们，但他们却人数最多。他们主宰通商，控制海上运输。军事上，他们占据最好的阵地，最终当然居支配地位。他们轻而易举便能前往距自己国家最远的地球上的各个地点，简直使人目瞪口呆。”

内格罗尼上尉则更多注意香港完全欧化的一面。他发现，“大街小巷中只听到市民数皮阿斯特钱币的响声，他们一年到头做买卖，成天就这样数来数去”。

5月初，法军远航终于在上海吴淞口结束。这个外港位于黄浦江和长江交汇处，离市区20来公里。英国人做鸦片生意的仓库就设在那里。卡斯塔诺医生看到，锚地静静地泊着“一些笨重的鸦片趸船”，即所谓的武装流动仓库。柯利诺将军以其勇气和洞察力不加掩饰地写道：“我们的盟友在此囤积数量巨大的鸦片，然后扩散到内地；鸦片毒化中华帝国，它让英国人大发横财，从而引发战争。”在这点上，这位法国将军丝豪不再欣赏英国人！他还写道，每年有2万箱鸦片（价值2.5亿法郎）在这些建在船上的英国仓库里交易。当然将军也承认，这类“浮动仓库”里还储存有大量其他物品，如大捆丝绸、金条与买卖火爆的茶叶等。

总之，吴淞口位置理想，设施完善，易于防守。军事行动中，该港将是极佳的后方基地。

5个半月的远洋跋涉，总体上还算顺利，但人们痛惜长途航行中死去的33名士兵（主要死于伤寒），病号已送往澳门海军医院治疗。

* * *

1860年4月26日，额尔金勋爵再次启程赴华，陪同的有私人秘书罗亨利。此人后来记述了额氏第二次出使中国的珍贵史料，还写有他本人被俘关押在中国牢房的回忆。

签订《天津条约》（1859年6月26日）回国后，额尔金曾在全英受到体面的欢迎。帕麦斯顿首相举荐他出任国家邮政电报局局长，而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们则选他为名誉校长，这表明在学生中他比本杰明·狄士累利更受欢迎。诚然，他对这种荣誉以及其他敬重

并非无动于衷，然而他更看重退休，想到苏格兰自家庄园在妻子及儿女们身边安度晚年。可惜的是，接踵而来的事件为他作出了别样的安排。自英军在大沽炮台败北后，他在道义上不得不再度受命率部出征。

从外交上看，鉴于额尔金是《天津条约》的谈判者，所以必须选择他担任全权特使。4月17日，额尔金才接到外交大臣拉塞尔“传达”的正式指示¹⁶。指示包括三大要求：

- （一）中国皇帝必须就指挥大沽炮台的将领向英军船只开火行为道歉；
- （二）最终批准已经签订的《天津条约》；
- （三）向英法联军赔偿陆海军开支。

另外，嘱咐额尔金不宜过分重创清朝当局，以免其失去对全国领土的控制，何况其部分区域已经落入太平天国手中。拉塞尔大臣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还希望，额尔金在签订新的条约时要让中方割让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无疑，此系“秘密训令”，因为它们会让葛罗男爵，尤其是蒙托邦将军十分不快。显而易见，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忽略在香港地区扩大地盘的天赐良机，同时要确保英国已占领土的绝对安全。

可见，当法国人满怀激情捍卫天主教团在华传教使命之时，缺乏诗意的英国人却更关注如何在香港拓展势力范围。

英国再度任用额尔金，杜伊勒利宫并不吃惊。早在1月间，一份政府文件已经预计到这一任命极有可能。在此情况下，葛罗男爵是否也应再次受命返回中国呢？显然，面对额尔金这样的人物，布尔布隆仅以全权公使身份，有可能显得份量不够；一旦出现意见分歧，他很难在联合行动中使法国的观点占据上风。

法国政府认为与英国协调一致是必要的，同时也要表明关注其特殊利益。理所当然，这双重任务，只能靠1858年那样的人选才能完成。于是，1860年3月7日，葛罗男爵以特使身份并以皇帝在华高级专员的头衔再次赴华履行新的使命。正如1858年一样，他由使团头等秘书巴士达伯爵陪同。

可以说，曾与额尔金勋爵一起谈成《天津条约》的葛罗男爵，并不想再次远行赴华。但他的朋友额尔金再三向拿破仑三世要求，坚持要他再度携手共事。再说，英国人更喜欢

¹⁶ 详见本书附录。——编者注

职业外交官，因为外交官自然比军人更有外交手腕。额尔金不想与他所不熟悉的、况且以多疑著名的一位法国将领共事，否则他只得妥协求全了。

4月21日，葛罗特使接受训令^①，嘱咐他要与额尔金勋爵协调一致行动。训令内容与他的英国同仁所接受的类似，即要中国政府道歉，批准《天津条约》换文并支付战争赔款等。训令具体强调，条约批准换文须在北京进行；特使应受符合其身份的接待。不过，训令特别嘱咐他注意军事行动不得导致推翻大清王朝。若那样做，只会有利于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此种可能性将违背既定目标，即“与中国建立更加确定、更加规则的国际关系，以便自由而安全地进入中国内地，而这样的条件如今尚

然而，在第二次共同使命中，额尔金和葛罗的关系不如从前那么好。正如高第所指出的：“人们看到，历经八个世纪的战争与争夺仍未解决的那种古老的对立重又冒了出来。英法两国代表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再次受命共事，尽管两人交情深厚，但明显缺乏第一次出征中国时主导彼此关系的那种真诚了。”

事实上，葛罗注意到，法国新近并吞尼斯和萨瓦两地的消息，导致英法联军将官之间关系冷淡。

额尔金和葛罗同往中国。1860年4月28日，他俩从马赛上船，驶向亚历山大港，然后同坐专列火车贵宾包厢前往开罗。

到了苏伊士，额尔金向从中国回来的乘客打听消息，可是毫无结果！他一直希望事情最终顺利解决，也就是说中国人采取和解姿态，如果不这样的话，他的使命就将变得无的放矢了。

两位特使登上“半岛与东方公司”65艘客轮中最大的一艘“西姆拉”号前往锡兰。先停靠酷热的亚丁港，船要加煤。毕竟又是抛家远行，额尔金不时深感沮丧。停靠锡兰时，他让葛罗男爵去逛商店，为选购红、蓝宝石讨价还价。可是，无论在亚丁或锡兰，有关中国的消息都无法使这位英国女王陛下的特使怀有早些回国的希望。

再说，额尔金此行已显示出其变故频发的一面。5月23日，在离开加勒角开往新加坡和香港途中，他们改乘的“半岛与东方公司”另一艘轮船“马拉巴尔”号突遇狂风大浪，客轮偏离航线撞到岩礁上，船身吃水线下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水洞，浪涛袭进船舱。眼看着“马拉巴尔”号向下沉却无人来救，简直是千钧一发！船长尽管一时踌躇，但还是成功地使船在港湾深处的沙滩上搁了浅。危难时刻两位特使镇定自若，额尔金的私人秘书罗亨利甚

为佩服，曾这样写道：“全船乘客无不深受他们的影响，丝毫不害怕。在此时刻，两位特使安定地坐在船尾，谈笑风生，像是任何危险都撼之不动似的。一群妇女围在他们身边，见他俩如此沉着，便信心大增。因此，大家毫不畏惧，这多半是受他们感染的结果。”额尔金勋爵决定最后一个下船。据葛罗男爵介绍，脱险者们随后去到总督府，“尽管当时大雨滂沱，大家还是受到了争先恐后赶到海滩的人们和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葛罗特使还提到了遭受损失的严重程度：“我们的行李全都沉入海底。所有证件、国书、密码、礼服及衣囊等，全都完了！额尔金勋爵也不比我幸运，巴士达秘书什么也没有救出。我好歹还从坐舱里拿出一个小箱子和装有日用品的旅行袋！《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先生只救出随身携带的东西。额尔金却镇静得若无其事似的……”这个不幸的遭遇原本可能会以悲剧告终的！

海难过后，额尔金找回了他个人的衣物、勋章及出征“特命授权书”等物品，但是没找到向中国皇帝递交的国书。而葛罗男爵并未找到他的银盒子、首饰和现金，即约合 1200 万法郎的皮阿斯特及金条。相反，采珠人后来从船壳里发现了几箱鸦片。

客轮出事使英法特使行程延误半个来月。6 月 5 日，他们终于离开锡兰，乘坐“北京”号轮船，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于 11 日到达槟榔屿。该船仅在新加坡停靠 1 天，后于 21 日驶抵香港。额尔金得到了弟弟普鲁斯的消息，兄弟俩后来在上海相会。而葛罗男爵则乘皇家海军“西贡”号驶达上海。

第 07 章 上海为基地

选中上海

法国租界地

联军最后通牒

寻找马匹未成

蒙托邦失去海军指挥权

清廷拒绝最后通牒

蒙托邦深感心酸

首批战舰开进上海

英法占据舟山群岛

“伊塞尔”号和“快帆皇后”号沉没
抢救炮兵装置
太平军逼近上海
英法联军被困舰上
芝罘（烟台）和大连湾分别为法英军事基地 /
从日本弄来战马
法军滞后
法军决定单独行动
葛罗男爵抵达上海
俄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

埃里松首先注意到这一奇特之处：“对华战争尚未发动，但我方统帅却选上海为备战基地，即在中国大陆上，而不只是在属于英国人的香港。”另有个“奇怪”之处，他承认虽然知道要在华作战，却又不知道为何打仗……

蒙托邦将军选定上海作为法国“远征”军的基地和临时司令部，原因在于上海的战略地位和易于进入；同时也因当地资源丰富和气候宜人。

在以后发动和进行的军事行动中，上海属于理想的中心点。英法联军拟在直隶湾登陆，上海是距那里最近的城市。而且，这里四季气候温和，没有北方那样寒冷，也不像南方那样炎热。另外，还可在此修理船只、建储煤库等。

上海虽没有北京和南京那样古老的历史，但很自豪属于文化传统深厚的江南地区。上海起源于一个小渔村，与北方的北京和南方的广州几乎等距离，直至 19 世纪中叶才成为一个河运大港。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所签的《南京条约》，使上海向西方贸易开放。此后，各色人等蜂拥而至。“谁会想到这个曾经肮脏不堪的地方竟然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而且被人称为“东方巴黎”？法国作家吕西安·博达这样问道。当然，最先到上海的是英国人，随之而来的有法国人、美国人等。

上海当时划分为租界，即租让给外国人使用的领土，外国人在此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地位。人们如今尚可高兴地参观的法租界，自黄浦江边向西延伸至很远的地方，两旁栽有梧桐树的淮海路，即原先的霞飞路从租界中穿过。法租界南邻（上海县）环形城墙，北接英国租界地。而英租界加上最外面的美国那块租界在内，1863 年已成为最大的国际租界地。法国当时不愿与之并在一起。最初，法国租界地仅方圆 66 公顷，置于 1847 年来华的首任杰出总领事敏提尼主管下。尔后由其继任者之一的布尔布隆接替管

理。

因此蒙托邦将军当然会把大本营设在法国租界地，并把备战所需的各机构部门全都集中在那里。他后来在法租界住了好几个月，起初他对上海的印象并不好，最深的感受是“街道未铺石板，脏乱不堪，到处堆满城市垃圾，散发出使人恶心的气味。中国人大概对此都习以为常了吧！”

下船后不到半小时，埃里松就已到上海城郊闲逛了。初来乍到，得到的印象简直令他大倒胃口。如他所记：“进城前简单扫了一眼，不禁感到远离欧洲已两个来月了。城门上挂着五六个木笼子……里面放着一些被斩的中国人首级，样子奇形怪状得吓人，而且已不同程度腐烂。粗大的辫子从木笼子里垂挂下来，上面沾满凝固的血迹，使发辫变得亮晶晶的，招来一大群嗡嗡乱飞的苍蝇。”

与英美两国租界相比，法租界办公楼过于简朴，显得大为逊色。尤其法军参谋部的房屋很成问题。同住房宽敞的英租界相比，法租界很少有欧式住房。

1860年上海只有一家法国大商行，即1848年开设的“雷米洋行”。因此，当蒙托邦将军在香港收到雷米先生这位慷慨的同胞的“亲切的建议”，即愿把他拥有的位于黄浦江畔的这幢华宅提供给他及其参谋部使用时，将军喜出望外，当即答复接受。

据埃里松记述，这家洋行由雷米先生在上海创建，以经销茶叶、瓷器、丝绸和纸张为主，“已经使其主人发了大财”。雷米先生住在伦敦，管理在华商行；而在上海的洋行则由其侄子史米特直接经营。“史米特先生以其叔父的名义在豪宅中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情绪总那么好，说起话来既诙谐又可靠。在蒙托邦将军于此度过的6个月时间里，他先后两次在自己家里想方设法使我们大家在上海的逗留愉快。他在这里已经住了10年了，就像地道的巴黎人了解歌剧院十字路口那样了解上海”。

更有甚者，史米特先生全心全意，把在华的经验提供给蒙托邦将军，有力地支持备战事项。可以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使军需部门节约了巨额经费。“总之，他表现出最爱国最忠诚的情操，帝国政府嘉奖他，向其叔父授予荣誉勋位十字奖章……”

1860年3月8日，即蒙托邦将军抵达上海的前几天，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已向北京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该最后通牒是通过上海道台转交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何桂清的。法方最后通牒，内容词令与英方的相同，包括下列四条要求：

（一）就大沽炮台事件正式道歉；

（二）保证不给前来天津交换条约批准文书的法国全权使节及其在北京的逗留制造障碍；

（三）中国政府应保证做好交换《天津条约》批准文书的准备；

（四）缴付赔款。

最后通牒限清朝政府 30 天内予以答复。

一到上海，除诸多军需问题外，蒙托邦必须致力于解决困难的马匹问题，要从欧洲把马运来是不可想像的。他务必立刻找到 1200 匹战马，用以拖炮兵装置，运送弹药、物资和行李等。这决非易事。上海也不可能找到马匹，仅有的一些早已被英国人抢光了。况且，中国马个头太小，有的甚至比毛驴还矮小。切勿见笑，有规定说，只有至马肩隆高度达 1.30 米的才可称为马！

于是，总司令任命了一个扩充军马委员会，由炮兵上校本茨曼和其子蒙托邦骑兵上尉负责。怀着带回必需的战马的希望，蒙托邦上尉前去日本，法国驻东京总领事杜舍纳·德贝勒库也伸出了援手。可是英国人早已捷足先登。另一方面，日本当局十分勉强，先出尽难题，然后才答应卖马去践踏中国土地。最后，沃舍和雷米-史米特两家（法国）商行与日方达成协议，法国为 1100 匹马付出了昂贵价钱（每匹 210 法郎，加运费 240 法郎，每匹总计 450 法郎）。

军需助理布隆多也被派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负责买马。他带回来数百匹套车用的马和一批马车。总之，这一后勤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延误了很长时间。英军对此指责不断。

蒙托邦将军同时抓后勤、财务、营地、医院、炮兵等事务部门的建立。但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照样存在法军在上海住房不足的问题。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身边所有人都都如此。抵沪数日后，蒙托邦获悉一个关于他本人的坏消息，即他失去了“远征”军海军指挥权，而由一位海军将领接替。他现在仅任“远征”军陆军司令了，这的确是个沉重打击，但是他尽量不显得沮丧。

蒙托邦是以对华“远征”军陆海军总司令并拥有外交全权的身份离开法国的。4 月初，从陆军大臣的一份急件中，他获悉自己失去了海军指挥权。同时，据 1860 年 2 月 4

日的军令，沙内少将出任中国海域法国海军司令；并已于当月 29 日从马赛上船，正在赴华途中。

这一任命给蒙托邦将军造成了尴尬的处境：海军少将和他同级，只不过他军龄略长，故位于对方之上……但是，陆军司令不再能对海军发号施令，只能向海军司令提出要求或请求。所以，他向陆军部长抱怨道：“我只能请求、催促，但指挥不了！”

蒙托邦职权缩小，大概与英国人有关，因为他们陆海军指挥权是分开的。照埃里松的说法，在英国人看来，法国将军因其职衔和拥有的权力而显得过分强大，不易支配。但在这一问题上尤其要看到海军将领们的作用，因为他们从来不接受听命于陆军将领的做法。如海军上尉巴吕就非常看重其军种的特权；他虽说承认“远征”军权力集中肯定大有益处，尤其在远离宗主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又强调海军在对华征战中的基本作用，因此其结论是，“一切将使陆海军的指挥权分开”。另外，他还解释说，拿破仑三世不愿让法国海军将领处于英军同行之下。

指挥权的这一新划分对后来事件的发展至关重要。蒙托邦将军不再指挥海军，从此必须协调和海军将领的关系。依埃里松之见，这一新局面，弊多利少：本来写两三行字即可承办之事，现在“要恳求人家、协商、说服才能办成。简直白费时间和精力。沙内少将是很正直的人，但毕竟是海军将领，脑子里始终有这种思想——陆军长官对海事一窍不通”。

面对这些复杂而可能出现冲突的局面，蒙托邦不断向陆军部长申诉。他保证始终忠于职守，把个人问题搁置一边，而且坚信海军少将也会那样做。但他指出“我们双方的关系和所接受的命令的性质本身，可能导致对这些命令持不同的理解”。

4 月 18 日，蒙托邦将军与沙内少将首次晤面。少将是个有名望的海员，为人耿直，十分随和。此外，他对中国诸海了如指掌。看来蒙将军运气不好……沙内少将以“欧仁妮皇后”号驱逐舰为旗舰，参谋长是罗丰 德拉德巴上校，下辖巴热（已取代里戈任交趾支那海军统帅）和卜罗德两准将。

蒙托邦曾经提出统一指挥权，并以此作为他接受“远征”军统帅一职的先决条件。可以想像，对肩负这一使命，他或许会感到遗憾。但身为严守军纪的战士，他绝对服从命令。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如果我对个人的自尊心不加克制，那势必会影响远征的成功。”

不过，对华“远征”军统帅毕竟是统帅，他必须继续履行使命。他责成卜罗德海军准将对北直隶，即直隶湾进行新的侦察，为今后登陆作好准备。他发现太平军的威胁可能会使华北军事对抗复杂化。上海道台派人请问蒙托邦将军可否派其部队占领通往法国租界的城门。对这种奇怪做法，他甚为诧异：“本人是来上海筹划打击清政府的，却竟然受请充当这个政府的捍卫者，以对付其内部敌人。”

将军改组了与本国进行通讯联络的系统；兴修了一个教堂、一座医院，后者是他一直大力倡导的。这座临时战地医院设在遣使会教团附近，并得到该会支持，不久便拥有两百余张病床。布尔布隆夫人为医院落成剪彩，并任战时主管，负责一切人道事务。后来，上海军医院提供了巨大医疗服务，救治了由医疗舰从舟山群岛和直隶湾送来的许多伤病员。1862年6月“远征”军结束使命撤离回国后，这座临时医院改为常设医院，划归海军主管，是法租界较为出名的机构。

蒙托邦将军用少有的闲暇时间和下属军官们到骑兵经常聚会的跑马场去骑马散心。他也出席布尔布隆夫人举办的招待会，像所有人一样夸赞女主人的优雅和智慧。

他还要求耶稣会和遣使会的神甫们利用各自的途径了解大沽炮台的情况。他再次研究对舟山群岛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但他更多考虑把直隶湾南部的芝罘半岛当作联军登陆前的临时聚集点。4月底，收到冉曼准将当月3日从新加坡发来的快信，带来了关于法军舰队情况的令人放心的消息，参谋部大大松了口气。至于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则带着其夫人……及大提琴，乘坐“格拉纳达”号于4月初抵达上海。

不出所料，英法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3月8日呈递中国皇帝的最后通牒，于4月8日遭到拒绝。当然是皇家口吻！中方在答复中，试图分化联军，把前一年6月事件的全部责任归罪英国。既拒绝对大沽炮台发生的事件道歉，也拒绝法国提出的赔款要求，同时提醒英法联军注意再次攻打大沽炮台将会带来的后果。中方还认为，提出让西方使节常驻京城的要求是“不顺从而荒谬的表现”。

面对中方的拒绝，而且其口吻“如此不能令人接受”，英法双方于4月14日在普鲁斯住处开会。出席的有两国公使、蒙托邦和格兰特两将军、巴热和琼斯准将（后者代表正在香港的贺布上将）。立即封锁华北海岸的主张被排除了，因为这一措施达不到使北京闹饥荒的目的，还会损害外国商业利益。相反，攻占舟山群岛则被定了下来。

拒绝英法最后通牒，即使暂不导致正式宣战（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正式宣战，正如1840年鸦片战争那样），起码标志着对抗的开始。普鲁斯和布尔布隆联合起草了回复北

京的信件，表示将由双方陆海军司令们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以迫使中国政府遵守承诺，向英法两国给予应有的赔偿”。

因此，要由联军将领通过武力，继续争取两国外交官未能达到的一切。法国驻上海使团一等秘书哥士奇4月22日写道：“犹豫不决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该大炮来说话了。归根结底，大炮才是这漫长而艰巨谈判的有力的外交官。”

任命沙内为“远征”军海军司令，并不是蒙托邦将军痛苦的结束。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将作为特使前来中国，负责军事行动结束后重新与中国人谈判议和事宜。听到这一消息，人们可以想像将军又会沮丧、心酸到何种程度。日趋严峻的局势，促使伦敦和巴黎决定把军权与外交权分开。而蒙托邦不明白的是，既然布尔布隆和普鲁斯已在任，又在现场，再派葛罗来华有何用处，额尔金也一样，有何必要！他认为，法国驻上海公使十分“卖力”地支持国家的事业及利益，普鲁斯也同样如此。

随着葛罗的到来，蒙托邦将军作为军事统帅的职权逐渐丧失，他从此再也不能独自决定法方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或结束了。而且如埃里松所言，“这位特使是葛罗男爵；而葛罗男爵尽管是地道的法国人，而且非常爱国，却是英国特使的知己，如果不说是附庸的话”。在他看来，面对额尔金，葛罗份量不足，“额尔金是个很有才华的人物，十分精明的外交家，拥有王国所授全权。他在中国待过，非常了解天朝，中国人也熟悉他。代表法国与他配合的外交官使命艰巨，本该要更年轻一些的人，非常熟悉事务，精力充沛，既刚毅坚强又诡计多端……而葛罗男爵从业生涯行将终止，可谓为国尽职，功勋卓著。他也在中国住过，正好与额尔金常在一起，惯于把后者视为良师、益友和领路人。他年老体衰，再加上他的老关系，这使他在神气活现、由将领们骑马同行的那个大老爷旁边只起无足轻重的作用，并只得坐轿子跟在后面。”

埃里松因爱戴蒙托邦将军，故对葛罗男爵严厉看待，甚至极不公正。其实，葛罗特使是个非常正派的人，足智多谋，精明强干，而且为人谦逊。决策时刻，他决不会取代蒙托邦将军。相反，他经常争取蒙托邦的支持，以对付英方的傲慢做法。在这方面，蒙托邦将军大概算走运……尽管如此，将军还是觉得受骗似的。

布尔布隆公使也同样感到心酸。因为正如高第所指出的：“自葛罗男爵离任以来，他一直在领导处理那些棘手的事务，如今他得经受被吊销这种领导权的屈辱。”在致外交大臣的一封快信中，布尔布隆并非不带抱怨情绪地表示，他“注意到两国政府意在再派《天津条约》签字专使，重掌两年前他们如此令人遗憾地留下的未尽事务”。

关于再次任用两位特使的重要性，布隆戴尔将军这样强调说：“重派这两位人物前来，已使这次远征的特点有所改变，变得外交重于军事。”他还透露，甚至有过考虑，一旦蒙托邦对自己职权缩小极不正确地看待，那就提请由冉曼将军取而代之。

法国“远征”部队经过数月海上航行，开始陆续抵华，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全都良好。1860年5月1日，两艘运输舰“敢闯”号和“加龙河”号，在吴淞口抛锚。法“远征”军副统帅冉曼将军及同行的第101团千余官兵踏上中国土地。埃里松写道：“我军将士经受住远航考验，可钦可佩。他们安全抵华，身心状态良好，像燕雀般快活，准备捉弄并打垮中国人。”航海中只有33个战士死于伤寒症、败血病或天花。

英法联军对中国的战争行动可以展开了。占领舟山群岛将是交战第一幕。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曾经攻占这一战略要冲，用作军需供应基地。英法都对舟山群岛垂涎三尺，他们竞相前去，是为阻止对方独吞……法国人是为了到一到场，暂时只把它当作一个据点，以保卫进入长江和上海的通道，同时作为休整基地。

4月18日，英军派出2000人马，从香港启程，由格兰特将军亲自率领前来。法军仅派出2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由巴热准将带领从广州赶来。简直是普通的军事训练。4月24日，联军竟然未放一枪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舟山首府定海。其实，清朝地方官因有1840年的经历，已被这次英法炫耀武力所震慑。

占领定海导致联军之间发生了一个象征性的生动事件。在俯视该城的丘陵山顶有座炮台，竖有两根明显可见的旗杆，而一根比另一根高。法军士兵抢先上去，把三色国旗升到最高的旗杆上！随后英军士兵经过努力，好不容易找到一根更高的木杆勇敢地挂上英国米字国旗。格兰特将军讲述这一故事时指出，这纯系联军之间逗逗乐而已。但法国人却不那么看，他们一直在找更高的旗杆飘扬国旗呢！旗杆小争执到此作罢！

蒙托邦想让卜罗德准将留守舟山，因其级别可以镇住英军，英军在那里派驻了一位上校旅长。但这一考虑遭到沙内少将拒绝。蒙托邦只好屈从，苦涩滋味可想而知。高级官员美理登男爵本已被任命为特派员，但不久被召回参加华北之战。他确是宝贵人才，操一口流利汉语，很多场合需要他少有的翻译才干。5月初，蒙托邦将军前去定海视察，受到巴热准将迎接，他一路夸赞巴热足智多谋，处事谨慎。马狄良（马丹·德帕利埃尔）上校被任命为驻岛法军指挥官，受英军旅长里维指挥。

不久，马狄良上校得到增援，向海盗发起清剿；海盗中有个臭名昭著的英籍水手，

中国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大概叫“福鸡汤”（Fokie Tom）。这个大海盗及其美貌的马来亚夫人被俘，其 26 艘帆船被缴获，另有 6 艘烧毁。但英国人却含沙射影地说，船上许多海盗帮凶得以逃脱，是因为法国人的过失。

蒙托邦将军回到上海，很高兴看到运送部队和作战物资的船只陆续抵达吴淞口，其中有 5 月 19 日抛锚的“山林女仙”号，柯利诺将军就在船上。然而在上海，也有两个坏消息传到法国人耳朵里。一是“伊塞尔”号在台湾海峡对岸厦门港沉没，一是“快帆皇后”号失火。

“伊塞尔”号 12 月 9 日离开土伦，运有部分野战医院设备和营地物资，特别是 88 箱炮兵用的马具等。当听到法军船只在厦门出事时，参谋长施密茨中校因拜访贺布上将在香港，并不知详情。于是，施密茨赶往厦门，只见“伊塞尔”号船首朝天，船尾沉海。他曾写道：“没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这艘漂亮船只的后部全沉入水里，直至发动机烟囱，好凄惨的景象！由于涨潮浪急，所有船舱全都涌进海水，舱内物品与各种碎片残屑飘在水上，甲板已完全掀掉。只有等退潮后才能下到舱底干活。”

施密茨中校下令把淹在船底的马笼头、鞍辔、胸带等皮具一一捡起，放进盛满烫油的大盆里，进行抢救性清洗。尔后，炮兵在上海接收这些马具，加以晒干、上油，并修理，使之全部复原。埃里松概括说：“没有大炮难以征战；没有马具，便无大炮。”米特雷西也指出：“抢救炮兵马具，方便对华征战得以进行；若失去这批军需，则将延误征战。”而“伊塞尔”号运送的 400 吨大炮火药，显然损失了。

继“伊塞尔”号在厦门沉没后，6 月中旬又传来使法军参谋部痛上加痛的不幸消息：“快帆皇后”号因起火在澳门岸边失事。这是一艘漂亮的运输船，租来的帆船。于元旦那天启程，主要运送工兵和炮兵，船侧装有替换衣服和宿营物资，特别是野战医院用品（可收治 500 病人的医院及兽医用品）。事故原因完全系不慎失火：负责分酒的管理员下到贮藏室时，不提合乎规定的马灯，而是手举一根蜡烛，于是引起火灾。大家全力以赴，千方百计灭火，未能奏效。眼见灭火无望，船长于是紧急把船驶至澳门附近搁浅。全部物资焚毁，但船上 450 名官兵则全部安全撤离。

蒙托邦将军随即致书巴黎，要求紧急运来替用军需、人用及兽用药品、过冬衣服和鞋袜等。

英军方面，只损失了一艘运输船，即那艘漂亮的、在香港水域触礁沉没的“援助”

号。

法军统帅蒙托邦也获悉太平天国起义令人局促不安的消息，临近上海的几座城市已在太平军和清军之间几易其手。太平军攻占了扬州、无锡等丝绸产地，这些丝绸是出口欧洲的；位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另一丝绸之都——美丽又富庶的苏州受到了威胁，5月24日连遭双方军队的抢劫与火烧！百姓遭殃，生灵涂炭。清军名将僧格林沁，因受兵勇逃跑之累而显得束手无策。这位名将，联军不久就要在华北与他遭遇了……在上海，人心惶惶。该城聚集的财富只会引起强盗的垂涎；加之太平军就要打来的消息四起，全城恐慌情绪大增。因此，尽管采取了防范措施，百姓还是竞相逃往黄浦江对岸，或躲在帆船上而且把贵重衣物也堆放在船上，蒙托邦惊讶地说，“如此场面，从未见过”。埃里松补充道，上海许多市民还躲进欧洲国家租界地，“甚至要求这些来华攻打他们皇帝的士兵的保护”。

除外国租界地外，上海简直成了一座空城。然而，倒霉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依然可怜地躲在里面。上海道台则向英法公使恳求西方援助，以试图避免曾在杭州发生的抢劫和屠杀。作为代价，蒙托邦要他在城北法租界对面开一道新的城门，以方便法租界与上海发展通商关系。这种要求过去一直被中方回绝，这次终于被接受了。此门由道台衙门出钱兴建，后取名蒙托邦门。

吴淞口基地及其众多仓库与煤场同样面临威胁。上海道台也来求法国海军的保护。在上海，英法俄美等国采取严密措施保护租界地。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们任命两名高级指挥官负责保卫上海及其洋行。一位是加斯科瓦涅上校，带领900名英军士兵；另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的法布尔上校，带领300名法军士兵，两支部队驻守在原地，另外还组建民兵队。位于城外的徐家汇天主教教会目标太明显，因此备受保护。渐渐地，一种暂时的平静出现了，暂时平静！

对上海市民因太平军逼进而产生的惶恐情绪，布尔布隆公使夫人卡特琳曾作过十分生动的描述。

5月份，法国军队继续抵达吴淞港，并依然留在舰上。他们已在海上远航数月，本希望一抵华就下船到陆地上宿营。可是，无法实现。照医疗队队长卡斯塔诺医生的看法，这样做自有缘由，即“我们受到一种人所皆知的疾病的残酷折磨，而且只能怀疑大概受了天朝人中的某些影响”。

卡斯塔诺大夫想说的是梅毒，“这在中国，系特别令人厌恶、极为严重的病症”。他

认为，“让我们士兵与当地人接触，等于眼睁睁看着他们全都住进医院。事实上，令人担心的是，面对极易接近的华人女子，远航半年、成天吃船上刺激性食物而无所释放的士兵，一下船便会把军纪忘得一干二净”。¹⁷

这种情况不利于健康，因此不能持久。于是，法军陆海军将领想去直隶湾找个登陆的好地方。卜罗德准将派人去侦察了一番，胶东半岛芝罘（今烟台一带），看来将是法军集聚的最佳基地。此地距最终登陆点（尚待确定）很近，具有天然屏障，令人感到舒适，供水充足，非常适宜安营扎寨。沙内少将和蒙托邦将军一致同意尽快驻扎芝罘。不过，为了协调行动，尚须征得英军赞成。

法国“远征”军陆海军两司令的参谋长施密茨中校和海军上校罗丰同往香港，拜会英军两司令格兰特将军和贺布海军上将。双方5月20日工作会议进行顺利。会议决定，采取行动之前，两军各自集结于用作军事基地的两个地方。这样，法军按自己希望的那样，前往宽阔的直隶湾南入口处的芝罘完善备战，而英军则开到直隶湾另一侧的大连湾集结。两军聚集地相距仅80海里，而且有利的是，与白河口同等距离，即200海里。

蒙托邦将军前去吴淞口视察仍在船上的部队，向他们宣布即将开拔的消息。卡斯塔诺医生欣喜地写道：“士兵们已到了原先料想的远航的极限，担心在地球上最单调的港口之一长期呆下去，全都愁容满面，忧心忡忡。当得知登陆地点刚已确定，而且就要前往那里，无不兴高采烈。”冉曼将军率部启程。

柯利诺将军向上海告别。行前，他特地游览“最典雅的公园”（现为城中闻名的“豫园”），而且还在“两个年轻的快乐之友”——即公使馆秘书韦努耶及一名译员的陪同下，身着中装，去逛夜景。对这梦幻般的夜上海，尤其是那些奢华的寻欢作乐之处、奇特的伤风败俗的场所以及鸦片烟馆，他的描写可谓淋漓尽致。

6月6日，法军舰只驶抵芝罘。士兵们将在这里停留7周左右。那里锚地呈圆弓形，相当可靠，位于山东半岛东北边。山东堪为文化灿烂的省份，以孔子和孟子的故里而闻名于世。首批登陆部队一上岸，不禁齐声高呼“皇上万岁！”德拉格朗热喊道：“法兰西国旗在中华大地上飘扬！”轻步兵竞相快步爬上山丘，安营扎寨。不过，在烟台漂亮沙滩附近的村庄，一些法军士兵的放纵行动立即受到惩处。

巴吕写道：“尽管有些横行霸道之举，但中国人看见法国人到来并不在乎，而且肯

¹⁷ 这里所说的“华人女子”，实际上是指娼妓，因为中国女子通常都是谨慎、克制和持重的。

定毫无恐惧感。”随着信任感的确立，又为利益所驱使，一些中国人很快开起供应充足的农贸市场，时鲜的蔬菜水果，猪禽鱼蛋，甚至野味，应有尽有，老顾客们慷慨付钱。对当时的生动场面，巴赞库尔这样描述道：“中国人与我们的士兵，尽管各说各的语言，彼此却全都能领会意思。所有交易全凭手势。看着这类地摊小贩们如此快速地讨价还价，的确是件好奇的事儿。相互明白多少，领会多少，其实无所谓。”英国随军医生芮尼也去过现场，认为中国商贩会讲一些汉语法语混在一起的话，他把这种语言称为“鸽子法语”（Pigeon-french）。

此外，营地也令人满意。军需助理杜比负责后勤管理，一个宽敞的野战医院落成，“这个真正顺应天意的地方”使卡斯塔诺队长喜出望外。在芝罘，一切尽有，十分富足。饮水优质，空气有益健康，因受海风影响，天热时气温 20°C 至 30°C，十分惬意。

整个 6 月，登陆准备一直持续着，炮兵和工兵仓库业已建好。作战物资和山炮等不断运来，就等马匹了……十来门拆卸后从法国运来的平底炮艇已经组装完毕，并配有 36 度有膛线炮。在离祖国如此遥远之处建起这个法兰西小小一角，生活安顿下来，过得宁静而舒适。埃里松形容道：“溪流沿岸，留小胡子的‘洗衣妇’们，正在擦肥皂，捶衣服。”

6 月间，1000 来匹战马终于从日本运抵吴淞口。看来日本小公马确实不喜欢海，横渡之中，死了不少。对此，杜潘上校大发雷霆。法军运输手段本已有限，损失这些宝贵的马匹，实为严重。他批评“法国政府过分精打细算”、“强调整节俭”，只租帆船运送战马，而不租费用虽贵但速度快得多的火轮。他还指出，人所共知，没有比微小节约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的了。他还指出，小节省、大破费，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

谈到节约，格兰特将军讲了一件事。他听说法军需要炮兵马匹，便向同僚蒙托邦出让在上海弄到的 170 匹很好的小型马。蒙托邦起初很愿意接受，后来却只得放弃，因其参谋部持保留意见，认为这批马要价太高。格兰特正确地补充道，这种微小节约将使法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延误。法国人确实应该为拒绝盟友的建议而遗憾。

来自日本的马匹到岸时状态相当差。海上航行使它们变得狂暴，以致把帆船货舱所有隔板全都冲破，在里面乱跑！把它们弄上岸来并非易事。接收马匹的炮兵们却很快活。一些人在将马从船上赶入水里之前就“像在南美洲潘帕斯草原上那样”去套它……以致他们自己也游着爬上岸。另一些炮兵，对于这种奇特的卸货方式感到快活，等着降住马、拴住马。可是，这些勇猛的日本马已成野马，相互争斗，到处乱咬，不让人接

近……大家对降服这些马匹失去了信心。

然而，本茨曼上校的士兵们创造了奇迹。绝大部分日本马终被驯服，仅有少数不可制服的被送去屠宰。驯服的日本马，加上从马尼拉买来的马匹，最后全都按预期目标派上用场。人们尽可能早地将其运到芝罘基地，不过，还是迟了一些。

法军备战迟缓影响了开战，而且这一问题在整个征战过程中始终存在。法国人自有其托词，如部队全部来自本国，缺乏可提供资源的行动基地（如英国人有印度、开普敦和香港等），2艘军舰失事沉没，缺乏炮兵和运输所需的马匹等。但是时间紧迫，军事行动至迟务必于10月底结束。如果联军要在直隶湾不冰封前重新上船撤离，那么务必在11月中旬前进行。华北冬天格外寒冷，联军司令官们对此十分清楚。

万一战事因诸多原因而旷日持久，那只能让部队留在华北过冬，如在天津。但这会带来种种麻烦，种种可想而知的问题和危险。且不说官兵们的不满，因为他们没有谁想在当地过冬。若待来年春天再打仗，就会遭遇恢复元气的清军。可以说，在这种特定场合下，对华“远征”可能会灾难性地结束。

关于这一切，联军一目了然。特别是法军参谋部对1812年俄国之战记忆犹新……蒙托邦曾不断强调不能在这里重蹈在莫斯科的覆辙，哪怕规模较之略小！联军将领们也清楚，清廷将尽全力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争取时间，以把英法部队拖住，迫使他们就地过冬。

法军动作严重迟缓，英军有理由为之担心。他们自6月中旬以来就已准备就绪，并认为有利于军事行动的数周好天气已经白白错过了。对于法国人一再要求的延期，英国人在“远征”记叙中可以说讽刺、嘲笑、生气、愤怒与焦急不安兼而有之。他们认为，法国盟友总那样不守时，不是认真办事的人！

6月18日，英法联军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格兰特和蒙托邦将军、海军上将贺布和沙内，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公使，以及双方联络官弗利上校和雷布尔指挥官等。会议主要商议联军部队登陆的准备事项，此系发起军事行动的第一步和首要阶段。但是，在何处、何时登陆呢？蒙托邦宣布，法军打算在白河南侧登陆，并沿河而上直至大沽炮台。

格兰特认为法军的登陆计划太冒险，强调在无停泊处的海岸登陆困难很大。他还指出，法军步兵会面临听任清军骑兵摆布的危险。因此，他提议在白河之北登陆，那里海

水深，利于舰队停靠，而且可夺取北塘镇，使之变成今后作战的基地。他还建议，法军从后面攻打大沽炮台，并断言炮台抵抗一阵即会陷落。

但法军主帅坚持自己的立场。很明显，他想单独行动，私下的算盘无疑是要单枪匹马夺取大沽炮台以独得最大的荣誉。当然，也是全为法兰西帝国争光！因此蒙托邦提议联军行动按此方案进行：“各自为战，各负其责。”格兰特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既可完全自由地按自己的方式作战，又不受法国人拖累，他何乐而不为。他觉得自己的力量足以办到这一切。何况，他想心满意足地看到盟军自食其果呢！

然而，听到蒙托邦声明 7 月 15 日之前不准备开战，格兰特十分不满，因为他希望 7 月 1 号起开始动手。他担心碰到雨季，路面被淹，妨碍部队行进。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同样别无选择。有训令约束他，必须与法军联合行动，因此必须“耐心”等待。

于是，英法联军决定分头登陆，地点各异。英军于白河北侧 8 海里之处，法军于南侧 12 海里之处登陆，随后同时向大沽炮台进发，最后在那里会师。卜罗德准将侦察地形后得出结论，靠近白河南侧的海岸登陆相当困难，但依然可能。而最后的侦察仍须由法军完成。

蒙托邦将军前去看望 6 月 28 日刚到的葛罗男爵。男爵经历了一次变故频发的远航后显得颇为狼狈。他乘的船在锡兰触礁沉没，这对他这样年高体衰的人确实是个考验。“他简直像个被抢得精光的人，垂头丧气地到了中国”，埃里松这样说，未免夸大其词。

葛罗一到上海，便发现满城空巷，因为尽管这个城依然受英法军队保护，市民却因已控制全省的太平军的逼近而吓跑了。继蒙托邦和埃里松之后，他也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汇报了这种令他震惊的反常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叛军已兵临城下。市民惶恐万状，纷纷要求我们的保护。因而我们可能将陷入这种奇怪的处境，即在南方我们要维护中国皇帝，而在北方则要打击他。在这个奇怪的国家，一切都不正常！”但他表示，反对联军在上海城外攻打太平军。

鉴于清朝当局正式回绝英法最后通牒之后又一直沉默，葛罗便很快采纳了联军将领们制定的军事打击计划。其中包括：

（一）从后面攻打大沽炮台（以免重犯去年的严重错误），并夺取之；

（二）占领炮台后即应恢复白河口至天津的航运。随后拿下天津城，使之成为联军

部队集合处与巩固的作战基地，并保持与各自舰队的联系；

（三）在联军威逼之下，迫使清朝政府再开放一些口岸。

不过，在葛罗看来，发起军事行动已刻不容缓，因为再往后拖延，天气就要冷了，而且英军对法军动作迟缓不耐烦了。他已在天津两年前住过的“衙门”设了使团处。

这便是葛罗在其《黄皮书日记》中的联军行动计划。不过他曾表示，担心出现一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性，即清朝皇帝出走关外。故他主张打到天津即停下来；后来他对额尔金说，停在天津，“威胁比攻打更厉害”。

布尔布隆公使把外交档案移交给葛罗特使，后者决定把二等秘书韦努耶带走，而让一等秘书哥士奇伯爵与布尔布隆一起留在上海。但他正等着从香港来的另一位通译艾氏神甫。

离上海赴芝罘前，法国人结识了俄国驻京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他正好乘护卫舰从直隶湾来沪。俄国因与中国一直有通商关系，故已在北京设有使团，挂俄国旗，着欧式服饰。可以说，尼古拉·伊格那替叶福是惟一以沙皇驻大清使节身份获准驻京的欧洲人。获悉英法联军抵华的消息后，他把一个宗教和科学使团留在北京，自己由几位副官和专员陪同，来到上海。

肯定是误会，英国人怀疑是他导致了他们一年前攻打大沽炮台的失败，故一度把他排斥在外。伊公使自然转向法国人，况且他还操一口流利的法语。英国报刊为替英军大沽要塞惨败辩解，确曾散布流言，说什么中国防卫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俄国军事教官出主意的结果，俄国以此报了塞瓦斯托波尔一箭之仇……

俄国公使告诉哥士奇伯爵说，他曾劝告清政府适可而止，并向其阐明了其行为的过分之处，但没有成功。他说清政府中主战派完全占据上风。更何况僧格林沁作为军事统帅坚决要打，借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因此，他建议英法联军狠狠攻打大沽炮台，以便挫败清廷主战派。除提供了关于皇帝近臣及清军军事统帅的有益情报外，俄公使还详细地介绍了大沽炮台的设防情况，火力配备和兵力位置等。同时，他建议蒙托邦将军在大沽北面登陆，并赠送了他亲自绘成的宝贵的北京地图。

布尔布隆同样佩服这位俄国将军外交官的品格，待人亲切、谈吐率直。他从其身上看到了“他那个阶级的俄罗斯人那种与生俱来的礼貌谦恭和讨人喜欢的外交手腕”的表

现。据布尔布隆说，伊将军告诉他，在所有他与之打交道的中亚地区各国政府中，他“尚未发现在履行承诺时有谁比得上北京政府更狡猾奸诈，口是心非，言而无信。而这一切，是他到北京任职 10 个月中，从北京政府身上感受到或是观察到的”。依他之见，“唯有以武力严厉教训一下”，才能促使这个“自命不凡、惯于欺骗”的政府放弃老一套做法，承认与欧洲国家的平等关系。

不过，伊格那替叶福劝告英法联军避免“打击过分严厉”，如果占领北京，那样会导致清朝垮台，使中国陷入有害西方商业利益的无政府状态。他尤其提醒他们不要在中国人面前显得有分歧；人家巴不得他们如此，以分而治之。

尽管一些将领对伊公使存有戒心，但他出的主意毕竟很宝贵，是对联军利益友好的表示。俄国公使还将去芝罘拜会蒙托邦将军。鉴于处在中立观察员地位（起码理论上如此），俄公使在北京起着重要的顾问作用，直至“远征”结束始终如此。显然，这种态度有利于他为本国捞取巨大的好处……

在此期间，据圣彼得堡内阁的旨意，伊格那替叶福向法国人表示，身为“和平见证者”，可随时提供“外交帮助”。他声称，既对大清持“完全谨慎”的态度，又“真诚同情”杜伊勒利宫和圣詹姆斯宫两内阁的目标，即促使清朝政府遵守已签订的条约，消除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隔绝的壁垒，在幅员辽阔物产富饶的这个国度扩大对外通商关系，给予传教士以有效保护，并为基督教发展提供方便。

俄国公使还表示，他感到遗憾的是，清朝政府至今仍蛮不讲理，对英法列强的要求不予理会。但他解释道，可惜去年发生的事件使事态有所改变。因而“清廷高官才更加顽固不化，根本看不清已面临灭顶之灾”。这便是伊格那替叶福深思熟虑的分析。总之，他装出一副英法联军盟友的样子，保证要将有关看法告知北京朝廷。

第 08 章 直隶湾备战

蒙托邦前往直隶湾

格兰特将军到访

蒙托邦在大连湾拜访格兰特

邓恩少校对法军迟缓大为不满

一次有益的侦察

法军决定与英军同在北塘登陆 联军兵力情况

7月2日，蒙托邦将军依然登上“福尔班”号，驶往位于直隶湾的芝罘。那里有6000人马（其中5000步兵和千余炮兵）正等着他。将军必须让一批分队留守上海、舟山、广州和澳门。6号那天，风和日丽，他一抵达，就为锚地的面貌所吸引。对法军营地，卡斯塔诺医生作了这样的描写：“所有步兵和炮兵部队几乎全在平原上安营扎寨；各营轻步兵安置在形成半岛的丘陵一带（后取名莫纳山）；司令部设在位于海岸制高点的一座寺庙里，整个营地尽收眼底。后勤管理仓库及办公室建在海滩附近，便于军需物资装卸。”

所有设施大多用石头砌成，蒙托邦对此也很满意。见部队士气高昂，他向冉曼和柯利诺两将军表示祝贺。他还查访医院，当时仅收治60来个病员，其中“28个染上花柳病”。他也不错过参观那个诱人的好去处，即法军营地附近中国人开的集市，那儿货源充足，顾客拥挤，每天清晨5点至下午5点开放，昼夜则全由法军宪兵监护。见此情景，他不禁感叹道：“亨利四世已被超过了，我军士兵天天炖鸡吃！”

7月10日，在法军主帅身边的英方联络官弗利上校（蒙托邦称赞他为“典型绅士、优秀人才”）的安排下，英军司令格兰特将军由参谋长陪同，以英法亲密同盟的名义，前来芝罘拜访蒙托邦将军。

英国人怀着好奇心，很想看看经好望角绕了一大圈，飘洋过海而来的法军官兵状态究竟如何。对于听说从日本弄来的那批野马，他们也在思忖究竟与什么样的牲口相像。

格兰特将军受到最殷勤的接待。他们先开了两小时会议，午宴后，英军司令要求参观法军营地。军乐队演奏《女王颂》，英军来宾十分赞赏。格兰特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架桥兵所建的那座80米长的比拉戈式桥^①。格兰特还要看炮兵，列席2公里射程有膛线山炮发射演习。见那些日本马训练得那么好，他大为吃惊。埃里松曾记道，格兰特将军说了好几遍：“怎么！这就是那些日本马？真不可思议！”

蒙托邦深受鼓舞，当即下令向驾辕之马鸣炮11响，接受炮火的洗礼。竟然无一匹马失足！格兰特离开时，对“所看到的一切喜出望外”，随即邀请法军同僚后天前去北面的大连湾回访。在蒙托邦看来，当天确实美好。次日，他对自己竟敢下令在这些未受过战火锻炼的马匹面前开炮深感惊讶。他这样说道：“我真不知道这些马当时镇定不动，是因为天生沉着呢，还是害怕而使它们动弹不得！”

对于法军芝罘营地设施，随同访问的英军中校吴士礼赞不绝口。

英军 6 月 26 日起陆续抵达大连湾。那里距旅顺口不远，是满洲地区辽沈半岛美丽的海湾，恰与芝罘遥遥相望。布隆戴尔将军对这块地方描写道：“……尽管略受东南风影响，仍不愧为一个漂亮的港湾。它宽约 8 海里，长十二三海里，有上佳的宽敞的锚地，且有许多小湾，利于船只在任何恶劣天气时躲避。”英军在那里毫无困难地登陆，并在邻近三个港湾驻扎下来。大部分士兵来自印度，系镇压印度起义结束后奉调前来。英军人数多于法军，马匹不算，英军还拥有更多的资财。

到了大连湾，蒙托邦将军也怀着好奇心了解就要与之协同作战的英国盟军的实力。他详细介绍了参观英军营地的情形，有时虽不免带点挑剔的眼光，但并不妨碍他对英军的阵势留下强烈印象。

在沙内将军陪同下，他登上英军旗舰，受到贺布上 将和格兰特将军最殷勤的接待。他几天向前到来的额尔金特使问好，额氏决定陪同参观。大家同乘小汽船到港湾对岸看骑兵营地。

蒙托邦身为出色的骑兵将官，用不着人家请就跨上一匹阿拉伯骏马；这勾起他对驻留阿尔及利亚 27 年的回忆。他写道：“我们快速来到成散兵线战斗队形的骑兵和炮兵面前；这些部队非常漂亮，服饰完美，装备精良，坐骑优越，显得纪律严明，英武善战。”

蒙将军作为行家，夸赞女王龙骑兵着红装很端庄，即便他后来写道：感觉龙骑兵显得“有些死板”。他还认为，印度锡克骑兵固然善战，但缺乏天赋，总的说来不如阿尔及利亚骑兵！正如蒙托邦将军和米特雷西所说，范纳和普罗宾少校率领的骑兵队，重新推行已在香港实施过的做法，强化“拔桩”训练，可收效不大！同时，他们也练额尔金所说的“力气活儿”：飞马挥刀劈柑橘。

法军司令想看英国人为之自豪的新式阿姆斯特朗大炮的实弹表演。年轻的炮兵上尉布拉巴宗（此人两个月后阵亡了）当场演示，但发炮准确度并不使蒙托邦将军信服。他认为，法军小型有膛线山炮射程达 2000 米，远比英军新式大炮优越。最后，他参观了运马船只及马厩舰，这些船只的设施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这样记道：“我终于明白，从如此遥远之地运来的军队，其军容怎么竟和海德公园检阅时一模一样。”

他发现英国人很有办法租用如此昂贵的运输工具，他们在这方面并不那么斤斤计较。其实，英国海军觉得运送部队及战马，本属陆军承担之事，由他们负责有损其名声。而法

国海军，对运送陆军这种苦差使，不会不乐意承担……英军半数以上从印度部队抽调，其余来自本土，三艘专用大船足以将他们运到。

参观英国军营的一天在“格拉纳达”号上结束。这是女王政府为“远征”军司令及参谋部租用的小轮船，800吨位，犹如快艇。格兰特将军设晚宴欢送，气氛友好。据埃里松回忆，蒙托邦将军回到芝罘，“对大连湾之行留下深刻印象”；带回来的不是小心眼的嫉妒，而是要比个高低的好胜心。

对回访英军营地，米特雷西中校在7月15日信中作过详尽的描述。当然，他不完全赞同将军对英军炮兵的有保留的看法，说印度轻骑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锡克兵团“战马漂亮，服饰新颖，操练准确，动作灵活”。

额尔金也赞扬英军兵强马壮的阵容。他甚至称，自己面前是两支堪为典范的陆军和海军；不过，他指出所花代价太高。几天之后，额氏到芝罘参观法军营地。尽管发觉盟军备战滞后，但承认法国人手段有限却干得不错，而且花费仅为英国人的十分之一……

至于格兰特将军，理所当然对所率的军队既自豪又欣慰。“每个英军士兵，都是荣耀者，显得出身高贵，十分刚强，足以对抗世界上任何敌人”，格兰特很高兴听到蒙托邦在检阅英军时多次所说的这番赞扬话。

英军99团上尉邓恩，在6月22号日记中曾记下一个令他愤慨的故事。在大连湾，英军曾扣押三十来艘中国百姓运送柴米油盐的木船。他不禁问道：在英国，人们会怎么想？“我们曾对华宣战，是由于中国人搜查了一艘悬挂有争议的英国旗的帆船。现在，不待宣战，我们竟然没收了属于手无寸铁的无辜商贩的小帆船队，而且仅仅因为我军需要这批船。我们英国人肯定不比别人好。我们声称不打中国民众，只打他们的政府。口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却另行一套。”

随军医生芮尼也对英军强占民船严加谴责，同时指出法军在芝罘也同样如此！

在英法联军统帅相互礼节性拜访中，悬而未决的法军登陆地点问题没有言及，登陆行动的日期同样未提，原因在于拟定的侦察计划尚未实施！英军指责法军备战迟缓没有错！比如邓恩上尉，就对与法国人打交道深感遗憾。他认为在此耗费时间，眼巴巴看着部下丧失斗志，仍在等待“盟军靠不住的支持，他们做不到三分之一的工作，却肯定要一半以上的功劳”……

格兰特注意到，蒙托邦本人提出 7 月 25 日的限期，大概已经忘之脑后……6 月 18 日的军事会议决定由法军对白河和直隶湾南部进行新的侦察，以便最终确定法军登陆地点。蒙托邦将军在卜罗德准将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疑虑。他很希望在那儿登陆，但出于谨慎，也为“一个吉祥的灵感”所驱使，他要确信有完全可行的把握。英军方面对法军想在那个地方登陆看不出有任何弊病，因为，正如杜潘上校敏锐地分析的那样，“他们以优势兵力在最好的河岸那边作战，自然盼望自己登陆成功，同时要看另一岸我军失利的笑话。”

杜潘作为法军地形测量处主任，是这次侦察行动的主角之一，对此有过长篇的记述。这是由海陆军联合完成的使命，负责人除杜潘上校外，还有布热瓦海军上校和施密茨中校。布、施两人带领一小队士兵和水手，先乘“西贡”号出发，然后乘三只小船，星夜驶出、上岸。他们陷入越来越厚的一大片淤泥里，前进十分缓慢。“皓月当空，照亮他们冒险之行，而他们在泥水潭中困难行进；大海退潮时留下的大片水洼，宛如虚幻的池塘沉睡在眼前……”，杜潘诗一般地描绘道，然而此刻不是抒情的时候！侦察队仔细察看地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条件有利，士兵或许可以通过此地，但马匹驮着行装和作战物资，恐怕不行，而炮兵将更难！

可是，卜罗德准将的报告却肯定，步兵只要经过齐脚踝的一段淤泥，便可踏上坚硬能跑的地带。于是，侦察队又乘小船前去了解地形。在他们看来，事情已弄清，可以作出决定了。他们察看得相当远而且仔细，发现那里根本不能登陆。事实上，该地难以通行：无河港，数公里的河道水又很浅，到处淤泥深陷膝盖，与舰队联系困难。且不说正如英军主帅预见的那样，法军步兵将受到清军骑兵的摆布。

次日夜里，当法军侦察队再次勘察地形时，与清军四十来个骑兵遭遇。交火中，清兵一人中弹倒地，其余落荒而逃。归途中，他们设法抓来几名当地渔民，渔民告诉他们有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是位于白河左岸稍北之处。因而，白河南岸不能登陆得到确认。

杜潘上校指出，这次侦察的成果至关重要。它促使联军两统帅放弃各自于白河两岸分头行动的方案。结果，英法联军决定在北塘一岸同时登陆。多亏进行最后一次侦察，法军指挥部避免了一大灾难！

葛罗特使惊讶的是，这种侦察何以不早进行！在他看来，“我方一开始，就错误地想过分脱离盟军而行动”，现须回到两军从大沽北侧联合登陆的主张。英军塔洛克中尉批评法国人轻率、前后不一致的做法。他指出，这证明“他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藐视人家。他们认为只用 7000 步兵，无须骑兵和过多运输手段，便可独自登陆，打败中国军队，并越过 20 英里难以通行的地区去与英军会师。幸亏法国人总算发现本想登陆之处行不通，

最后时刻终于决定和英国人同时在北塘登陆”。

7月17日，额尔金和葛罗一同催促英法联军陆海军诸统帅采取行动，“以实施侵略中国的计划”（巴吕语）。因为两特使认为，再次进行外交交涉，将被中国人视为“懦弱的表示”。

2天后，联军将领在芝罘召开军事会议，两特使出席。蒙托邦问贺布，法军人马和英军同在一处登陆是否碍事，一直认为在大沽南侧登陆不可能的贺布，欣然回答蒙托邦，他完全可以这么做，因为他最诚恳的心愿是保持两国和谐一致。于是，英法联军最终决定共同在北塘城边白河略北之处登陆。

联军舰只定于7月26日开航。如英国人所说的，在北塘对岸“会师”。随军纪实作者们对英法两军出动的船只和兵力情况的估计差异很大。拉否例说，总计有300艘船只，其中战舰100艘，运输船200艘。法海军部门统计参战人数为8800左右，其中军官296人，925名辅助人员或苦力（但英国人声称，法军仅有6500人），另有千余马匹、骡子。

英军总计1.1万多官兵及数千苦力，分乘73艘战舰和百余艘用作运输的商船。而据葛罗估计，英海军共有223艘舰只和商船，除船员外，运载了1.8万人（数字虽高，但把英军所带的3500名印度仆役和中国苦力计算在内，似乎说得过去）。依巴吕之见，英军配备的人马比法军多3000左右。

著名史学家拉戈斯这样描述道：“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战争，遥远而神奇之战，结局难卜之战，因为在我们眼里，一切都是陌生的，这个昔日一无所知的海岸，这个任何欧洲军队从未踏过的广大帝国，这条地图上刚标上的北塘河……”

而此时在广州，投机者们对英法联军对华征战成功与否进行打赌。中国商人带着怀疑态度关注战争进展，广州棉花行会成员开出5万美元赌联军拿不下大沽炮台，英国商人都不敢接受这一赌注。只有一美国实业集团下1万美元，赌英法联军取胜，棉花行会竟拒绝此等小赌。

第09章 北塘登陆

士兵上船
景象壮观
艰难登陆
格兰特故意引人注目
未见清军踪影
动荡不安的夜晚
可怕的景象
北塘遭洗劫
互相指责
法军登陆乱成一团
法国人抓狗猪
清廷首次采取外交行动
联军撤出北塘
第一次小冲突
士兵上船
景象壮观
艰难登陆
格兰特故意引人注目
未见清军踪影
动荡不安的夜晚
可怕的景象
北塘遭洗劫
互相指责
法军登陆乱成一团
法国人抓狗猪
清廷首次采取外交行动
联军撤出北塘
第一次小冲突
蒙托邦的过失

登船行动可以开始了。炮兵及辎重装船要用两天时间，马匹和士兵，各需花上两天。
7月25日夜晩，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先上了“福尔班”号舰。照卡斯塔诺医生看来：“我军

将士离开这个暂栖之地，不无留恋。”而留守芝罘，仅有 200 左右步兵。

26 日，破晓时分，法军舰队起锚，分成三路纵队航行。三支纵队指挥为巴热和卜罗德两准将及布热瓦上校，他们分别乘首舰“复仇女神”号，“山林女仙”号和“穗子”号。各舰相隔两链（400 米）距离。蒙托邦将军在“福尔班”号上，沙内将军在大型舰艇“信息女神”号上，而葛罗男爵则在“杜舍拉”号上。大海好美啊！再见啦，芝罘！

埃里松激动而不无夸张地说：“当与这个令人向往、入迷的国家开战之时，我们兴奋不已。而这又轻轻地刺痛着你的心，不禁使人觉得此前的生活是那么的轻松而愉快。等待我们的将是何种命运？我们会得胜吗？或将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被那些从深不可测之处突然奔驰而来的千军万马统统踩死？”

在大连湾，英军也同样开始登船启航。时值风和日丽，出征队伍多有气势。再见，大连湾！吴士礼惊呼：“比我军舰队挺进北塘更雄壮的情景，连我也记不得可曾见过。”

杜潘上校认为，英军舰队开足马力全速前进，看上去比法军舰队阵容气派。法舰队则按队列航行，显得缓慢，最快的舰只又被迫与最慢的汽艇同行，而各汽艇还拖着帆船和一批从芝罘弄来的中国小船。

7 月 28 日早上，两军舰队会师。法舰队在英舰队南面抛锚。英军两列队，法军一列队。两军舰队沿同航线行驶后，又一同在离北塘要塞 20 海里之处停靠。250 艘舰艇及船只分数列抛锚，“场面蔚为壮观”，柯利诺将军赞叹不已。随军神甫朱雅也激动地写道：“桅樯林立，好比耸入云天的教堂钟楼，桅樯顶上彩旗高高飘扬，好一派雄伟景象。”

对当时的场面与部队的情绪，布隆戴尔将军则这样深切地写道：“离祖国那么遥远，战争前景未卜，给将士们心理上一种神秘的影响，而大海壮美景象给人的力量和信心与这种神秘感交织在一起。两百多艘战舰及运输船只，夜晚灯光倒映水上，波浪中仿佛呈现出一个大城市的景象。”

另外，在英法联军舰队不远之处，还停泊着 4 艘俄国和 2 艘美国军舰。桅樯上悬挂的国旗，表明舰上有俄美两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和华若翰。

29、30 号这两天，主要安排部队登陆。杜潘上校借此再对白河地形进行最后一次侦察。他未发现对方有任何防卫，河中与岸上均无迹象；仅有一些清军马队，弓箭在身。30 号当天，英法舰队驶近北塘约十海里。跨过河口沙洲，准备第二天登陆。但因东南风刮得

厉害，大海波涛汹涌，31日登陆未成。

8月1日

清晨，尽管下雨，但天气已有所转好。据海军上尉巴吕介绍，6时许，贺布和沙内两将下令，让部队下到小艇和帆船上。“每个战士发给6天口粮，一份熟肉，葡萄酒和烧酒及焙好磨碎的咖啡等。而马匹，发3天草料。”

葛罗特使在“杜舍拉”号舰上，静观当时场面：“烟雨茫茫，没有一丝微风。船上，大家欣喜若狂。每艘战舰都靠驳了驳船、小艇及小船。士兵排成长龙，沿舷梯而下，挤满登陆船只。只见各处把马匹赶到横桁尽头，然后慢慢放到驳船里。锚地全在沸腾之中，呈现极为激动人心的情景。”

小型蒸汽炮舰，吃水不足9法尺，一艘一艘地把运有2000名士兵、2个炮兵中队、1排工兵、1排救护人员和200广东苦力的船只拖到岸边。为防止不满情绪，法军司令部决定所有兵种都有一部分上岸，包括他们的长官，这样所有高级军官都下船上岸，而大部队仍暂留海上。这种部署难免受到杜潘上校的批评：“战时，想讨所有人欢喜，必有损于全局利益。”

根据两方司令达成的协议，英军从第一旅抽出同样多的士兵由米启尔少将指挥登陆。涨潮时，两支小舰队毫不困难地过了白河沙洲，在锚地停靠。蒙托邦将军和沙内将军前去舰上，与格兰特将军和贺布上将相会。当时是下午3点钟。蒙托邦急不可耐地想下船，格兰特主张等退潮时再说。蒙托邦仍坚持要下船，因发现不远的河堤上有百余清军马队，他担心他们会切断北塘桥。他的坚持获得了胜利。最好的见证人埃里松回忆道：“在英军舰上，联军将帅紧紧握手，话别，离开。大炮一响，号令登陆。”

4时许，法军统帅坐上小船，随同的有杜潘上校，其子蒙托邦上尉和副官埃里松以及几个北非骑兵。船驶近河岸，遇到一片淤泥，搁浅了。蒙将军第一个跳下去，踏上中国的土地，即跳在泥水中，水深过膝，渗进皮靴里。即刻，500轻步兵跟上去，并很快超过他。德拉格朗热中尉记述说：“蒙将军在他们后面几步，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自豪地看着他的士兵们已投入战斗，而那些大个子英军步枪手距河滩还有500来米。”

格兰特将军也跟着跳下水去。当时的所有随军作者无不津津有味地讲述这个生动场面，并捧腹大笑！这位司令官，虽生在苏格兰，却是典型的英国务实者，绝不怕难为情。他从从容容地脱掉皮靴和袜子，还有军裤，把它们小心翼翼地系在宝剑上，然后肩扛宝

剑，跳到水里。

大英女王陛下的“远征”军统帅，就那样仅头戴白盔，身穿沾满污泥的红哗叽制服，下面还露出法兰绒衬衣角，像什么都不顾、什么人都不管的赶车人，带领着士兵在布满淤泥潜伏危险的地上艰难前进。那幅情景，埃里松风趣地写道：“不幸，他的脚陷进相当深的泥洞里，既失去了平衡，又失去了皮靴。他站直身子，双脚又碰到石子，疼得直乱蹦乱跳，不住地露出怪相，令人忍俊不禁。至于皮靴，就静静地随着水流走……而之后，皮靴被捞起时，已经湿透，与穿着它涉水没有什么区别。”

对这位英勇的主帅，塔洛克也嘲笑道，他“不穿裤子”冲在前面开路，但像当年的亨利·纳瓦尔（后来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一样威风凛凛，束白羽饰，号令部队集合其衬衣角下！吴士礼中校说他一直记得这个久远的阅兵式一般的盛况：“我戎马一生，经历许多诙谐幽默场面，现在还不时想起。但从未有哪件事像第一旅华北登陆的滑稽时刻那样，让我笑个没完。”后来，当人们在英国茅草屋顶别墅里津津有味地听讲时，也乐得同样大笑不止……

在不同登陆地点艰难地走过 600 至 1500 米淤泥地段之后，法军终于上岸，高声齐呼：“法兰西万岁！皇上万岁！”英军随即回应“万岁！万岁！”河堤不远处，清军马队消失了。巴赞库尔评述说：“这奇特而壮观的景象一定把清兵们吓坏了，我们这支兵强马壮的军队，犹如那汹涌澎湃的波涛，朝着他们滚滚袭来。”

北塘村距此仅 2 公里，远望泻湖那边即是。炮台一片沉寂，村中未见任何动静。联军仅放了几枪，清兵便弃村而逃。

于是，下令部队全部登陆。但是最重的大炮及马匹陷进淤泥里，前进不了。冉曼将军指挥的第一旅，越过涨潮时积满泥水的疏松地段，已占据河堤。柯利诺将军带领的第二旅进入左岸。英军则在法军右侧。通向村子的桥即刻被占领，石桥完好无损。安营过夜。没有什么吃的，更没有什么喝的。凌晨 3 点起床。

海军上尉巴吕对登陆的当天恰如其分地总结道：“这次登陆行动圆满完成，为我们敞开了中国之门。”但是，如此轻而易举，反倒让人不满足了。阿尔芒写道：“奇怪至极！北塘城的部分居民虽在，而清兵却踪影全无。”

布隆戴尔将军不解的是，怀着为 1859 年大沽败北复仇之心而来的贺布将军，何以对北塘的防御如此惧怕，以至于他不相信能够像沙内将军建议的那样，在登陆之前用炮艇实

施攻击。可惜，沙内的意见未占上风，如照他的意见，艰难的登陆本是可以避免的。

其他人——特别是随军牧师姆吉——也感到奇怪：就在附近的清军骑兵为何没有乘联军登陆组织混乱、极为脆弱之时发动攻击，为何反而让他们从从容容地上了岸。几天以来，由于俄美舰只已在北塘游弋，清兵应该有所警觉。这个并非军人的教士认为，这是僧格林沁的第一个战术错误。

8月2日和3日

联军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个夜晚，过得极不舒服，乱得不可开交。满天星斗，大家只得露宿地上。惟独蒙司令有权用帐篷。日本马为所欲为，挣脱绳索，四处乱跑，竟用鼻子嗅那些酣睡中的士兵，引起一阵慌乱。士兵们惊醒起来，感觉地上潮湿不堪。而英军士兵，则让执行侦察任务归来的杜潘上校一行吵醒。他们潜入炮台，带着一门假炮、一些盔甲和几面旗子等战利品返回，正好穿过英军营地。

已是深夜时分，杜潘上校前去叫醒蒙托邦将军，汇报侦察情况。他由几个英军同行和法军20个工兵、坑道兵陪同侦察，发现北塘村和炮台空空如也，大炮全都运走了。

格兰特将军自己也说，这情报的来源是当地一个老者，样子可敬，为了保护父老乡亲 and 取得信任，还告诉侵略军炮台里埋了地雷。巴夏礼充当翻译，说服那位尊贵的老人，陪他进到已撤空的炮台。他们确实发现了好几处爆炸装置，由装满火药的大铁壳组成，用先进的点火系统联成一组。若不慎踩上埋在地下的导火线，地雷爆炸将造成巨大杀伤与破坏。他们还发现未撤走的大炮全是假的，系加箍铁皮的木炮！清兵惯用的小诡计……

杜潘等法国人一方，格兰特和罗亨利等英国人一方，都争炮台侦察之功。这是联军无休止竞争的开始：面对战果，竞相争功，互不信服。而且是明目张胆地！

清晨，联军两司令正式进入北塘。炮舰停在河口炮台脚下。北塘是个小城，居民数千（而据随军纪实作者估计约3000到3万人！），可谓人口稠密，但脏乱不堪。该城像是一个小岛，涨潮时被大海包围，退潮后被沼泽淤泥包围。如卡斯塔诺医生描绘，小城呈椭圆形，由宽沟环绕，一条长街将它一分为二，连接许多小街巷。法英联军以那条大街为界，分别占领左城和右城街区。

这位法军医疗队队长对占领区卫生条件甚为担心，称这是最有损健康的停留地点。牲口的腐烂尸体到处可见，城中不长一草一木，郊外是光秃秃的平原，涨潮时大部分被淹

没。尤其退潮时，从溪流的淤泥和海滩泥水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要不当即采取预防措施，那流行病就会盛行。

至于居民，全都被迫紧急疏散，弃家离乡，悲惨逃亡。可是，祸不单行。其中 50 来人，宁肯自尽也不离家。施密茨中校与副手康普农少校进入一户官员人家，便看到一种可怕的场面。据埃里松描述，在砖砌的炕上横躺着 3 个女人，“一个老太太，衣衫有些破旧；两个年轻女子，穿着奢华，其中一个长得很漂亮。三个女人的脖子都被割开，紫红丝绸帷幔沾满血迹，大量涌出的鲜血一串串地滴在地上。她们还在发出嘶哑的喘气声，而肢体一阵抽搐，随后断了气。在她们旁边，两个小丫头，还不到记事年龄，时而抓着死者的辫子玩耍，时而满房间来回追着跑，拿这不寻常的情形开心！砖炕对面，柚木扶手椅上坐着一家之长，那个官吏，发呆地望着这个可怖的场景……”就是他割断了老妇人——大概是他的母亲——和两个妻子的喉咙。

而他本人，也用剃刀抹脖子自尽，幸亏此时还活着。这正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告诉联军炮台埋地雷的老者。送进医院后，这个绅士还能讲述他家的可怕故事，然后死去。

原来，数名广东苦力——葛罗说是印度锡克骑兵——闯入他家中，抢劫打砸一空。这帮家伙刚走，另一群苦力又破门而入，再狠狠抢砸一番。这可怜的一家人害怕极了，于是一狠心，吞了大量鸦片，然后一死了之。

格兰特承认，这 2500 名主要用于运输物资的广东苦力，大多数为凶狠的流氓无赖。由于管束不严，他们在全城抢杀奸淫，无恶不作，对同胞犯下残暴罪行。另外，英兵出去找饮用水的时候，还发现一些人家水缸里有“勒死的儿童和割死的妇女，头朝地，脚朝天”，大概是家人要他们免受战争恐怖而自行了断的。巴夏礼估计，这样死去的妇女约有四五十个。她们不论情愿与否，与其蒙受贼人欺辱，不如以服毒、自缢、跳河，一死而解脱。埃里松对此激愤地写道：“这简直成了恶梦！在它面前，我们诗一般的征服与神奇冒险的美梦破灭了。”

广东苦力抢劫成性之外，鸦片烟抽得特别出奇。为了他们的健康，指望他们出力，负责管理的英法军官总尽量禁止他们抽大烟。可是越不让他们抽，情况越糟。这些苦力完全受控于“神奇毒丸”，一旦失去自制力，变得更难管理。联军别无它法，干脆放任自流了……

对于英法起用苦力，洛图尔伯爵懊恼地指出：“华北人非常害怕这帮广东佬。我们很难看住他们，制止不了那些令人遗憾的场面。我觉得，把这些人带在军中，实在得不偿

失……”

照巴夏礼说法，去敲诈勒索的并非只有广东苦力。其实，他也提到全城都遭联军洗劫。他承认某些英国兵行为恶劣，但不如法国兵厉害，司令部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事实上，大家都抢得眉飞色舞！英国驻上海领事郇和甚至承认，若说法国兵与苦力称得上抢劫冠军的话，那么英军，负责维护军纪的军警士官则更坏！

阿尔芒对联军双方抢劫者有所目睹，也责怪道：“我们士兵抢得特别狠。炮兵和轻步兵虽基本不参加，但有的也抢一点，有的开杀戒！而苦力们，更是疯狂地抢掳。锡克骑兵，也一样！至于英国人，他们臭名昭著，可为我们的师傅：他们所经之处，连个钉头也不留。士兵们竟然身穿抢来的丝袍，头戴官帽，到处溜达。阻止他们吗？远离乡土那么久，何不让他们狂欢一番！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各类物品充溢的当铺。”杜潘上校指责锡克“旁遮普团”更是“一支野蛮的部队，刚一到就侵入民宅，冲进店铺，疯狂抢掠”。

柯利诺将军也证实说，“印度兵抢光商铺，洗劫民宅，奸淫妇女”。不少女子逃脱印兵之手，躲进法军兵营。法军枪声一响，一个印兵受伤倒地。在中国土地上，英法联军之间就这样进行了首次火并！“此事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我不信在远征记事中会有叙述”。确是如此！

在巴夏礼看来，因有法国盟军在，才难以管好事务（指占领北塘，也泛指联合“远征”这一原则本身）。他认为，英国人只要是与他们合作，事情要想组织得很好，肯定是不可能！巴夏礼也许是也让敌视法国的情绪牵着走了。

额尔金赞同巴夏礼的看法。在8月9日一封信中，他急不可耐地声称，鉴于对法国人的行为已有所目睹，夺取大沽炮台之后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关于法国人，他写道：“我相信他们必然还会犯下种种暴行，使洋人在所进入的每座城市、每个村庄里受到憎恨。当然，他们的行为也使我军部队很难严明纪律。”

因而，对部队犯下的暴行，英法双方互相指责。英军首先揭露法军的抢掠行为。

英法联军对北塘逗留实难忍受。士兵、马匹、大炮和军需等登陆，不得不花数天时间，堤道和马路修了起来。罗亨利认为，小河的忙碌景象“可与利物浦码头相比”。柯利诺也指出，英军占有最好的河岸，易于把人马和物资运上陆地。

贝齐亚上尉也这样看。他认为，英军留给法军的登陆点，远不是最好的。“显而易见，盟军占有最大最好的一份。见我们出师失利，他们大概不会感到懊丧。他们接受我军帮助很勉强，觉得这种帮助此时对他们无甚益处，只对法国未来在中国海通商产生更为有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工兵上尉贝齐亚指出，陆海军指挥不统一，造成法军内部混乱，给极为迟缓的登陆带来持续的矛盾。先登陆的 2000 官兵没有足够食品，后勤跟不上。大米变质。海军不为已经上岸的部队送去给养，而只是继续运送其他部队登陆，使得局面更加严重。他解释说，所有上岸事项，完全无序，没有后续安排。物品到处乱扔在河滩上，无人提醒。“大多数人乱走乱窜，不知所措，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混乱，竟无人负责任。后果不难预料：士兵缺粮少食，才是真正的痛苦……”可见，对法军陆海部队指挥分开的不利之处，蒙托邦将军有所担心，并非多余。

北塘实属小城。现被占领，哪能容纳 1.8 万多外来人，何况种族混杂空前惊人。正如阿尔芒医生所记：“英军有辅助部队印度锡克骑兵，法军则有北非阿拉伯骑兵。另有运送或押送行李及物资的苦力和脚夫等，如印度黑人、非洲黑人、马来人和华人等；还有其他混血者，如马尼拉他加禄人、西班牙与马来人混血儿，其中多数被驻印支海军当作辅助水手。”

那 4000 余匹骡马，暂时关在炮台内。那里是柴泥房屋，加之热得要命，存在严重火灾隐患。幸亏下了一场暴雨，害怕情绪得以缓减。可是，全城变得如同“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人们走在烂泥坑中，大街小巷实在难以通行。再者，严重缺水，大缸里存的饮水很快用光。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这个垃圾场！特别在洛图尔的记忆中，北塘是“可怕至极、令人受不了的典型”！

登陆中，法军再次延误。用于运送士兵上岸的炮艇，法军只有 7 艘，而英军多达 30 艘。当英军行装辎重大部分已运上岸，法军才运完一半……英军当然提议来帮忙，不过，法军又缺少骡马去运送。

8 月 4 日

联军两司令毫不耽误，决定派侦察大队前去摸清通向大沽炮台（离北塘镇 15 公里左右）道路上的清军阵地。联军的意图是首先攻取大沽炮台。这些炮台，居高临下地控制着白河和通往天津的大路。从那里，必要时，也可直上北京……

联合侦察队由双方千余步兵组成，直属萨顿和柯利诺两将军指挥。他们行进在一条穿越沼泽与泥塘、虽铺石板但泥泞不堪的7米宽河堤道上，与一支清军马队遭遇，清军随后撤退到一处有雉堞墙的营地。这个距城8公里的兵营，正是联军要侦察的。可是，就在柯利诺指挥架炮的时候，突然响起一阵枪声（这是一种滑膛枪，安在三脚架上，由3个兵勇操纵，可将大粒子弹射至800米处），英法侦察兵各有8人受伤。这是英法联军首批伤兵。

鉴于遭到清军骑兵侧面骚扰，柯利诺将军只好退回北塘。英军却因他未能乘机摧毁敌营而遗憾。

8月5日

昨夜以来，暴雨和狂风使联军无法采取任何行动。雨水使得条条马路难以通行，凡重大军事调动一概受阻，直至11日。而饮水供应已成问题。在这块肮脏的地方，基本生活好歹勉强维持。英军日需食物充足，但法军则不能。见法国兵在大街小巷和臭水沟里到处捉猪抓鸡，英国兵目瞪口呆。猪被抢光了，“可怜的法国人”不得已去到炮台附近，争着打狗捉猫来充饥，又一次在英国人眼皮底下丢丑。

于这方面，著有《1860年华北战记》的郇和讲了这个故事：一个法国兵拖着死狗走过村子街头，有人问他要做什么用，他便答道：

“当然煮来吃啦！”

“怎么，你们吃狗？”

“我想是的！我倒想天天能吃到这样的好菜呢！”

郇和感到惊讶的是，法国兵居然能坐在“狗汤”或“猫汤”前，一本正经地反复高喊：“吾皇万岁！”仿佛拿破仑三世与他的美餐有关系的。

吴士礼也说，整整一周，法军带的干粮不够吃，而且有的已变质。只见他们成群结队，手拿铁铲、砍柴刀和棍棒，到处去抓“脏得很”的大猪小猪。一连几天，从早到晚，都不断传来猪被宰杀时的惨叫声。而为数不多的公鸡母鸡，也照样很快消失了。好些法国兵甚至冲进英军营地，双手插在衣兜里，四处张口呆望，发现一头老母猪，立即一涌而上、迅疾抓走。

8月6日

美国公使华若翰来到葛罗男爵船上拜望，转送直隶总督恒福的函件。葛罗在《黄皮书日记》中记述了这一“最后通牒”的要点：这位总督对1858年天津议和“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陈述，要求英法两使3日内接受中国皇帝“以全旧好”、“广大怀柔之意”，并警告“西夷”在海上虽占优势，但在陆地上将被清军“一口吃掉”……

恒福在函中指出：惊悉英法“水陆并进，率众登陆，占据北塘村庄，居民惶恐，十六日遽行用兵列阵……我国不得不为抵御，然仍饬带兵各官只许迎敌，未许进攻。仰体大皇帝宽容之意，欲敦旧好。惟是为战为和，不能并用。……若英法两国一定主战，我国水陆均有设备，现虽占我北塘，不难督兵攻击，但惟恐英法两国再有损伤，此后难以和好。”^①

^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451-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恒福总督信中还委托华若翰将军向英法特使转达：“趁此时彼此均无损伤，收兵息事，仍照上年之例进京换约，以全和好，则各国商民均受其福。……兹定于三日之内，英法两国如无回信，我国惟有主战而已。且陆路用兵，非同水路；如英法两国不知我军容让之意，仍复恃强，我国主将自有调度。倘英法两国士卒再经挫失，不但于和议一局转多窒碍，即英法两国公使亦难于回国复命也。”^②

^②同上。

言下之意，英法联军海上虽占有优势，但陆上岂能与清朝许多支军队对抗。倘若一开战，那等待他们的将是再吃败仗，比上次（即1859年大沽炮台惨败）败得更惨重。对此，额尔金和葛罗决定不予答复，只托人转告恒福，声称在中国政府拒绝英法盟国最后通牒之后，事务早已交到联军军事将领手中。

8月9日

吴士礼中校带领一队骑兵，前去探查位于已侦察过的河堤北面不远的小路，发现那里留有车轮的痕迹。过了两海里坑坑洼洼的路段，那条小路一下呈现平坦舒展、草地茫茫的景象。显然，这条大道可以通行骑兵和炮兵。真是个好消息，而且沿途还发现许多池塘水也可饮用。

格兰特将军很想尽快离开北塘城。他向蒙托邦通报了立即进攻大沽炮台的意图。蒙托邦却要求暂缓，格兰特坚决不从。柯利诺说：“两司令之间的商谈已无亲切之感，而且言辞非常激烈。”而蒙将军只好高傲地让步，回答道：“好吧，英军走到那里，法军跟到那里，决不落后。”于是，两主帅决定轮流走在部队前头。英军先开拔。数日以来，骄阳当空，条条道路易于通行。

8月12日

英法联军登陆北塘11天之后，终于向这个“偏僻的角落”及臭气熏天告别。真希望永不再来！葛罗致书巴黎说：“没有人对此次成功持怀疑态度。但是必须拿下大沽要塞，使白河畅通无阻。我军占领天津，好让清政府最终明白其处境不妙，决定和谈。”

拿耳带领英军第二师和骑兵，从右侧踏上9日查明的那条通向天津的小路。米启尔则率其部队沿主河堤推进，由冉曼指挥的千余法军则紧跟同行。当时，柯利诺暂留北塘。快到新河庄，联军在8月4日侦察的筑有雉堞墙的敌营前停住。炮火开路，步兵攻占。半小时解决战斗。中国守军被打得惨败。

右边，第二战线上，拿皮耳纵队受到4000清军骑兵攻击。阿姆斯特朗重炮投入战斗，锡克骑兵击退清兵骑兵。清军骑兵溃退到河北岸工事坚固的塘沽镇，伤亡很大。而英军只有2个军官受伤，3个锡克兵被打死。拿皮耳将军惊叹清军的骁勇，他们仅以弓箭长矛为武器，处于现代化杀伤力大的炮火之下，却那样泰然自若，坚强不屈。吴士礼也承认，“从未见过如此勇猛的士兵。”

塘沽是个防守严密的重镇，驻有清军骑兵大营，充作僧格林沁的指挥部。蒙托邦不愿罢手，建议乘势向南边数公里的塘沽挺进。格兰特尽量劝阻。他解释道，英军已经疲惫不堪，尤其步兵队伍被迫停在河堤上，四周都是水，面临敌营炮火轰击，而已方炮兵和步兵无法展开。

蒙托邦固执己见，下令法军单独进发。但是，他随后又将部队召回。或许是出于谨慎吧！这次未遂行动，贝齐亚上尉有趣地比做是“火力侦察”。格兰特简洁地评论：“蒙将军总算承认他的做法无用，故把部队拉了回来。”吴士礼也强调法军司令指挥“失误”。当时，杜潘上校同样不怕批评本军统帅，他觉得，英国人有节制，“行动得理智”。对蒙将军，大家可不会这么说！

英法联军在村民全都撤空的新河庄及附近的菜园果园等处驻扎下来。北塘地狱般的生

活之后，新河显得像小天堂。这里食物丰足，马匹饲料也一样。可惜，如一点也不喜欢法国人的邓恩上尉所言，法军大兵又到处疯狂抢劫，带了很坏的头。大批当地妇女、儿童和老人纷纷躲到木船上，得到英国海军的保护……

8月13日

整个白天时间都用来侦察塘沽一带由雉堞墙保护、架有大炮和悬挂红旗旗的清军兵营，确定了一条接近该要塞的新路线。联军工兵部队在广东苦力等参与下，加紧架设跨运河与水路的桥梁。这些工程将利于从各个方向攻打敌营。

与此同时，柯利诺将军也率部前来新河集结。

第 10 章 攻陷大沽炮台

初次交火

攻占塘沽

果敢的施密茨中校

格兰特将军观望

8月15日皇帝节

悬赏缉拿额尔金

两司令严重不和

21日：夺取大沽炮台

毕托拍照

柯利诺立功

巴夏礼劝降

恒福总督

暴雨倾盆

格兰特得胜

英国人向蒙托邦算账

吴士礼：战争已经结束

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8月13日

云梯呢？云梯在哪里？法军营中突然发觉，忘记把这些攻夺炮台必不可少的攀墙工具带来了。其实，工兵队早已备好了这些木梯。据说曾向总司令报告过，想不到竟将云梯落在北塘了。于是，13号至14号夜里，急忙派60来个苦力飞快跑回，才把云梯取来。贝齐亚上尉叙述了这个故事，也奇怪当时为何这般疏忽。

8月14日

英法联军向防守森严的塘沽城进发。右侧，英军走上沿河新路线；左侧，法军取道通向中央城门的主路。英兵遭到河对岸船上发射的炮火袭击，可是很快，那大炮就被打哑了。联军36门大炮，即法军4匹日本马拉的来复线山炮和英军8匹马拖的阿姆斯特朗重炮等，在距离清军营垒1500米处架好。半小时密集炮轰之后，联军炮兵迅即向目标推进。到400米左右时，原来射程达不到的清军炮火弹片，现在从联军士兵头上飞过！清军还击很快就停止了。

本茨曼上校指挥的炮兵轰击敌营之后，轮到施密茨中校率领的突击队行动了。这位参谋长数日来因发烧生病，原留在北塘，蒙托邦将军见他飞马而来，很是惊喜。“军功当仁不让”，该他指挥攻坚兵冲锋了。他一马当先向前冲，可不慎跌入壕沟，险些淹死，幸被两个士官救起；但他又冒着枪林弹雨，冲杀在前。他命令轻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向城门冲锋，架云梯翻越城墙；督促工兵坑道兵用斧头砸开城门。霎时，施密茨中校飞身上，挥动着法兰西三色旗。联军一阵欢呼。两军步兵同时冲进炮台。他们站在墙上，望着清军步骑落荒而逃，纷纷躲进另一座炮台。上午11点，战斗结束。

塘沽炮台内，可见联军炮火造成的杀戮惨状。一个身着金线绦子服饰的军官脑袋搬家；而漂亮的军帐下，横躺着两具大官尸首，显然是自刎身亡。联军缴获了24门大炮。法军约有30人负伤，其中一些伤势严重，1人阵亡。英军只有3人受伤，不过拿皮耳将军坐骑中弹倒地，而他率的部队被派留守炮台。连格兰特司令都承认，那天的英雄当数施密茨中校。

其实，清兵也很善战。埃里松曾引用蒙将军的这一说法：“本人不知道这场战争，我们还会遇到什么。但我想，他们这些人要是武装精良，将会怎么打。而我们一边打他们，一边也在教会他们打仗。”贝齐亚上尉赞同这种看法，驳斥欧洲普遍存在的论点，即认为中国人属可鄙视的懦夫，软弱疲塌，不堪一击。相反，贝齐亚向中国精忠义勇的士兵表示敬意，称赞中国人很有智谋，刚毅，不怕苦难，视死如归。他认为：“从军事角度看，这

个民族只缺少个好领导，并需讲点科学。”

蒙托邦想要继续作战。天气晴朗，地上坚实，且士兵不累。他建议乘清军溃退、躲进左岸第一座炮台之机，从速前去攻打，但是，格兰特拒绝，推说部下白天还未吃饭！甚至说想要让他们休整四五天……

蒙托邦不理解英军同僚的态度，认为对方是个果断的人，竟这么缺乏勇气。为充分利用时机，他提议袭击敌营是顺理成章的。柯利诺也觉得：“要是不在此处停下来，我们也许可以推进到大沽要塞，并乘清军慌乱不堪而取之。”

埃里松的讥讽和挖苦反映了法国人的看法：“英国人想饱餐一顿！而且他们要求至少要用3个小时，以完成这次非常有益、令人肃然起敬的行动。此外，他们的主帅还想要休息一下……”对英军司令如此尊重“午餐”传统，米特雷西同样气愤地说：“乘胜前进中突然击鼓归营，系严重错误，使夺取白河要塞延迟数日，又增加伤亡人数。对丧失斗志、四处逃窜之敌，要穷追不舍；要乘胜向前，不给清军总兵以喘息重整旗鼓之机……”

然而，这毕竟是真正开战的第一天。

不过，中方外交积极主动起来。英法联军登陆还不到1个星期，直隶总督恒福就致信额尔金特使，向对方表明惊讶心情：既然他们两国声称和平，何以要在此部署敌对兵力……他提议双方会晤，以便友好商谈。其他书信也接踵而来，额尔金概不答复。的确，他没有弄错，中方所以主动起来，旨在争取时间，尽可能拖延英法联军推进。额尔金态度坚决，大沽要塞不攻下，谈不上商讨中方议和的建议。

拿下塘沽炮台，已为联军夺取大沽要塞打开了通道。他们去年攻打大沽炮台，惨败而归。大沽要塞，实际包括5座炮台：河左岸（北侧）有2座，其中1座大炮台；河右岸（南侧）有3座，其中1座大炮台。

于是，法军回到新河营地。而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竟然无意中发现当地的当铺存有大量羊皮袄和其他裘皮服装等，军需后勤处决定攫取这批珍贵毛皮。自“快帆皇后”号沉没损失军装后，法军现在终于有了过冬衣服。另在新河镇，联军还弄到一些马匹和骡子，而且还弄来一批船只，用以架搭过河桥。

8月15日

这天是法国皇帝节。1804年，圣-拿破仑日成为官方节日，8月15日为拿破仑一世

诞辰。此时，在法国，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而在新河的法军营地，感觉就像在夏隆军营那样^①。二十一响礼炮鸣响，部队群情振奋。骄阳当空，弥撒举行，将士们排成方队高声齐唱《感恩曲》。随后进行阅兵，演奏演唱会，以及游戏，如赛跑、套袋赛跑等，优胜者可奖几块皮阿斯特钱。法军尽情欢乐，英军吃惊不已。然而，向来行事得体的英国人，中午也鸣放十二响礼炮，真是恰如其分。

^①自 1856 年起，每年逢此节日，拿破仑三世都到位于巴黎东部马恩省夏隆军营巡视，接见军队将领，出席或指挥军事演习。

借节日机会，蒙托邦将军在职权范围内为施密茨和利韦两中校晋升一级军衔，他还向一条腿被炮弹炸掉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授勋。埃里松曾记述这个“可怜鬼”负伤时的情景：

“啊！上帝啊！上帝啊！”他疼得喊叫着。

蒙将军正好在他面前停住，俯身摸着他的手枪皮套，关切地说道：

“瞧，朋友，勇敢些！十字勋章会使你忘掉这个。”

“娘的！我不希罕这……勋章，还我的腿！”他气馁地回答。

将军没有作声，走开了。埃里松带着苦涩的幽默感补充道：“由于只在马戏场或跑马场见过打仗，我原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用那条健全的腿站起来，高呼皇帝万岁！”

8 月 16 日

额尔金勋爵前来拜访蒙托邦将军，向盟军介绍中方议和的有关建议。同时，他也通报从塘沽炮台自刎的清朝大官身上找到的文书部分内容。其中有一咸丰皇帝通谕^②，号令所有臣民，不论满汉，要以各种手段，如杀野兽那样“消灭夷寇”。擒贼先擒王。额尔金作为“元凶”，人头悬赏 1500 皮阿斯特（约 1.2 万法郎）；联军两主帅，人头各值 1000 皮阿斯特（约 8000 法郎）。

^②通谕内容详见附录。——编者注

另外，文书之中还有清军将领上呈北京的奏折。从中看出他们谎报军情，颠倒黑白，把清军惨败说成大胜，把联军打赢说成大败。英法将领们不禁在问，北京朝廷对发生在自

己国土上的种种事件，究竟准确而真实地了解多少？……

8月18日

英法联军，特别是法军，正在白河上游距塘沽要塞5公里处加紧架设浮桥。事实上，蒙托邦将军坚决要在河右岸展开军事行动。他派利韦上校带一个工兵连前去那里侦察，任务是占领新河对面的一个村庄，以控制白河两岸。他们遭遇了一支清兵，战斗进行激烈，法侦察队请求支援。炮兵中校富隆-格朗尚指挥山炮轰击，清兵被迫撤退。冉曼将军亲率劲旅，在白河右岸扎营。

其意图何在？十分明显，蒙托邦仍然要优先攻打南岸。但是，跨河桥一直未能建好。在这种情况下，在那里设置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无济于事。吴士礼认为，要占领白河右岸是个错误的主意，虽然这个说法会让法国人不悦。

8月19日、20日

联军两主帅会晤商定下一步行动，即攻夺大沽要塞。这次会晤，大局攸关，因为蒙托邦和格兰特对进军路线未能取得一致。联合征战，面临风险。

蒙托邦始终主张，凭借炮舰的支持，首先夺白河右岸大沽主炮台。邓恩等爱说别人坏话的英国人妄言，蒙将军是要争大功，争个人之功。在蒙托邦看来，主炮台一旦陷落，将使左岸其他炮台一并不攻自破。故攻打主炮台，除军事意义本身，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去年正是在大沽主炮台前英法部队大吃败仗。现在要向中国人表明，报仇时刻已到！

格兰特断然反对法方计划，认为这“太冒险”。他指出，要到达那些炮台，先得过河，这将带来诸多困难，而渡河又有延长北塘交通线的不利。其次，要冒险经过一个水淹地段，军队右翼暴露于敌军骑兵打击之下。再者，他还解释说，大沽主炮台就算失守，其他炮台的兵力与防御力量仍然还在。

格兰特试图说服法军同僚，白河左岸最北面的炮台统领着其他所有炮台，夺取这座炮台，所有炮台就会陷落。在格兰特看来，事情十分简单，他本人的计划易于实施。吴士礼责怪说，由于法国人的过错，攻夺大沽要塞之战发起太迟；主张攻打南岸炮台，会拖延开战日期。可是，时间紧迫得很……

简直徒劳！当时，柯利诺将军也赞同按英军统帅意见攻打北岸炮台，蒙托邦司令仍然坚持个人立场。他甚至强调，攻打左岸（北部）炮台，在他看来完全无益。不过，蒙托邦

表示，如果格兰特决意实施其计划，他会和对方并肩作战。但他觉得必须提出一份书面抗议！

果然，第二天，格兰特收到蒙托邦一封长长的函件，陈述个人理由。蒙托邦在函中解释道，在如何攻打大沽炮台的方式上，英方提出的作战方案与他的主张相左；但为表示参与联合作战的愿望，他仍会派法军“与友军协同行动”。在函件末尾，蒙托邦补充说，他的这些看法旨在开脱本国政府将承担的军事责任！这一态度，英军人颇瞧不起，英国一些史学家也不以为然。

格兰特当天即予以答复，对蒙托邦的论据一一提出质疑。格氏只强调，他惟一关心的是，鉴于季节已经很晚，必须尽快拿下大沽炮台，并且要把部队伤亡人数压到最低限度。这位英军司令真的下了大赌注！他不是不清楚，倘若大沽要塞前再吃败仗，将使其军事生涯就此完结，而且也会敲响英法联盟的丧钟。更有甚者，这会导致伦敦政府倒台。他和额尔金一样清楚，对华战争在英国很不得人心。

谁错？谁对？两位将领谁能夺得最优秀战略家称号？明天 21 日便见分晓。

8 月 21 日

整个大白天。新河之后，塘沽；塘沽之后，大沽。

20 日夜晚，柯利诺纵队与 102 步兵强攻团一起，开到塘沽炮台下宿营，以便次日凌晨开始行动。而英军工兵，则连夜在平原纵横交错的河渠上架设桥梁或搭建过道。借着中方火光，架桥兵和坑道兵加快搭建进度。曾当过工兵军官的拿皮耳将军负责监督完成架桥工程。凌晨 4 时许，炮兵在前，大部队离开新河。由于地形状况，不宜部署大的兵力，英军调集 2500 官兵，法军出动千余人和 2 个炮兵连。额尔金由《泰晤士报》记者鲍拜陪同，登上一座寺庙屋顶，就近观战。天气沉闷，一片寂静。

大沽要塞炮台，僧格林沁近期进行了加固，由 3 条放满水的壕沟环抱，相互间则靠布满障碍物的防御工事连接，中间设有各种陷阱和数行深埋地下的交叉木桩组成的绑缚网等。炮台围墙高 5 米，各雉堞胸墙窗洞架着多门大炮。炮台中心建有内堡，起扩大望和射击范围的作用，上面安置的 3 门重炮，通常向河中射击，而此时已被指向陆地。右岸各炮台，炮弹射程可达对岸各炮台附近，战斗中可向其提供火力支援。而左岸第一座炮台较小，呈边长 100 米的正方形。

清晨 6 点钟。法军炮兵首先向靠近河边的第一座炮台的右侧开火，紧接着，英军炮兵用臼炮和榴弹炮攻击。清军立即还击。英军出动的 47 门大炮，和法军一起，密集炮轰那座炮台。为钳制对方，琼斯和巴热两将的炮舰也越过白河沙洲，轰击最下游的一座炮台。7 时许，一声巨响，可怕的爆炸震撼第一座炮台。12 口径的重炮弹击中炮台火药库，使之爆炸。对当时的场面，吴士礼中校这样描写道：“一团浓烟，犹如火箭一样凌空爆炸，随后，夹带泥土与木块的暴雨，纷纷落下。”霎时间，炮台仿佛不复存在，空前沉静。而不久，浓烟消散，炮台还在！

过一会儿，又一巨大爆炸声在下游炮台震响。同样情景再次出现。但是，这次无疑是法军炮舰击中炮台。联军炮火齐鸣，越来越靠近目标，步兵发动进攻。中国守兵还击不力，射击不准，弹片多在进攻士兵的头上飞过。柯利诺指挥炮兵猛轰对岸炮台，使之再无还击声息。7 点半钟，冲锋发起。

一场白刃战，肉搏战！布隆戴尔将军认为，简直像中世纪战争。戴遂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清军抵抗的场面：“好比古战场那样，清军守兵也很英勇。弹药打光了，抓起敌人打来的弹片投掷过去。然后赤手空拳与我强攻队拼斗，最后全都战死，有的军官则拔刀自刎……”

此时，英军集中全力攻夺炮台正门。他们试图在 3 道壕沟上搭桥，正好成为清军守兵的理想射击目标。搭桥未成，伤亡众多。援军赶到。走运的是，碰巧发现围墙有个洞，是炮弹穿开的；将洞挖大，人可钻过去。于是联军从洞口冲将进去，杜潘上校第一个，其他官兵跟上。进入炮台院内，与守兵拼刺刀。而在炮台另一端，清兵还在射击。法军旗帜在壁垒上飘扬。英兵也破门冲入炮台，并在最高处插上军旗。

临近 10 点，炮台守兵节节败退，竞相逃窜。但他们在外防线受阻，其中一些落入尖桩绊马陷阱。约 400 人战死，百余人逃脱。阵亡者中有最高守将，佩带花翎，着红顶军服，第一座炮台就这样陷落了①。

①这座炮台属北岸三炮台中最小的石缝炮台。阵亡将领为直隶提督乐善，皇帝谕旨：“久历戎行，战功垒著”，“从优赐恤，并著在海口建立专祠，以慰忠魂。”

英国人公认法国人打得漂亮；法国人也承认英国人同样打得好。格兰特向友军致意，赞扬说：“法军将士，怀着第一个把军旗插上炮台高墙上的决心，表现得勇敢顽强，和我军官兵同时从缺口冲入炮台，为他们的伟大国家争了光。”柯利诺将军肩章被子弹打穿；

拿皮耳将军非常骁勇，只有 5 处挫伤，不算负伤。

但是法英双方到底谁第一个把军旗插上炮台呢？按格兰特的说法，是年轻旗手查普林。他尽管身上 3 处受伤，仍高举所在的 67 团军旗勇猛冲在前，先于法军上到炮台最高处，挥舞军旗。吴士礼也称，曾见证那一“美妙的”时刻。

夺取第一座炮台，可谓大获全胜。刚刚早上 9 点钟，中方谈判代表就以赶来。他们要见英法两特使；答曰特使不在。他们要求休战，以便抬走伤员；要求获得同意，但时间仅到下午 2 点钟止。不过，清兵拒绝投降。联军两帅、额尔金随即跟来，一同步入刚刚陷落的炮台。他们看到令人震惊不已的场面；处处尽是死伤守兵，臭味难闻。

冲锋过后，刚刚夺取炮台，极度兴奋的随军摄影师毕托就摆好相机，对这些“绝妙的”战争场面，要从不同角度拍下。据芮尼医生说，他请求在完成拍摄之前，丝毫不要动现场，不把尸首抬走。历史上的摄影师们，凡出名者，都要展示战争的残酷性与野蛮性。

已到总结战果时刻。法军士兵 15 人阵亡，129 人负伤；军官 2 人阵亡，11 人负伤。140 名伤员已全部送进设在新河当铺的战时医院。埃里松失去一位战友布朗凯，这位出身名门望族的中士长，是和杜潘上校一起攻占炮台时身中数弹牺牲的。英军伤亡人数和法军差不多，17 人阵亡，162 人负伤，其中军官 22 名。

而据卡斯塔诺医生统计，法军有 40 人阵亡，170 人负伤。他还告知，联军医生们也曾为四五百挂花的清兵治伤，但这些不幸的人在接受初步处置后，随即把绷带除去。

休战结束，联军又向不到 2 公里远的北岸其他炮台推进。但是，联军的战旗换成了白旗。一片寂静。格兰特将军派巴夏礼前去喊话，叫对方缴械投降。但只得到一位军官的一阵咒骂：“不过就 1 个炮台陷落罢了，还有 4 个固若金汤呢。我们将像第一炮台那样要坚决保卫！”

格兰特和柯利诺协商攻打方案。可是，就在格兰特调动英军炮兵之时，法军等不及，竟向沿河涌去，冲向炮台。对强攻的情形，德洛尔这样描述道：

“法军迈开赛跑般步伐，向随时能发出弹片将他们击倒的炮台冲去。海军陆战队率先冲过第一道壕沟，强击步兵匍匐越过横跨壕沟的梯子；越过第二道壕沟，他们便冲到第三道、即最后一道壕沟。就在跨越之时，强击兵们从墙垛之间看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刺刀，原来他们已经从朝向白河的炮台入口冲了进去。他们试图放下吊桥，可是大门打不开。凭借

战友递给粗绳，他们飞速爬上炮台，只见墙后 4000 清兵跪着求饶。”其实，炮台守兵未作任何抵抗，全都把枪扔在地上或架起来。他们集中在炮台一角，不出声地等着，有的坐在地上不动，有的像是在哀求。

这便是柯利诺将军及海军陆战队所见的出人意料的一幕。接着，蒙托邦和格兰特两主帅进入炮台，并问清兵俘虏他们的首领在何处。俘虏们回答“不知道”。但三个无明显特征的清兵上前解释说，他们的都统，大概是僧王之弟^①，已在第一个炮台交战中阵亡，故部下丧失斗志，不能再战了。没有皇上钦定，谁也不敢取代指挥肩负重责！三人还说，第一座炮台陷落，任何抗击都徒劳无益了。他们乞求放一条生路，以便能去右岸。

^①实为直隶提督乐善。

俘虏实际有两三千余人。该怎么办呢？令战俘万分惊讶的是，他们被允许从容离开。杜潘上校曾指责这种宽大做法，认为是个“错误”，担心这些人回到僧格林沁军中，又将会在以后的交战中与他们遭遇。而布隆戴尔将军，在对华“远征”正式报告中，则肯定了这一做法。他指出：“出于人道而采取的这种措施，确实有一个弊端，即他们将被敌人再度利用，与我们作战。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因严重缺粮，对这些丧失抵抗能力的俘虏已无别的选择，要么放了他们，要么杀了他们。”

在炮台内，英兵发现一些大口径的大炮，上面刻有英文“Moore-Woolwich”（摩尔 - 伍尔维奇）字样。原来是去年英国海军败阵时丢下的……这些大炮后来被运回到英国。

巴夏礼和罗亨利遵照英军主帅命令，举着白旗马上去到白河对岸西口村，与直隶总督恒福谈判。法军三名军官：康普农少校、柯利诺将军副官昂德库和科尔斯，请求陪同前往。一到右岸，联军代表先遇见一位姓王的中国通译。这位年轻官员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曾在美国驻上海使团受训，后赴英美游历。1858 年和谈时，他曾是协助威妥玛的中方译员之一。他这次是来向额尔金特使转交恒福总督的信件的。巴夏礼认识他，却粗暴而咄咄逼人地对待他，声称对方最好直接去见英军主帅。而巴夏礼要到西口衙门见总督大人。

巴夏礼要求总督下令右岸各炮台，连同大炮及兵械库，统统投降。会谈或密谈花去许多时间，约 4 小时之多。双方各执一词，毫无结果。虽经上午的惨败，恒福仍寸步不让。他很清楚，交出炮台，对于他意味着失去官位，甚至会冒死罪。而巴夏礼在向恒福告辞时，显示了他的谈判才能。

巴夏礼问总督大人，是否全城百姓都已撤离大沽。

“没有，他们为何要那样？”恒福吃惊地反问。

“天哪！”巴夏礼也惊讶地说，“叫他们赶快逃命吧，一刻也不要耽误。炮火弹片将像暴风骤雨一样落到那个地方，谁也休想活着出去。我们不愿伤害无辜的居民，妇女儿童、老人或残疾人。您有义务敦促他们尽快逃离。我们只针对军队和官员，我们要消灭他们。”

想不到几句话，竟然产生大效果。恒福一听脸色大变，显得十分紧张。随后，他下定决心，对巴夏礼说道：“好吧，那请下马！我们就此好好商谈。”

就这样，天黑时，南岸炮台投降达成协议。条件是，全城百姓得到尊重，财产受到保护。恒福还获准派人去找回第一炮台战死的主将尸体。这位英勇保卫炮台的将军阵亡，使其他防御阵地丧失了抗击士气。

军事行动刚刚结束，一场可怕的暴雨猛降战场，淹没平原。官兵们冒着倾盆大雨，艰难地向后撤，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塘沽营地与新河营地之间 8 公里的泥泞路上。他们回到全都淹在水里的营地，根本不可能生火。士兵们整个白天什么也没有吃，只得嚼点饼干之类的……一个凄惨的夜晚等待着他们。英军炮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把深深陷在泥里的两门围攻重炮拉回基地，只好作罢，无可奈何地躺在大炮旁边过夜。

一连数日，平原淹在水里，到处变成沼泽。仅差几个小时的工夫，反复无常的天气就会改变这个决定性的一天的进程。杜潘认为：“如果暴雨早来数小时，那我们的炮兵将难以动弹，夺取大沽炮台则不可能。”埃里松也指出：“那一天，要是早几小时遭遇大雨，将使远征中国一败涂地。”英法联军真走运！

杜潘上校对当天的战斗作了个小结：“就这样，5 座炮台，我们武力夺取 2 座及 2 个敌营，缴获大炮 518 门，其中 110 门为铜制，还有大量军需物资。白河从此可以自由通行，联军供给变得充裕。这便是当日战果。另外，我们击毙清兵 2000 余人，包括炮台主将。”巴夏礼非常满意地说：“大家应当庆贺的是，仅用一天时间，花了很小的代价，就迫使 5 座可怕的炮台投降。”

当天的英雄，非柯利诺将军莫属。他始终一马当先，非常勇敢机智，深得英军赞扬。蒙特邦主帅夸他行动冷静，指挥有方。跟随他去攻占炮台的强击兵和海军陆战队，个个都

是好汉。广东苦力也受特别表彰。他们按规定只运送爬墙云梯，但也冲在阵前，参加战斗。格兰特向他们致谢，每人增发一个月的雇佣金。

“这证明我提出攻打炮台的方案对头，必胜无疑。”格兰特将军带着得胜的口吻说道。按他的解释，岸北那座主炮台，即第二座，临海一面防御十分严密，后边朝陆地方向防守则显薄弱，仅有一堵护墙。而且，一旦攻下第一个炮台，主炮台便直接处于第一个炮台的炮火攻击之下。

吴士礼向格兰特将军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写道，对于士兵来说，随便褒贬顶头上司，本属无纪律的表现，但他发自内心要表达“远征”军的普遍意见，那就是：“当时，谁也不如霍普·格兰特大人那样坚定和自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显得高人一筹。如果他能听到8月21日晚上英军兵营人人都向他祝贺，那他定会感到，尽管决心下定时不免有所担心，自己最后总算得到广泛回报。”

明眼人不难看出，吴士礼中校对格兰特司令的称赞，显然意在否定蒙托邦将军！

诺利斯上尉1875年把格兰特将军《征华日记》整理出版，书中也提到蒙托邦将军关于攻夺大沽要塞的态度。在他看来（也可视为在格兰特看来），蒙托邦曾经坚决反对英军参谋部提出的攻打计划，仅同意派遣400法军士兵及一小队的炮兵参战。诺利斯声称当时认真了解情况并得知可靠的消息，蒙将军头天曾答应派两个炮兵队参战，而当天却只派一个队出动。再者，柯利诺当时率的炮兵队榴弹炮出故障，不得不求助于英军。

这种说法也由杜潘上校加以肯定。杜潘认为，蒙将军在攻打大沽要塞首座炮台时明显有错，即将三分之二的炮兵力量闲置，致使柯利诺向出动2500人的英军借用两门榴弹炮。另据诺利斯所言，蒙将军只是在战斗接近尾声，即攻占左岸第一座炮台之时，才出现在战场上，而且竟然没有带剑在身！

和吴士礼一样，诺利斯也赞扬格兰特将军敢于承担可能失败的风险。他回忆说，对华“远征”在英国很不得人心，一旦遭受失败，反对派必然会把法国在这次征战中曾持保留意见拿出来做挡箭牌。格兰特日记出版者曾写道：“值得记取的是，在1860年，人们认为法国人的打仗本领与学问远超其他国家……”关于这次征战中最危险的此次战役，他得出结论说：“结果好才是最好。”他赞颂格兰特将军具有洞察力，以军事行家的眼光，判断出大沽要塞北岸首座炮台防守弱点所在，而其他炮台又依赖于那座炮台。

关于蒙托邦将军的抗议，诺利斯后来毫不客气地写道：“法国盟军的合作给胜利制造

的障碍，比清兵的抵抗还要大……蒙将军在行动中想把自己的责任洗得一干二净，拒绝参加他认为注定失败的进攻，尽管最后时刻出于谨慎盘算决定派出 400 步兵，以表明法军参战。”诺利斯还告诉我们，蒙托邦见事实证明他确实有错，便要求收回自己的抗议。

8 月 22 日

中国守兵混乱不堪地撤离各座炮台，扔下 500 多门炮和数量惊人的各种军需。他们后撤到天津一带。而僧格林沁由 150 名骠骑护卫，也同样撤离，肯定是踏上了回北京之路。

英法军队越过白河，毫无困难地进入右岸各炮台。他们在主炮台中发现清军统帅当作指挥部的木板屋，陈设舒适，墙上挂有军事地图。而两国海军则把堵住河口的各种障碍——铁链、竹排、树栅和突堤等，全部清除。舰队开入白河。

英法将领们评估新的军事态势。由于首战告捷，对华征战似乎走上坦途。即使清军庞大骑兵完整无损，天津已唾手可得。这座重镇距大沽约 55 公里，而离北京仅 100 来公里。前去天津，可取道旱路（白河两岸均通行）或水路。新河和大沽均为后方基地，而白河成为交通和供应要道。事实上，尽管河道蜿蜒曲折，炮舰一天足可开到天津。

因而，北京之路似已打开。

蒙托邦将军毫不迟延，特派身边第一副官德希安赶回巴黎，负责向拿破仑三世呈递大沽要塞投降和约。而格兰特将军认为，随着大沽炮台攻陷并签署投降书，白河水路开通，对华征战业已结束，或基本上结束。吴士礼也写信告知母亲：“第三次中国战争已经终结。”

第二轻步兵营少尉博瓦西厄却深感失望，写道：“战争结束了，所有炮台都落入我军手中。我们刚开了个漂亮的头，远征仗打得太少。这不值 6 个月的海上颠簸。”而同营的另一个中尉保罗·德拉格朗热，则高兴地写道：“天朝外交果然比军队更有本领，必将很快给予我军将士其他报偿和战果。”

米特雷西伯爵强调，这是继 1793 年马戛尔尼、1816 年阿美士德和 1858 年额尔金与葛罗之后，欧洲人第四次深入白河。他乐观地指出：“而这一次，在幸运的 1860 年，这后两位使节终将直抵北京，在天朝都城签订一个条约。该条约将在这遥远的国土上增强两大盟国的实力，并长期建立向全球各国开放的新市场。”

第 11 章 天津议和

白河竞渡

格兰特和蒙托邦抵达天津

占领天津

食物充足

外交登场

草约达成

幸运与不幸

桂良和恒祺失言

中方无诚意

外交官们惶恐不安

决定向北京挺进

增援上海

8 月 23 日

英国海军司令贺布未经事先通知，就迫不急待地率 3 艘炮艇出动，沿白河而上，直奔天津，令法国人大为震惊和恼怒。贺布停靠塘沽，借涨潮之机，“公然大胆深入”内河（高第语）。无疑，他是想为 1859 年惨败复仇！或者是对 8 月 21 日进攻战中海军只起次要作用表示不满！可巴夏礼和罗亨利也加入这次行动，同在“科罗曼德尔”号蒸汽护卫舰上。简直是鲁莽之举！蒙托邦称之为“轻举妄动”。天津似乎由两座大型炮台守卫，架有一批大口径的重炮。然而，英军炮舰沿河行驶，竟未遇到任何抵抗。

“科罗曼德尔”号在天津大运河与白河汇合处一抛锚，恒福总督就来到舰上，随行的有一批大官。他是经旱路从大沽赶来的。英军听说，天津最近加固的城防已经撤空，朝廷大军全都向北京方向退却。而僧格林沁由一小队人马护送，前夜路过津门，未作停留直返京城。

恒福总督要求保护直隶居民，答应对贺布以贵宾相待。贺布却大言不惭，称自己是那里的主人。于是，他下令占领最近的天津城门，其实只是象征性的占领而已。而在场的市民，好奇地观看英兵行动，并无敌意。不一会儿，英吉利国旗便在东门城楼上飘扬。在中国人面前，英军竟如此耀武扬威地以惟一的胜利者自居……巴夏礼还请恒福为额尔金特使

安排下榻府邸。随后，贺布个人使命完成，马上返回大沽。

这一事件实在引人发笑。但法国人不这么看，他们深感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不列颠人）所骗。埃里松觉得，此事纯属“滑稽可笑”，假如它“不是再次证明私利盘算主导着友军的话”。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一同前来，向蒙托邦将军通报英海军司令临时出动。格兰特显得特别诚恳，而额尔金的“吃惊”神情说服不了人。这毕竟是装出来的。

此事中首当其冲、最难忍受的人，当然是法国海军司令沙内。如埃里松所言，当得知英军同僚不告而去的时候，沙内将军“顿时无比气愤，于是紧随其后，想与皇家海军同时在天津显示我国海军军旗。白河之上，两位海军将领展开一场真正的舰赛，一场驶向天津的竞渡……”英法海军在中国这条河流上如此奇特的水上竞赛，当时的随军纪实作者无不加以描述。

8月25日及随后数日

额尔金和格兰特同乘“格拉纳达”号舰前往天津。英军司令率领 1500 名官兵同行。皓月当空，沿蜿蜒曲折的白河溯流而上，额尔金曾称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航行。蒙托邦司令则率领两艘运有 500 名官兵的炮舰同去天津。葛罗也乘一艘小炮艇前往。船只一路上经常搁浅。

蒙托邦 26 日晚上才到达天津。他采取各种措施安顿部队及各勤务部门。天津从此成为法国在华北各项行动的后方基地，直至战争结束，乃至战争之后。

8月28日

蒙托邦将军又沿河而下，返回新河营地，与部队会合。30 号那天，他亲率余部，取道白河右岸，直奔天津；而英军，则从左岸前去。卡斯塔诺医生发现，法军经过在船上以及中国登陆之后近一年的养尊处优，官兵们已不再习惯长途行军。途中不得不频繁休息。天气闷热得很，穿越光秃秃的平原，行进十分累人。有两个士兵和两匹马死于中暑。第二天，情景倒变得非常合心意了，处处可见花园、菜园。部队接到指示要注意军纪，购买食品要按价付钱。

9月2日

占领天津，不费吹灰之力。英法部队驻扎城外，分别坐落于盐库中间的 2 座要塞安营。英军在左岸，法军在右岸。但是，法军主帅十分不满。巴夏礼已和贺布一道于 8 月 23

日到达天津，有充分的时间与城中主要供货商——他们原来为中国军队提供给养——敲定合同，保证英军食品供应，甚得格兰特将军夸奖。可是，法军到来之时，什么食品也找不到了。蒙托邦愤怒不已。按规定，凡途经各地提供的粮食与物品，两军应当兄弟般分享。他威胁说，为使部下吃饱饭，只得去老百姓家抢粮了。英军只得让步，并且道歉。两军分享供给。好在中国商贩都在，食品应有尽有。

天津是个大城市，工业重镇，人口密集，城墙环抱。市民有 30 万还是 60 万，一下说不清楚。蒙托邦发觉，城市“脏得可怕”。天津东临白河，北临连接天津与北京的大运河，既是良港，又为京城物资供应中心，尤其是大米、高粱、小米等粮食和其他各类食品。这也是个仓储之城，特别是销售堆积如山的食盐，以及从俄国进口的皮毛与制品。在有盖顶的大商铺，货物齐全，琳琅满目。

阿尔芒医生对天津物资供应充足大加赞扬：“凡出征过的大兵，恐怕从未见过这么丰盈的食物。”这里有能在法国农促会获一等奖的农副产品。有菜农挑来的新鲜蔬菜——生菜、洋葱、胡萝卜、萝卜、笋瓜等；有鸡鸭肉蛋和野味，以及各种水产海味；还有糖类和烧酒及作料。而且，水果中有一种白葡萄，简直和枫丹白露地区产的那种一样。可以说，大家无不称心如意，真像《巨人传》中的庞大固埃那样一饱口福。

全城居民，有一部分出于安全考虑，害怕被抢，已经逃离。天津道台曾扬言：西方人都是残杀成性的夷匪，到处破坏抢掠一空。因此，联军士兵接到军令，要纪律严明，他们无权进城。但军官例外，故他们竞相前去游览市容，研究地形，了解物产，为过冬作准备。

在城内，英法使节和格兰特住进一处宽阔舒适的宅院。而蒙托邦情愿住在白河和大运河汇合处 1858 年法国公使住过的“衙门”里。两位特使决定再度上场谈判。按各自政府指示，他们要尽可能在天津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自 8 月份以来，中方已多次发出新的信息。如高第所写：“中国人尽管高傲、固执，但也看得清形势，即使不很全面，起码足以使他们希望尽快阻止英法联军继续向前推进。”

直隶总督的信函接连不断，要求停止敌对行动，并宣布朝廷钦差大臣桂良（《天津条约》签字人之一）由帮办钦差恒祺陪同，从京城出发来天津会晤英法两使。再度派桂良大学士前来，联军认为是中方有诚意的一个姿态。恒祺曾在广州任海关税收监督，巴夏礼认识。

难道是咸丰皇帝最终决定结束战争吗？两位钦差大臣前来，是要劝说额尔金及英法联

军放弃推进的念头。

8月31日，朝廷一品命官桂良大学士露面。对这位清朝老王爷，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年前就已认识。额尔金甚至用反话，称桂良大人为“老朋友”。但在9月1日的书信中，他表示怕不得已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看了，“以促使这个迟钝的政府有所悔悟”。

钦差大臣桂良声明，他拥有朝廷授予的全权，并手持国玺。他表示准备就批准《天津条约》进行谈判。他保证，关于3月份最后通牒的任何条款，都有可能达成协议。额尔金按惯例，责成威妥玛和巴夏礼把和平条件转递给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则以同样方式，习惯于只在谈判最后一轮之时才亲自出面，准备工作全由文书们和下级官员事前做好。

英法盟国仍然向中方提出如下要求：

- （一）对白河口发生的“令人不快事件”道歉；
- （二）批准并执行《天津条约》，换文仪式要在北京进行；
- （三）偿付英法两国派遣舰队和军队所耗的“大批费用”，计800万两白银。

谈判中，双方就战争赔款数额等进行了艰难的磋商。清朝钦差大臣要求英法联军不能越过距京城20公里的通州小城。随同英法特使赴京批准条约的仪仗队人数也构成问题，此系最大的问题。中方希望将人数压缩到尽可能的少。据解释，皇帝的圣威不容许过大的仪仗队，否则有可能看作是向武力让步，这点也不符合英法联军的利益。

相反，额尔金出于声望与安全，却打算带大队人马进北京。当然法国人和葛罗本人不赞同这种做法，法方只考虑派出两百来人的仪仗队。他们指出，英国人扬言炫耀部队是为他们所代表的伟大国家和人民争光，这未免太幼稚。用布隆戴尔的说法，法国人担心，“在完成和平手续中”，炫耀武力会带来严重后果。可是最后，他们只得跟着额尔金的要求走。

最后达成一致，英法联军各派1000步兵、炮兵和骑兵，随同两位特使进京，以向中国皇帝递交国书。蒙托邦觉得，英国人总带着他们看来很自然的那种傲慢，只想一件事：尽量修饰他们的形象，借以迷惑中国人。

据杜潘所记，法军从各兵种抽调小分队，组成仪仗队。他们也怀着同样的考虑，“要在北京美貌的女士面前展现他们所有的优势”。蒙将军下令给他们佩戴极为漂亮的领带和

绚丽的绶带。一部分炮兵已改装成仪仗骑兵队，“要在英军众多漂亮的队列中，显示法军最好的面貌”。

据杜潘所记，法军从各兵种抽调小分队，组成仪仗队。他们也怀着同样的考虑，“要在北京美貌的女士面前展现他们所有的优势”。蒙将军下令给他们佩戴极为漂亮的领带和绚丽的绶带。一部分炮兵已改装成仪仗骑兵队，“要在英军众多漂亮的队列中，显示法军最好的面貌”。示不满。对他们的抱怨情绪，拉否例曾揣摩地写道：

“至于大部队，本盼着在飘扬的旗帜下进入攻占的皇宫。可是希望就这样失去了，梦想难成现实，他们不禁深感遗憾。他们咒骂外交，在征战中最美好的时刻突然要他们停下来；也憎恨这些清兵，刚一交火就退却。他们不是去打仗，而是如此这般地沦落成仪仗队，去站队列！真正的幻想破灭……离北京那么近，却进不了城，简直令人大失所望。飘洋过海 5 个来月，接着在白河口只朝清兵开了几枪，尔后在上海对太平军也如此。可以说，这是一场不成功的征战。”部队上下只好相互安慰，都说将可能回家过圣诞节！

葛罗男爵准备了条约草案，写了一段故作庄重的开场白：

“今法兰西大皇帝陛下和大清国大皇帝陛下，诚望了结两帝国之间出现的纠纷，恢复并永久保持双方业已存有但因遗憾事件所中断的和平友好关系，特命各自全权使臣，即：

——法兰西大皇帝陛下，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爵先生，帝国参议员，法国赴华专使和高级特派员，荣誉军团皇家勋位大军官和数勋位大十字骑士；

——中华帝国大皇帝陛下，桂良先生，内阁大学士，特命全权钦差大臣……现就……”

葛罗心花怒放，特向图韦奈尔外交大臣寄去一封喜不自禁的书信：

“大臣先生，本人今日从天津给阁下特写此函，十分高兴地向您宣布，中国政府已在各点上全部让步，一个条约即将在此签署……额尔金和我拟去北京，由一个显耀的仪仗队同往，以互换《天津条约》批文……

本人非常高兴向阁下转告好消息。皇上恩宠，钦派我再次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履行使命，实感荣幸之至。”葛罗顺告外交大臣，下次函件，完全可能从北京发出。

英法联军偏偏忘记中国一则古老的谚语：切勿杀虎先卖皮。条约签字日期定于 9 月 7

日。但在5日晚上，却是震惊和沮丧！清朝钦差大臣又提出联军仪仗队过于庞大的问题。经过数日讨价还价，他们最后竟然申明说：“续增条约不先行入奏，并无画押之权，亦未奉授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之谕”……云云。

最后，恒祺终于向法使团一等秘书巴士达和译员德拉玛神甫及美理登泄露机密。巴士达在报告中说，在得知消息后，他即由恒祺陪同去到桂良大学士处。“这位老者看上去身体衰弱，假装与否，本人不得而知”，他这样写道，但觉得像“是在演戏”。从钦差大臣那儿回来，巴士达马上向葛罗汇报，两钦差大臣承认无权和议签约，是在故意哄骗对方。因此，他建议断绝同他们接触，今后拒绝任何商谈，要坚决向北京进军。葛罗听了，很吃惊，更不安。

英法联军认为，清廷钦差大臣就此撕下了面具。在他们看来，很显然，朝中特派大员承认不拥有画押权，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争取时间，推迟联军挺进京城，迫使他们原地过冬。同时，旨在使僧王调集兵马，加强京师城防。再者，也许为宫廷赢得“北走”的时间。

换句话说，英法外交官完全让人愚弄了……葛罗比之为“恶作剧”，“中国人的花样玩到了极点”。“恶作剧”一词用得恰如其分。在使馆专员凯鲁莱看来，“此计实为无礼，不愧是中式外交，奸诈过分了，未免太稚气”。

和谈破裂的第二天，巴夏礼对中国人的诚信提出质疑。英法联军认为，中方缺乏诚意，已无可辩驳。

然而，英方却有一个声音站出来维护清朝钦差大臣。随军医疗队队长芮尼1864年出版《远征纪行》一书，竭力为中方诚意辩解。他首先问道，桂良和恒祺拖到最后时刻才宣布他们来天津谈判不拥有全权，是否表明他们不诚恳或缺乏诚信。他解释说，两位钦差大臣前来商谈《天津条约》批准事宜，但出人意表，英法盟国却又提出新的要求，于是钦差觉得无权听从。他指出，他们不能超越使命授权，只准备在基本点上让步，甚至已同意天津对西方通商开放。但他们拒绝赔款以及等候赔款期间英法军事占据中方某些港口，也拒绝英法使节由联军仪仗队跟随进入北京。

另一位看来较为尊重历史真实的观察家、西班牙全权公使玛斯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英法联军关于桂良玩弄“狡诈”手法以争取时间的说法是错误的。后来从圆明园找到的一份皇帝朱谕，怒斥桂良接受丧权辱国的赔款条件，并答应英法联军各派1000士兵到北京出席条约批准换文仪式。朱谕中这样写道：

“……（夷人）索费一层，多方要挟，必遂其欲而后止。无论二百万不能当时付与；即有此款，亦断无此理。城下之盟，古之所耻，若再腴颜奉币，则中国尚有人耶！

……带兵换约，谓各有戒心，不得不防，若经议抚，何必拥兵，若拥兵而来，显怀莫测，……京师重地，尚可问乎？

以上二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置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①

^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26-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桂良钦差大臣等并未试图愚弄英法两使节，只是受到本国皇帝的责备……

对此种解释，中国一些史学家予以肯定。如贾桢1930年撰文指出，皇上得知新协议条款，大为不快，并全盘推翻。他不允许大批夷人军队进入京城，鉴于朝廷礼仪，更不让夷国使节直接向圣上递交国书。

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华裔教授汪荣祖认为，指责清朝钦差大臣伪善是站不住的。中国皇室档案表明，咸丰皇帝对英法联军的意图极为怀疑。他们为何硬要带数百甚至数千兵马进北京？——他们带重兵前来，欲给我国强加更难接受的条款。——皇帝如此担心，所以才责备钦派的谈判代表桂良大学士表现得太软弱。

中方谈判代表就此消失。英法外交官们处境十分尴尬，他们突然变得对联军将领和颜悦色，并把事务领导权乖乖地移交到军人手中。吴士礼说，可以猜想出将领们那种刻薄的笑容，甚至听到他们不住地哈哈大笑！

埃里松在《一个副官的日记》一书中调侃地写道：“……当有人平静而天真地告诉我们，那个与我方谈判的朝廷命官不拥有全权、未肩负任何使命；那是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普通路人和我们闹着玩，无缘无故地和我们谈上一番，以打发时间。我还记得当时蒙帅的大笑和参谋部的冷嘲热讽。”

而令人惊奇的是，额尔金和葛罗两爵士竟然连基本的谨慎都没有，未曾要求中方钦差大臣验证一下他们确实拥有的全权，并看一眼国玺。蒙托邦将军见葛罗特使“深感痛苦”，尽量给他鼓劲。当蒙托邦对外交官们的疏忽和天真表示惊诧时，葛罗的回答更让他目瞪口呆

呆：“本人未能那样做，实为遗憾。不过，在某些社交界，人与人之间过于谨小慎微，反而让人厌恶。”

“本来多好啊！实在可惜！一切又得从头来！”高第惊叹道。原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其实还没有呢。原以为已经到了北京门口，看来可能要推迟，或者推到永远！原以为中国人除了求和外走投无路，现在发觉他们还没有失去勇气。杜潘猜测清朝当朝者的内心想法、不可告人的期待和小盘算。他认为，他们想利用“我们战线过长，冬季临近的不利条件以及他们自身巨大的资源”，指望“诱我军深入，然后重重围困，大举歼灭。要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我们一举打垮，要么化整为零把我们一一吃掉”。

联军将领们也受外交失败的打击。宝贵的一周时间白白浪费，无疑利于僧王重整旗鼓，调兵遣将，加强京城防务。杜潘注意到，当失望引起的愤怒平息之时，已是数日过去，联军尚未决定采取什么行动。

然而，英法联军必须当机立断：向北京挺进。布隆戴尔将军指出：“中国假全权代表诡计一揭穿，外交行动必然中止。”

北京。狂热之梦正在变成现实。英军中，无不欣喜若狂地高喊：“万岁！现在大家同去北京！”而葛罗男爵希望得到谅解，便以此理由抚慰蒙托邦将军的自尊心：“我几乎想恭贺您，夺取天朝京城，在一个将领的业绩表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联军已想到要组织车队——“快乐之车”，以使所有军官均能观光中华帝国神奇的首都。

额尔金勋爵尽管沮丧，自尊心深受伤害，但第一个对事态的转换表示欣慰。9月6日，他致函妻子说：

“我又要开战了！愚蠢的中国人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这正好给我一个统领大军长驱直入北京的绝佳借口。”额尔金还添油加醋地说，正是这些“愚蠢者”的不恭，才使他断绝同他们和谈。他庆幸行动计划有所改变，即向北京进军，不再以和平方式，而是以战争方式。这里所暴露的心态，说明了事态的后续发展……

葛罗男爵也认为，这一“暂时的延误”对英法联军利大于弊。联军将可在中国首都部署部队，向清政府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葛罗竟然这样说：“这些难以想像的欺诈，只有在亚洲种族、特别是中国人中才会碰到。这虽然使我的计划受挫，但是尚未摧毁我的希

望。”他坚信，清政府最终必定会让步，皇帝可能出塞北去，用不着遗憾。何况，据说是重病缠身的皇帝呢！

然而，令人不安的消息自上海传来。太平军为海关银库吸引，对上海形成空前的威胁。留守上海的，只有 400 左右的法军士兵，800 来个英军士兵以及数艘炮艇。故而，联军紧急派遣增援部队返回上海。格兰特将军抽调 3 个步兵营。蒙托邦将军忍痛割爱，分出 200 士兵和半个山炮队，回去支援留守法租界的法布尔上校指挥的部队。可惜，增援部队来迟了。徐家汇教堂与传教团被太平军捣毁，一位神甫被杀。上海郊区乡镇大多被太平军占领，而英法联军为赶走太平军，放火烧毁了这些城镇。法租界住宅区严重受损；幸亏居民早已逃离，才免遭生灵涂炭。

第 12 章 “人质”危机

纵队开向北京

新派钦差大臣

这次有望议和

额尔金狂喜，夸奖巴夏礼

葛罗男爵乐观不已

开往通州

怡亲王答应签约

“九一八伏击”

张家湾战役

洗劫该城

达马斯中尉之死

30 多人无音信

联军愤怒

“九一八”为“远征”转折点

葛罗的见证

责任全在僧格林沁

泰西埃认为，“圈套”之说系编造

“奇怪的隐情”与洛图尔的过失

挺进北京，风险四伏。如巴吕告诫，这可能“暴露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加速清廷瓦解，导致皇帝下台，改朝换代；同时，这将使中国及常驻的欧洲人蒙受损害，使帝国横遭野蛮蹂躏”。

其次，这次进军有可能拖长，困难而危险。必有新的仗要打。英法联军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拥有的文件和材料，仅是马戛尔尼当年的行程路线和伊格那替叶福提供的一张俄制地图。据海军的侦察情报，因水不够深，在天津白河上游无法航行。法军运输工具不足，故军需供应问题严重。

《中国远征纪实》作者巴赞库尔男爵认为，这仅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是一场真正大战的开始。“对于统领这支联合远征军的两司令来说，真正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坚决地冲向一个全然陌生之境。联军将进入什么样的地方？部队及行装和炮兵是否会被意外的困难和障碍所阻？海军因水深不足无法溯河而上，那么联军安营扎寨和物资供应将有何来源？而部队给养可能出现的困难及所带来的危险，比要战斗更为可怕。”

9月9日—11日

英法联军打算用6至7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逐步向北推进，直抵通州，那里是清朝都城北京最后的门户，距北京不远。联军分3个纵队，相隔一天出发。第一纵队9月9日起程，包括英军800步兵和600骑兵以及2个阿姆斯特朗炮队，额尔金骑马跟随。

10日，法军纵队出发，秩序井然。由冉曼将军部下3000人马和2个炮兵连组成。

对法军和使团出发的情景，拉否例这样描写道：“法国使团随军出征，占有显要地位。两个北非骑兵开路在先，紧跟而来的是葛罗男爵的轿子，由身强体壮的广东苦力抬在肩上。接着是蒙托邦将军及参谋部成员。走在后面的大队伍，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中国土地上，为越过先驱者们止步的界限而倍感自豪。”

据说，葛罗本想留在天津，等候事态的发展。他觉得，这样“对于使臣来讲，比去冒征战风险更为适宜，更合身份，更方便些”。可是激奋不已的英使额尔金不听他的意见，不愿离开英军主帅一步！葛罗于是不得不也随军而行……在致外交大臣的信件中，他写道：“一场如此特殊的外交之战，无论它对我来说有多么艰难、严酷，我都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在天津和谈失利之后，我便随法军一同前进了。”

为此，葛罗带了一支可观的外交使团及车队，有一批要员和随从，25 辆马车、4 顶轿子以及 40 来个广东苦力。随行成员中有秘书巴士达和韦努耶、通译美理登和德拉马神甫、特里科海军上校、沙内将军副官约雷斯上尉，以及使团和军队联络员年轻军官布布隆。另外还有 5 名欧洲仆从，3 位中国文人和 8 名水手等。葛罗率的随军使团享受军人同等给养，由军需处供应配额饼干、熟肉及白酒等。

9 月 11 日，英军后续部队约 2000 人由米启尔将军率领，最后出发。每日行军，均由一支新纵队轮流开路。每段行程都相当短。天气炎热难以忍受，穿越沙质的平原，道路两边尽是高粱地，高粱比骑在马上的人还要高，阻止空气流通，故而行进非常艰难。许多士兵都中了暑。另外，士兵们爱喝一种劣等的高粱酒，后来明令禁饮。

第一纵队上路后的第三天夜里，营地突遇暴雨袭击。大批护送物资的苦力乘机开小差，并把马匹和骡子带走。这是否是僧格林沁插手所致？总之，联军曾这样怀疑。就在天津，不知是意外还是敌意，联军马厩竟然失火，一些马匹烧死。幸亏多数马匹及马鞍绳索被救出。

局面令人担忧。

部队不知何时能继续前进。蒙托邦将军极为沮丧，他的部队陷入瘫痪。而见轿夫逃走，葛罗特使则更加绝望……

幸运的是，如上尉参谋沙努安所说，“天无绝人之路”，炮兵上校本茨曼和架桥兵上尉布莱维尔在露营地周围转悠时，发现远处桅杆高耸。有桅杆，必有船只；有船只，必有航道。果然，那条河流仅由高粱地隔开，与联军营地近在咫尺，有无数帆船从通州南下。经打听，船老板们回答说，这条河系北京运粮通道。原来是海军弄错了，把这条 150 米宽的河流与不通航的小运河相混淆……侦察明显有误，竟然以为白河上游过了天津 3 公里就不再通航，连两头尖的小木舟也不行。对海军所犯的这一错误，贝齐亚上尉严加抨击。

于是，60 来艘中国商船被征用，日租金 2 个皮阿斯特。架桥兵把船只集合起来，而将船员妥为扣留。由此组成两支船队。一支运送病员回天津，返航时装载粮食和弹药；另一支负责运送原来由马车装运的东西，苦力逃走后，马车已经没用了。上述行动迅速展开。杜潘上校向架桥兵，尤其对那位被他冠以“浮桥上尉”绰号的布莱维尔表示敬意，赞扬他们“拯救了对华远征”。这场“远征”再次走运。多亏这支临时组建的“海军”，联军才能自天津获取保证充足的给养。

9月12日至13日

联军勒令天津道台提供马骡。经再三催促，他才勉强去办。但是，送来的这批母骡拒服鞍辔。英使团及其客人琼斯上将、海军军官海约翰和记者鲍拜，都各自驾驭着不驯服的骡子！联军越往北上，一路越是空旷。

然而，中国皇帝决定做个走向和平的姿态。联军得知咸丰帝特命皇室成员、实际主政的三大王爷之一怡亲王载垣，由军机大臣穆荫和恒祺陪同将前来议和。恒祺为联军老相识；桂良已退场！新钦差大臣恳请英法联军不要再向前推进，并返回天津，否则有可能置和平于危险境地。

怡亲王以清朝外交特有的夸张风格致函英法使臣额尔金和葛罗：

“为照会事：

照得本王大臣等恭奉大皇帝恩命，作为全权大臣，前赴天津，与贵大臣商办业经允许条款章程。……乃闻贵大臣又有由天津排队前来之事，实为骇然！查贵国与中国既欲永敦和好，商办条约，安有排队之理？既须排队，即非和好，似此情形，本王大臣等转未便率行前进。应请贵大臣将所带队伍，悉行派令折回天津，以示并无嫌隙，庶本王大臣等得以到天津会晤商办，以为永远和睦之道。

再，如欲照现定条款办理，并无格外增添，本王大臣等非同桂中堂可比，断不食言……”^①

^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52-5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额尔金和葛罗通过巴夏礼、威妥玛和巴士达转告清廷钦差，鉴于前派大员背信弃义，在抵通州之前不存有商签任何条约的可能。但是他们准备与中方新任全权代表谈判，恢复在天津中断了的和谈。

怡亲王仍然要求英法军队撤回天津，充分确保和平。反之，若联军继续推进，那不要为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而惊讶……怡亲王如实地告知对方，清军只听将帅的指挥，他本人对军队作不了主。显然是威胁性警告，不禁令葛罗不安。他写道：

“中国政府总算愿意让步。但是，朝廷大臣的急件，让人不快。他们对军队的说法，

说什么对军队做不了主；还要求我们不带兵入城——简直是昏话——这倒使我们要多加思考。”英国领事威妥玛则觉得，怡亲王面带“一副凶狠而伪善的样子”。

9月14日

绵延的丘陵在天际展开，在这美丽的景色中，部队行进极为惬意。在津京一半路程的漂亮小村河西务，法军纵队与英军先头部队会师。次日，英军第二纵队也驻扎下来。这样联军从天津出发的3支人马汇集一起。气候十分宜人，供给毫无问题。当地盛产蔬菜、山药和白薯，而且还有上等葡萄之类的，令吴士礼甚为满意。

额尔金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前去通州，拜会朝廷钦差大臣怡亲王和穆荫。两位英国外交官已在华任职多年，很会玩弄手法控制对方。谈判持续8个小时，进行得实为不易。穆荫装聋作哑，故意显得听不懂对方说的汉语，其实人家已是久经锻炼的文人。而怡亲王，则装着对在天津商约条款概无所知。于是，他逐一过目似乎已获最终解决的主要问题，如英使常驻京城、天津开为对外商埠、战争赔款限期、英法特使带兵入京，以及联军驻扎营地等。直到最后，怡亲王不再坚持，遂表示退让。他交给巴夏礼和威妥玛一封急件，完全同意额尔金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只字未提皇帝接见英法使节之事。

额尔金得知达成协议的好消息，甚感欣喜。他不久前曾称巴夏礼是个不负责任的危险人物，这次对他则大加赞扬：“巴夏礼实为本人从未见过的最杰出的人之一；其活力、勇气与才干，不知何处有人相比。加之他操一口流利的汉语，故堪为最佳人选。”

9月15日

出乎众人意料，从外交上看，似乎一切已经解决。威妥玛特别感到自信，硬是坚信新派钦差大臣真心实意，认为他们诚望避免新的敌对行动。

英法联军可前进至通州南5公里之处，在白河支流畔张家湾镇附近安营扎寨。通州是一个拥有40万人的重要城市，城墙环绕，位于白河不通航段与向首都护城河供水的水渠交汇处。远远望去，就能看见俯瞰该城的那座十三层宝塔。

看来，两位全权专使可以各带千人仪仗队进京了。来人是朝廷顶级大员，又为亲王和兵部尚书，而且有他们的保证（即“我们签字等于圣上钦此”，“我们与前任不同，有权画押”），既然如此，对人家何必再存疑心。

按商定，巴夏礼等将于9月17日再去通州。

在葛罗和额尔金看来，这一次，和平似已赢定，和平协议应在该城达成。而蒙托邦尚不确信，遂命留在天津的柯利诺率部前来会师。

9月16日

正好是星期天。在河西务，额尔金由英军将领陪同，在他所住的那座漂亮庙宇做礼拜。据罗亨利所述，这是他们其中一些人最后一次参加此类宗教仪式。额尔金对巴夏礼和威妥玛所取得的和谈成果感到高兴，他已经想到和平进入北京之事。他会同葛罗，正等待英军在通州附近扎寨安营。

这座赏心悦目的小城遭受了洗劫。额尔金是个宿命论者，不禁感慨道：“我感到抱歉，这个小城横遭虐待，居民四处逃离；抢劫发生，阻止不了。”葛罗致信图韦奈尔外交大臣，也表示了同样的愤慨：“见我军和盟军士兵犯下如此破坏行为，我内心很是沉重。而且，他们竟然还相互推卸这种滔天罪行之责。”

这种情景，在洗劫圆明园之后，又何止千百倍地重新上演。

9月17日

一部分部队穿过玉米和谷子田，又朝马头村推进二十来公里。沿途老百姓的态度，已有明显改变。凡途经的村庄，居民早已逃离一空。部队路过时临时形成的集市统统消失。平时竞相前来表示友善的地方官员，现已全无踪影。马头村也同样撤空，还留有清军马队露营地痕迹。可见，敌军离得不远了。

英法代表同朝廷钦差达成协议，联军营地应设在张家湾一带。根据约定，英方巴夏礼、罗亨利和诺曼（驻上海使团专员）再去通州见中方全权大臣，就安排英法特使和全权代表会谈作最后敲定。

英法派出一个侦察组随同前往。英方有负责营地和供应的沃克上校、军需官汤姆逊，两人提前去看营地并张罗物资；还有《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很想跟随他们逛一下该城。法方有蒙将军指定的炮兵中校格朗尚、参谋部上尉沙努安、北非骑兵少尉奥斯曼、军需助理杜比、管理处中尉阿代尔和加热，以及任通译的杜吕克神甫，他们也负责安排营地事宜。

同时，葛罗特使也派出首席秘书巴士达携带致中方全权大臣的信件；随同的有通译美理登和科学委员会主任洛图尔伯爵。洛图尔则可自由行动；按蒙将军说法，所谓自由活动，就是因他最近学了中文，可以离开营地，独自去通州，当然由在上海招用的一个中国秀才陪同前往。

蒙托邦后来写道，在派出“这些年轻体壮的部下时，本人就有一种忧伤的预感”。他的儿子夏尔很想随同前去参观一下这座城市，他加以反对；其实并非军纪迫使他这样做。

17日清晨，天气凉爽宜人。

据罗亨利叙述，大家非常快活，每个人都在想战争将很快胜利结束。英法两支小队一同上路，信心十足。法军小队由数名士兵陪同；英军小队，另有6名龙骑兵和范纳团20来个锡克兵，由安德森中尉带领。一路上，没有什么引起他们怀疑的。他们只见一些清军小队骑兵，对他们并不在意。“我们向左行进，未进张家湾；掠过该村，沿途遇上清军步兵。而骑兵则在我们面前驰过……不对我们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威胁流露；官兵见我们穿过他们的队伍，也似乎毫不注意。”距城数公里，他们已越过双方商定的联军部队应当停住扎营之处。

然而一位职衔较高的官员前来，想跟巴夏礼说话。此人称，他曾是新河炮台守将，自被联军攻占后便失宠降级。这位败将很想亲自与胜利者握手问好！巴夏礼向他引荐了资格最老的沃克上校。这个清军将官，果真是个和蔼可亲的贵族！

约十点半钟，联军谈判代表团抵达通州，受到有关官员热忱迎接。许多市民争先恐后地涌上街头，毫无敌意。代表团住处安排在一座寺庙里。

巴夏礼和罗亨利与朝廷钦差大臣会谈。先后持续7个多小时。罗亨利向怡亲王通报和约草案，转交额尔金的快件。函中宣布条约一旦在北京批准，额氏将向中国皇帝呈递英国女王的亲笔信。

面对这一新的要求，钦差大臣惊讶加抗议。英方代表意想不到的，对方提出有关困难——只要不放弃英使向皇上呈递国书的要求，便拒绝条约达成前进行深入谈判。巴夏礼白费劲地解释，说这个要求仅供商讨，额尔金并未当作“必要条件”，可无济于事。令英方代表震惊的是，对方口气突然变得敌对。巴夏礼连忙重申，把国书问题放到以后再说。钦差大臣显出让步姿态。联军驻扎营地和军需给养等问题摆到谈判桌上。协议终于达成。双方商定将发表一份声明，安民告示：中国皇帝与英法两国君王刚刚达成和平协议。拉否例

认为：“外交上，和平已经获得，只待正式签字。”

法方代表做法更为简单，巴士达向怡亲王转交葛罗特使的信件。他形容这位亲王对身边人举止高傲，表明他“习惯于发号施令，更确切地说，是习惯于被人服从。其表情极显严厉但不乏儒雅”。怡亲王表示准备签署和约。鉴于巴士达问亲王是否拥有全权，亲王断然回答，决不欺诈，拥有比其他所有全权代表更高的权威，他签字即皇上签字。

经过整个白天的谈判，各自都认为全部困难现已扫平。共进晚宴。恒祺前来，礼节性拜访。大家较早入睡。已商定，沃克上校、汤姆逊、巴夏礼和罗亨利由6个龙骑兵和3个锡克兵护送次日凌晨动身，回到安营处与英军部队会合。巴、罗两人向主帅汇报后，又返回去为特使住处选址。而诺曼、鲍拜和安德森中尉，则决定与18个锡克骑兵留在城里，并去“收集点儿小摆设”，即到古董店购买一些收藏品。

巴士达宁肯次日一大清早就离开，会同美理登、奥斯曼、沙努安上尉及两个北非骑兵一起上路。夜里，美理登带来的那个中国秀才受到衙门杂役的威吓。两位会计官阿代尔和加热、洛图尔伯爵以及外交官的仆人和马夫，全都愿意留在城内。

9月18日清晨5时许，英法联军离开马头村露营地，前去张家湾附近原中方应允的地点驻扎。英军走在前头，行进中与一小队清军马队不期而遇；这队清兵原驻守一个大农庄，闻风而逃。稍远处，可见一批加强营骑兵，高举各色战旗。出于谨慎，格兰特将军下令把辎重行李扔下，集中到清兵撤走的那个农庄里。

在城中过夜的英法军官和外交官，应与指定安营之处的部队会合。自昨夜以来，当地的情形大有改变。到处都有清军部队在移动，和他们朝同一方向前进。此时，田野里已遍布清军。步兵沿道路部署，而马队甚至朝联军应安营的地带调动，构成弧形包抄阵势。

举着谈判旗（白色）的两个分队，在返回大营路上，猜出某种事态正在酝酿之中。他们认为，将有一场伏击战。务必尽快报告将帅们，但是要穿过敌方防线。沙努安上尉主张强行通过。相反，巴夏礼决定回到通州，尽快把危险情况通知未离开的人，也要向怡亲王说明情况。他由龙骑兵菲普和举谈判旗的锡克兵陪同。而罗亨利则快马加鞭，去通知格兰特将军，要求大军停止前进，先弄清发生了什么情况。至于沃克上校和几个锡克兵，则焦虑地等待着巴夏礼回来。巴夏礼在返回的路上遇到巴士达，正好告诉他，他怀疑中方变卦。

此时，联军大队人马正朝张家湾行进。那天，格兰特将军走在队伍前头，派人前去告

知法军司令，他发现了对方的骑哨；他们要去的营地，清军尚未撤离。于是，决定停止前进。这时恒祺现身，想见两位特使。特使要求他作出解释，他说这其中定有误会，因而要求联军将领撤回部队。但英法主帅作了必要部署，以防万一。

清军继续调动。战马飞奔，尘土飞扬，便是明证。

法军主帅主张立即发起攻击。双方商定，处于右侧的法军从清军左侧绕过敌阵，由英军提供锡克骑兵队支援。待法军准备停当，英军则在平原上出动炮兵和步兵正面迎击清军；而骑兵将从敌右侧包抄其后路。

沙努安上尉，接着巴士达、美理登、奥斯曼和加热中尉，好不容易回到联军前线。沙努安向蒙将军汇报，说从通州返回路上，他不得不穿过一支人马众多的清军部队。几个兵勇先不让他通行，后经说明自己肩负和平使命，他便推开他们，继续上路。其他回来的人也都谈到路上通行困难。巴士达露出一副非常不安、失常的样子。之后，他在报告中写道：“我在蒙将军身边待了一小时左右。清兵继续从右翼向法军方面移动，但看来，同他们的交战并不会立即打响。”加热中尉也汇报说，亲眼见到敌方 1.5 万骑兵。蒙托邦打断他，问他是否清楚 1.5 万骑兵是何规模！加热并不紧张，回答说，他曾在吕内维尔军营长期当会计，习惯于估算骑兵人数，因此他肯定不会弄错！

将近 10 点钟，忽然从敌营发来三声炮响和一阵火枪扫射。只见沃克上校策马疾驰，向英军营地奔来，后面紧跟着护卫的骑兵，几乎全都负了伤。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巴夏礼走后，沃克本该等他回来，正好借处在敌方前线之机观察备战情况。他不太放心，便警觉起来。不远处，他听见一阵吵闹声。见一些清兵正在殴打一个法国军官，并声嘶力竭地呵斥。沃克上校急忙赶过去，见那军官头部严重受伤，军服沾满鲜血。法国军官拼命地反抗，其传令兵奋力保护他，用刺刀刺向朝他上司扑来的敌兵们。

沃克上校本想上前救助他们，可是几个清兵向他猛扑过来，夺走了他的大刀，想要摆他个人仰马翻。当他与这几个人拼斗之时，早已倒地。被解除武器的财务官阿代尔冲他喊道：“快去大营，报告这伙无赖的行为！”沃克身陷重围，别无选择。他右手已负重伤，只能设法逃出。多亏那匹骏马，使他率六个随行士兵冲出敌围，清军向他连发三炮……

沃克上校报告蒙托邦将军，那个传令兵，即勇敢的轻步兵奥祖夫，应该得到法英各种军功奖；他还希望看到其名字将刻在公共纪念碑上。当时，阿代尔中尉携带着购置军粮的 2000 皮阿斯特钱袋；钱袋后来找到，可惜已被倒空。

罗亨利几经波折，总算遇到英军皇家炮兵上尉布拉巴宗带领的先头部队。上尉带他去见格兰特将军。罗亨利抓紧汇报了自己所见的情况。他强调，等过了两小时，再发起攻击。这是救出巴夏礼和还在通州的其他人的惟一机会。

罗亨利充满勇气，又请求让他再去通州，以便找到巴夏礼等人，帮助他们逃脱劫难。奇怪的是，请求竟得到应允。两个锡克骑兵陪他同往。罗亨利把手绢递给那个名叫纳尔辛的锡克老兵，捆在长矛顶端，当作白旗。不一会儿，布拉巴宗上尉获准飞马跟上前来，同时借以侦察地形。罗亨利不愿上尉跟来，但要他返回已为时过晚。其实，他深知自己此去定无生还希望，再搭上另一条命完全不值。格兰特将军也为放走布拉巴宗而懊悔，但庆幸拒绝范纳少校陪同罗亨利而去。

开战时刻，法军已等得不耐烦了。但是，英军主帅听了罗亨利的理由，不愿急于动手，生怕将尚在中方防线后面的人置于危险之中。蒙托邦将军不赞同这种看法，反而认为救出这些人的最好办法，是“向敌人埋头猛冲”。柯利诺也持同样意见：“英军主帅太固执。已经等过了。还要等什么？”

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姆吉神甫指出，法军将领当时言之有理。在他看来，炮兵先朝通州猛轰，骑兵接着冲锋，肯定能救出被扣的人质……如今，这种意见已为大多数英国史学家认同。

可是，格兰特将军当时似乎不太担心。他依然希望巴夏礼能见到清廷钦差大臣，向他们据理力争。他相信巴夏礼，相信其非凡的才干、惊人的毅力和以理服人的能力。额尔金说过，他巴夏礼“一个人就顶一支军队”！

发动攻击的时刻终于到来。英法联军只有 4000 人马，要对抗 2.5 万清军。僧格林沁统帅的步骑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组成数公里的大弧形包围圈，想把英法联军团团围住，使其束手就擒。僧王起码希望如此。

米启尔少将率师从左侧顶住清军主力马队。一时间，本茨曼上校指挥的法军炮兵陷入危境，英军范纳骑兵队立刻前去救援，这使卡特利中尉后来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英法联军成功切断清军防线，将其一分为二。英制阿姆斯特朗重炮和法制有膛线山炮齐鸣，猛轰敌阵，普罗宾和范纳率领印度骑兵出击，所向披靡。联军占领了一座大营，里面设备完好，有棉帐篷和齐全的炊具。同时缴获 80 余门炮，烧毁大量火药；1500 名清兵战死。

已是下午 2 点钟。布瓦西厄少尉描述当时的情形：“我们 4 点半起床，现已上战场 10

来个小时了，胃里除出发时喝的一点咖啡，什么也没有。再说，天闷热得很，每人身上还背着6天的干粮。”埃里松认为，“也许从未有过一支人数处于如此劣势且已疲乏不堪的部队，能表现得如此安静，并充分表现出士兵的两大素质：听从指挥，勇敢无比”。

柯利诺指出，联军尽管人马处于劣势，但两军对垒——真正的交战——最后大获全胜，继夺取大沽要塞之后取得又一次胜利。当然，就战事而言，当天还不是决定性的。

法军为北非轻骑兵中尉达马斯伯爵的阵亡而悲痛。这是一位英俊而有骑士风度的军官，名门望族之后，复辟时期外交大臣之子。当北非骑兵冲锋时，他不幸被一个自己曾姑息过的敌炮手开枪打穿腹部。蒙托邦将军对失去这个年轻有为的军官甚感痛心。他早在非洲结识了达马斯，也与其父相熟，“这位曾为国增光的老人”行前亲自将儿子托付给他。

白天过去了，很多人仍无消息。法军方面有格朗尚中校、杜比军需助理和杜吕克神甫等。美理登后来致函明稽孚主教称，这一方面是命中注定，另一方面是同伴们太不谨慎，“为贪睡多待了两小时”。他还说，尤其是杜吕克神甫，“要是他们跟我一起走，不就得救了嘛”。至于洛图尔，更是极端不谨慎，竟然部队未出发，就独自一人先行。据蒙托邦将军解释，洛图尔很想住到一户居民家，硬是强行把人家赶走；战斗未打响，谁也不敢和他说什么。可是，当地人得知别处已向联军军官下手，便将他和随行士兵都抓起来。

英军方面，最担心的是巴夏礼，中国人恨死他了。还有罗亨利、诺曼、安德森、布拉巴宗和《泰晤士报》记者鲍拜；另有龙骑兵菲普和19名锡克士兵。

葛罗男爵在日记中提到两位中国神甫寄给他一份关于英法谈判者及随同人员被扣的报告。两神甫称，可能是兵部尚书穆荫建议在离开通州时将他们扣留，而命令则系怡亲王所下。大概因巴夏礼言行放肆，惹怡亲王大怒。当时双方商谈气氛紧张，巴夏礼气急败坏，竟然将桌子掀翻，把陈设的瓷器砸个粉碎……这说明，面对中方的无动于衷，英国人已无法保持冷静！

9月18日那天，应该用黑石笔标出。之所以如此，并非因当天所打的仗，而在于英法双方三十多人失踪，有军人、外交官和文职人员等。从那时起，联军特别挂念失踪者的命运。焦急不安变得恐慌不已，愤怒转为心病。他们究竟怎么样了？清军如此对待在免战白旗保护下通行的军人和外交官，英法联军很快表示忿忿不平。在所有文明国家，不是有谈判者人身不受侵犯的规则吗？清军心怀鬼胎、阴险奸诈、背信弃义等词语，不断在英法联军的口中或笔下出现，用以痛斥这种“可恶的行径”。

联军失踪者从此成为人质的命运，对后来的战局起着决定性影响。结局将很严重、惨重。

和谈，当然已经中断。新的战斗即将打响，且必是决定性之战。埃里松甚至流露出杀气腾腾的口气：“务必冲向中华帝国首都，要使清朝君王心惊胆战，要不惜任何代价救出人质。”

为报复中方扣留人质，英军主帅下令洗劫张家湾小城。当铺里大量金砖银锭、珠宝首饰，全被一抢而空。杜潘上校不能不说：“按他们凡有用之物统统攫取的习惯，他们（英国人）把该城全都抢了个精光。”吴士礼中校则描述，英军洗劫张家湾之后，也有中国人前去拿走家具和衣物等。郇和领事感到愤慨。卖高粱酒的小店、或当铺也遭苦力们抢劫，倒也罢了，因为这几乎可以说是战争的法则。而那些古雅的老宅院，雕梁画栋，存有许多艺术珍宝，凡抬不走的均遭无情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

姆吉神甫发现：“在抢劫中，印度军队及兵营中的妓女、香港苦力，比英兵更厉害。”当然，他还保证说，妇女和姑娘在家中则受到英国军官尊重。不过，她们之中不少宁愿服鸦片自尽，一个年轻女子就从大桥高处投河身亡。只有一些人得到军医救助活了下来。

乐善好施的姆吉神甫征得主人同意，将一家大宅院用来接待那些受威胁的家庭。郇和充当翻译，要动员一位胖妇人及女儿携 15 个女佣一起住进去。但纯属枉费心机。老妇人说，洋鬼子的话不能信，“他们心术不正”，何况她也不想再活了。英兵强行将她和女儿推进马车，而佣人“如羊群”似的跟在后面。可是，没等车到达目的地，老妇人便把女儿勒死了……这位英国教士的慈善之意，并未得到报偿。那天夜里，所有寄宿的妇女全都跑掉了，不愿接受“洋夷的照顾”……

联军坚信，被中方所扣的三十来个人完全中了圈套。但是，确切情况究竟如何呢？

中方态度突然完全改变，人们议论纷纷。最简单的是，把一切归结为双重性，即清朝宫廷有两派，主和派和与主战派。某个时期，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现在是僧格林沁为首的“鹰派”占了“鸽派”上风。

外交官拉否例解释说，9月13日，怡亲王接替桂良主持与英法使节进行新的和谈时，清廷已处在大混乱之中。但他强调：“我们由衷地相信，那一天，清政府不会预先就有出尔反尔或设圈套的考虑。”清政府打算在与通商有关的问题上让步，但不愿支付英法要求的赔款，不同意他们带 2000 兵马入京，当然更不愿两位使者亲受皇帝接见。在北京

看来，这是“极端可怕的”条件。中华帝国哪能同意与夷国君王平起平坐，并回复他们的国书。这关系帝国威严！

拉否例认为，“在皇帝临朝议政时，僧格林沁强硬派占了上风；他便在通州调集重兵把守。背信弃义也罢，误会与偶然也罢，敌对行动重又展开……对联军拥有的行动手段完全轻视或极不了解，固执、高傲又盲目，三个词可概括中方政策”。他甚至带着严厉的口吻说：“一定要让中方丢尽脸面，低头到地，乖乖地承认失败和错误。不用再等多久，他们将得到最后的惨重教训。”

对中国方面何以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最有资格理解的是额尔金。他致书本国政府，作了这样的分析：他不相信是怡亲王违背诺言。鉴于亲王显赫地位，理当值得信赖。反之，他认为，僧格林沁将军得知全权代表同意英法联军在张家湾附近驻扎，有损于他们的军事部署，故而变得狂暴起来。

在额尔金看来，僧格林沁只想大造声势，借以弥补要他做出的牺牲。额氏注意到，9 月 18 日清晨从通州回来，沃克上校及其随行士兵，罗亨利和巴士达及其他外交官，都毫无阻拦地通过清军前线。只是将近 10 点一刻，法军后勤军官阿代尔中尉才遭到清兵围攻，这是在局势不明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这件事竟成了导火线。

额尔金最后认为，不管怎样，在清廷全权大臣和总兵的行动方式中，“忠诚、愚蠢、多疑与充好汉兼而有之，这是这个国家的人行事的普遍特点。既然僧格林沁领教过我们在战场上的优势，所以我不能相信，他本人或其文职同僚，据经验早知战局必败，还居然硬要投入这场冲突。”

如果同意额尔金的论点，那英法联军中所有随行作家大肆渲染的所谓“九一八圈套”——这种说法后来也曾为史学家普遍采用——就不能完全站住脚了……

对此，葛罗也持同样的看法。人员被扣当晚，他在日记中为清朝钦差大臣真诚地辩护！他的确认为，对方是无辜的。和额尔金一样，他把这一事件的责任归罪于僧格林沁，指责这位总兵“背信弃义”，“仍想发迹”。第二天，他致函蒙托邦，进一步阐明他的看法：“明显是僧王挑衅，此公可能想打出最后一张牌。”

葛罗特使的见解，已使怡亲王搞“圈套”的论点站不住脚。扣押人质的惟一主谋是僧格林沁，并非朝廷钦差。怡亲王前后态度有所矛盾，说明主战派僧格林沁对他施加了巨大压

力。

芮尼医生也不相信怡亲王和穆荫给英法谈判者设圈套。他认为，把举谈判旗的人抓起来固然难以容忍，但不能肯定说就是圈套。

法国冈城大学历史教授泰西埃在八国联军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后，1901年就所谓中方设“圈套”作了深入研究。他在校方支持下发表的一篇36页的长文，希望我们进行反省，对“责任问题作出更公正的看法”，因为并非所有过错全在中方。他问道：“何谓史实？60年来，为了我们的声誉，为了自我辩护，我们对历史进行了多少篡改和任意歪曲！就连罪恶滔天的鸦片战争，在法国甚至也有狂热的卫道士。”泰西埃以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名义，毫不犹豫地称这个故事为杜撰，揭露“那种有害的先入为主之见，甚至蒙蔽了最精明最正直的目击者，将其引入歧途”。他认为，他们这些人无意中把我们也骗了，“因为他们不怀疑自己也会搞错”。

泰西埃指责洛图尔参与炮制“圈套”之说。的确，洛图尔把扣留人员归罪于一份上谕。上谕悬赏缉拿联军人头，如：军官500两银子，士兵100两，印度兵50两。然而，该告示的日期是9月20日，比“人质”被扣晚两天。对于北塘登陆之后中国与英法联军的各个和谈阶段，泰西埃作了具体回顾。他指出，清朝政府几任钦差大臣，甚至僧格林沁，一直打算和平，表现出明显和好的愿望。只是英法联军，特别是额尔金，充耳不闻罢了。

当然，他也承认，有一点清朝不愿让步，就是皇帝接见英法使臣的棘手问题。“9月20日的上谕中说，假如这种荒谬的要求获得特许，那朝廷还将有何颜面面对百姓？”在这种情况下，额尔金为何非要冒着使和谈倾覆的风险，坚持要得到这个让步呢？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这样发生了。

泰西埃揭穿埃里松等随军纪实作者和多数史学家的叙述，很有说服力。在他看来，僧格林沁统率的军队，面对英法联军不断挺进而节节撤退，肯定终有一天会在某处停下来。他这样描写导致张家湾交战的一连串事件：开始不在意，后稍有碰撞，竟相骂斗殴，进而酿成交战。向逃走的沃克上校一行连开3炮，便是大战的信号。这时，联军炮兵发起了反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设圈套的论点还有何意义？毫无价值！不过，“圈套论”如何问世，泰西埃认为已经弄明白，他指出：“对这一说法，联军官兵不经验证，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全都赞同。大家先入为主，都深信中方口是心非，在搞欺诈。故他们自然要进一

步找证据和不满的理由，来对付这些‘古怪可恶’的家伙。”

为有助于否定中方设圈套之说，泰西埃还引用洛图尔伯爵这段异乎寻常的自供状：

“对华远征遭到非议，我们面临最不公正的审判。伦敦老城和巴黎沙龙，已从战争中看到我们对一个善意的民族进行罪恶的侵略。假如这虚张声势的和谈的破裂来自我方，那欧洲就会有人大骂我们滥用武力。因而，必须让对方明显违约，我们便可加以镇压。”

泰西埃得出最终结论：“千真万确，在通州抛出圈套论，正好可为后来洗劫和火烧圆明园开脱。”因而，所谓“通州圈套”，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是英法联军预先炮制出来，用以指责中方欺诈，并为他们后来犯下的罪行进行解释或辩护求得宽恕。正如后来司空见惯的那样，这纯系狡猾的编造，对历史的操纵。

原因似乎已为大家认同：所谓“通州圈套”，只在随军纪实作者的臆想中存在；后为亦步亦趋的史学家信以为真，以讹传讹。

泰西埃在文章最后向洛图尔伯爵算账。像严斥巴夏礼掀翻摆满瓷器的谈判桌那种凶神恶煞举止一样，他抨击这位法国学者 9 月 17 日，即被扣留的头一天在通州的倒行逆施。当年 12 月 31 日和翌年元旦，洛图尔在《箴言报》上发表自己被俘的痛苦经历，博得公众的“普遍同情、怜悯和敬意”。对此，泰西埃特地引用他“不打自招”式的两段话：

“本人一进通州，几个官吏就来到我面前，表示陪我去找住房。我把行李放下，便跟他们走了。在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安排有一点不合适，竟安排我与巴夏礼的锡克骑兵住在一起。住这么小的寺庙，他们已够挤的了。我要更宽的地方，以安置马匹和车辆。于是，我干脆独自一人去找，很快便找到所想要的住处。”

“我去的那户人家，房主像是六七品芝麻官，对我极不友善。我也对他毫不客气，我想占用的几个房间，非要他让出不可。他差人把所有家具搬走，这种不礼貌就等于说，他把我看成强盗。而我让人把桌椅搬了进去。我们的关系仅限于此。”

洛图尔如此举止放肆，蛮横无礼，泰西埃实为惊讶。他写道：

“就这样，一个普通法国人，无任何官方、外交或军事的头衔，擅自一人来到中国一座城市，属非占领的城市，而是中立城市。对这样一个城市，应当以特别的尊重对待，因为时值各方全权代表在那里会谈，签署和平协议……故而不能摆大老爷架子。他简直太放肆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听到大炮一响，通州老百姓对洛图尔那么仇视，就无须

大惊小怪啦！

当地人把洛图尔抓起来，拳打脚踢，以死相恐吓；然后，将他手脚反绑，扔进囚车。对于他，这只是可怕苦难的开始。泰西埃不带恻隐之心，认为他这是罪有应得！……

第 13 章 八里桥战役

漂亮的汉白玉桥

战场

八里桥战役

柯利诺将军勇猛

中国人的英雄主义

蒙托邦甚喜

英国人祝贺

大胜仗

联军奇怪的弱点

探询中方军备实情

两战俘之死

弹药耗尽

恭亲王出场

抢劫

联军最后通牒

9月19日

白天用于侦察行动。这十分必要。英法联军既无现成地图，也无可靠的情报。部下被扣后，将领们期待着清政府出面。威妥玛被派举着白旗前去通州。他正告中方当局，和谈已经中止；“人质”不还，北京城将挨打，甚至被攻占！当时，通州知府仅回答说，巴夏礼早已离开城里；至于被擒的人，暂作和约签署的担保，事后定将放回。

额尔金和葛罗离开河西务，来到联军营地。外交官们尽量不惹人注意。埃里松嘲讽地说：“直至此时，外交官们的作用并不显著，使团人员有些垂头丧气。额尔金勋爵和葛罗

男爵则对各自的将帅比较殷勤了。‘亲爱的将军’称呼，取代了之前的‘将军先生’。”

蒙托邦埋怨两位特使又一次受骗上当，责怪他们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他尖刻地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们睁开眼睛。他们一心只想着用外交手段取胜，这使他们盲目轻信。”

9月20日

柯利诺将军率 3000 匹马和野战炮连急行军赶来，增援前线法军。援军来得正是时候。英军方面，格兰特也要还在河西务的拿皮耳将军尽快带 2 个团前来与他会师。

侦察表明，清军骑兵正向通州至北京的运河一线大规模集结。运河上有两座桥，西边一座是木桥，炮兵不能通行。第二座为单拱石桥，是一座漂亮的汉白玉老桥，建于 17 世纪，有动物石雕栏杆，名叫八里桥。八里，大概是那里到通州城的距离。从桥上，可以远望北京高大的城墙。但因有树林和住宅掩蔽，联军看不见那座桥，更不清楚其具体方位。

而正是在八里桥前，僧格林沁将军决定交战，以阻止英法联军推进。联军“远征”正式报告中说，“按中方的说法，这是一个大包围圈，英法军队从中必将找到他们的坟墓”。在这个大平原上，清军统帅亲率约 3 万之众的大军，而且阵地精心安排，大多隐蔽在树丛或村落之中。作为预备队伍，清军统帅还拥有精锐部队，即京师禁军，以兵勇身穿黑边黄马褂为识别。而且，这位将领非常熟悉地形，而联军却不能。

英法联军准备迎战。蒙托邦原本希望“九一八”的胜仗能促使清政府撤销这个“无耻的圈套”。但是，由于未见中方出面，仅见大批清兵集结，格兰特和蒙托邦征得两位全权特使的同意，决定寻机与僧格林沁正面交锋。据蒙托邦所言，这位了不起的将领，无论白河败走还是“9·18”失利，都未使他失宠降职。

9月21日

蒙托邦将军这回运气真好，轮到他走在部队前头，并确定进攻位置。对于他，立功的一天终于来临。这是与清军作战而扬名内外的時候，况且又将无人来和他争功！

蒙托邦描述了战场状况。此地距张家湾联军营地 5 公里，是通州重镇，铺花岗石的老马路通往北京。而在八里桥村，这条马路横跨运河，从石桥上经过。联军两帅知道，桥前桥后，均由僧王大军把守。于是，决定攻夺该桥。他与格兰特商定，一旦确定了八里桥的

地理位置，就将法军部署在桥正面，然后攻取这个战略要地。

联军营地里，可谓群情激奋而又惶惶不安。

天刚亮，大家喝罢咖啡。5点半钟，出战信号打响。天气好极了。第二营一轻步兵写道：“……清晨晴朗，略感凉爽，令人快活；河面上，田野上，飘浮着朦胧的薄雾……不一会儿，明媚的阳光驱散晨雾，照耀远近乡野，大地多么让人陶醉！”

战线从东向西展开。冉曼将军率2个炮兵连以及参谋部居右侧。柯利诺将军率一炮兵连居中，作为先头部队直插八里桥头。随后跟来的英军将向西展开，步兵、炮兵居中，骑兵居左。这便是作战阵势。英法各派出4000人马，共计8000左右。

而清兵，却多达2万至2.5万人，部署在平原上，呈大弧圈阵势，战线约5公里，两翼强固。而中央，八里桥轴线上，有一村庄作为坚固的支撑点，村后留有大批装备火炮的步兵为增援。

左翼，柯利诺将军亲率1小队人马挺进，有1连工兵、2连轻步兵、1连炮兵和2小队骑兵。冉曼将军则率部跟在后面，其中有1营轻步兵、引信兵、12炮兵队和101战列团。柯利诺先头部队不久与大队清军马队遭遇，对方从左翼包抄过来。其时英军尚未赶到。这样，柯将军令部队停住，组成方阵，架设大炮，准备应战。

清兵首先开火，据蒙托邦称，“声势很大”。清军骑兵成密集队形驰骋而来，直至离法军前沿阵地仅五十来米。这一切全无声息，听不到任何指挥号令，这场面确是令人吃惊和紧张。埃里松说：“一切动向，全由上下左右晃动的旗子示意，好比海上信号那样。”

清军骑兵遭到猛烈的火力攻击，一个个应声落马倒地，可后面一队队人马，仍接踵而来。他们人多势众，欲把法军前哨小队淹没。“形势严峻，危险迫在眉睫。在我军战线周围，响起阵阵粗野的喊叫声。只见敌方战马奔腾而来，四处扬起大片尘土，时而像是把我们这些士兵团团围个水泄不通，时而像是不停地从他们身上踏将过去。”多亏炮兵猛烈地轰击，敌阵一片惊慌，柯利诺将军才得以撤退。

重新开战。清军发现联军部署似有一个薄弱环节，即法军柯利诺部和英军萨顿旅之间存在空当。于是，清骑兵蜂拥进入这个空当，想不到陷入被围困的境地。战局十分微妙。“明天，我们来看住这支僧格林沁羊群”，一名少校大叫道。在右翼，蒙帅很想前去救援柯利诺，可是清兵突然从其右翼包抄过来，他被迫进行反击。巴赞库尔写道：“清军马队猛

扑过来，竭力把我们团团围住。见我方兵少势单，他们更大胆起来，粗野地喊叫着，俯身策马，挥舞刀枪，大耍威风……”

居中路的冉曼将军，接到命令向右翼出击，但清兵也向他冲来。德拉格朗热中尉记道：“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兵似的：他们似死而复生，顽强战斗，甚至有时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不过，我军炮火变得更密集更猛烈，将他们一一打退，四处逃窜……”

柯利诺及其部下，一直顶住清兵接连不断的攻势，甚至拼刺刀，粉碎对方多次冲锋。在左路，格兰特将军终于下令炮兵开火，减轻法军压力。英军骑兵赶来，带着数门阿姆斯特朗重炮，尽管来得晚些，还算及时。乘清军逃跑之机，格兰特出动范纳和普罗宾所率的骑兵冲杀过去，击退清兵。在中路，冉曼旅面对清军炮兵，大显威风。最右侧，101 战列团遭到清兵强攻，法军炮兵猛烈还击，清兵迟疑，进退维谷。

乘敌阵乱作一团，蒙将军下令全线冲锋。柯利诺把清兵赶向八里桥。中路，蒙帅亲自指挥作战。右路，冉曼向前猛攻，普热上校带领 101 团杀来，夺取位于清军阵地核心的村庄。清军将领摇着军旗，把兵勇集聚于八里桥头。僧格林沁大旗在桥上高高飘扬。于是，冉曼将军率部朝那里推进。对法军来说，正是在八里桥展现了这场战争“最卓越的功勋”。因为，只要这最后一道障碍越过，就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向中华帝国都城胜利前进了。

很快，八里桥及其精美大理石雕展现在眼前。桥后，清帝国精锐之师，兵强马壮，要誓死保卫这座桥梁。柯利诺率部从左侧，穿过掩映静雅墓地的树林，消灭一股埋伏的清兵，然后插到运河岸边。他令炮兵们架好大炮，以对桥斜射；而本茨曼上校则领另一支炮兵对桥纵射，并要 12 炮兵队瞄准敌营设有大口径火炮的阵地。

万炮齐发，响声阵阵，把桥栏杆炸得横飞，将守军打得惨败。

柯利诺将军仍头戴那顶大草帽，带领一小队人马，朝八里桥勇猛冲上去。桥头被死伤的兵勇和翻倒的大炮堵住。杜潘上校赞道：“柯将军一个人策马扬鞭飞奔在前，部下无法紧随在后。当他单枪匹马，冲上拱桥高处时，大家才与他会合。当年马拉科夫战役的英雄，今天第一个冒着枪林弹雨冲上桥头，并朝运河对岸挤满敌人的宅院挺进。这是我军战史上又一个精彩的场面！”法国人上刺刀冲锋，如英国人所赞，“好一场白刃战”。

柯利诺不再那样过谦，但仍很平淡地言及八里桥战功：“能带强攻队冲上去，一举拿下八里桥，本人深感荣幸、高兴。我冒着箭林弹雨，最先冲上桥头，战士们也紧跟上来。

他们真是神勇。”

清军马队最后溃散，八里桥被攻占。但有一小批分散的兵勇，仍在抵抗。蒙将军之子夏尔上尉进到一个寺庙，准备安设临时指挥部，不料遭遇迎面射来的子弹，多亏被“头儿乌斯曼”和一排轻步兵营救，才奇迹般幸免于难。后来，第二团一战士讲了这个小故事：“蒙帅与冉曼旅刚过桥，得知儿子险遭不测，便指着其鼻子威胁道：“你要那样，不再带你来了！”儿子回答：“就这个呀，也许你还不如我呢！”

攻占八里桥，蒙托邦将军曾描述当时的场面：“此时，八里桥呈现的景象，可谓当天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早上斗志昂扬的清兵消失了。在这座古老文明桥边的战壕里，那些身穿富丽军服的兵勇手摇锦旗，毫无掩体，以微弱的火力，还击我军大炮和步枪齐射的攻势。这是宫廷精锐之师掩护大军撤退。”

埃里松欣喜若狂，这样描写当天得胜的场面：“蒙帅由军官簇拥着，受到士兵们欢呼，揩着额头上的汗水，从队列前面走过。英武严肃的面庞，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大概蒙托邦将军已经觉得自己是“八里桥伯爵”了，就像不久后拿破仑三世对他的册封一样。

当天，位于左路的英军，本应将清军逼向联军战线的中路，以便将其退路切断，一举歼灭。英军正在布阵，准备迎战对方数量众多的骑兵。格兰特突然听见法军炮火轰鸣，很想看个究竟，可惜不慎迷路，忽遇大队清兵。清兵将他穷追不舍，直至英军阵前。只差一点他就当了俘虏！……

格兰特下令龙骑兵和锡克骑兵出击。清兵退到一条宽而深的壕沟后面。龙骑兵一一越过障碍；可锡克骑兵因辔缰妨碍，连人带马相继跌入壕沟中，马断了腿，人被压伤。英军终于驱散了清兵。

英军骑兵遭遇数处清军营地，守兵已仓惶弃营而逃，仅有一处例外。于是英步兵迅疾出动，迅速攻下该营。在那里，英军找到两面禁军黄旗，格兰特将一面留在身边。英军沿运河挺进，击溃埋伏于树丛的清兵勇和步骑，到达一座木桥处。他们决定不过桥，炮兵也不能去冒险。这样才使清军有机会退走。

樊国梁主教后来写道，僧格林沁“把军队抛下任其败退”，自己却沿着石板路逃回北京，并下令将城门紧紧关上。在致陆军部的“远征”报告中，执笔者之一谢内维埃尔参谋写道：

“八里桥，古老文明的建筑，当时呈现一派特别景象。穿戴华丽的兵勇摇着军旗，毫无掩体，以杀伤力不大的火枪，还击我军大炮加步枪齐射的攻势。早上斗志异常高昂的步骑消失了；而那精锐之师——八旗禁军，奋勇掩护清军撤退。仅用半个来小时，我方大炮击毙大批守兵，并使对方炮火再无声息。于是，蒙帅号令冲锋。柯利诺将军亲率先遣队，飞快冲上去，攻占桥头。在第二营强击兵的火力攻击下，守桥的 10 门大炮炮手一个个应声倒下。

总司令随其他部队跟进。时值中午，战斗自早上 7 时展开，敌军已完全丧失斗志，大队人马消失，一千多人死伤。我军暂停。休息 2 小时后，部队驻扎下来，住进僧格林沁大军弃下的营房和帐篷里。这里距中华帝国京城仅有 12 公里。”

《法兰西与中华》一书作者吉拉尔传教士，则赞扬中国士兵的英勇顽强。由 2.5 万人马及许多团练乡丁组成的方阵，涌来与一小队英法联军决战。他们的弓箭、长矛、用钝了的大刀和像患哮喘病的大炮，当然不敌联军炮火。他们尽管人多势众，连连冲锋，且高声呐喊，但还是惨败！而将官们率领一批勇士增援八里桥，只见他们顶住杀伤力大的密集炮火，决不后退一步，一直坚持了一个小时，最后宁肯全都战死，决不放弃阵地。武士死得英雄，但并不机智。

埃里松满怀赞扬之情，描绘一个史诗般的场面：

“在桥头，站着—个特别高大的‘鞑靼兵’，大概是举帅旗的旗手。他高擎那面写有黑字的杏黄大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示意。显然是僧格林沁将军的帅旗，所有将官无时不注视着，因为帅旗向全军传递着命令。当大军已经在全面撤退，当战场上以及精锐之师把守的桥头横尸遍地，这个‘鞑靼兵’依然屹立在那里，始终独自一人，还在传达着统帅的最后一道命令。任凭子弹在他身边嗖嗖穿过，炮弹在他四周隆隆轰鸣，他都岿然不动。他那股勇气，我们感到何其崇高。就连蒙将军也禁不住赞道：‘啊！多英雄的好汉！真希望不要打死他。为何这鬼家伙不与其他人一起撤走。快给我把他救下来！’几个士兵冲将上去，力图俘虏他。就在这时，那挺半个小时来似乎一直敬佩他的机枪——像是给予我们时间，把他英雄的身影深深印在我们的记忆里——突然响起，将他击中，将他打倒，将他消灭。而那面大旗飞走了，带着他那只紧握着旗杆还在抽动着的胳膊消失了。”

八里桥被柯利诺将军攻占，战役终于告捷。英军也为取胜做出显著贡献。大炮打响，额尔金就骑马随军，整个白天一直在观战。

当天，9 月 21 日，从战场上缴获了 27 门铜炮（其中 1 门于 1674 年在阿姆斯特丹铸

造），大量信管火枪、大刀、长矛、弓箭以及其他兵械。地上堆满各色各样的军旗。僧格林沁的帅旗已找到。英法联军就地宿营，进驻清兵丢弃的营地，内有各种军需物资，尤其是一大堆供炮兵用的火药。布瓦西厄少尉还细心地发现：“军帐好像等候着早上的贵客，其中一些还有备好的晚餐。”

阿尔芒医生清点了一下战利品：“兵械、制服、军帽及花红顶戴，旗帜、军旗及小旗，各种器皿用具，满载或翻倒的马车，搭起的帐篷，以及塞满作战物资的帐篷等，扔得到处都是。”他还借机打趣说：“人家用木把造箭，我们把箭当柴烧！”于是，数千个装得满满的箭袋，一连好几天被充作联军营地篝火的燃料。

额尔金勋爵前来向八里桥得胜者蒙托邦将军道贺。在总结当天战事时，杜潘上校指出：“此仗获得全胜。清军骑兵不可战胜的声威已被打破，从今日起，再也见不到他们出现在眼前。北京之路已被我们打通。”内格罗尼中尉兴高采烈地称：“八里桥战役告成，完全归功于法兰西军队。这给我军带来巨大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战果……此仗大挫清兵之锐气，让朝廷惊恐万状、惶惶不安，使其行动瘫痪，同时也削弱了民众原本就犹疑不决的力量。”

对于八里桥得胜，布隆戴尔将军这样解释道：“仅几个欧洲人，竟然击溃一个机智勇敢的总兵统率守卫京城的重兵。在敌方早有部署的战场上，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我军夺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战果，充分证明，纪律与文明比军队数量更占优势。同时，这使人联想到当年，那一小撮罗马帝国士兵征服许多蛮族的节节胜利。”

鉴于一个大战役尤以战果来判断，巴赞库尔特别强调八里桥战役的意义。他说：“这是砍倒那棵高傲雪松的最后一斧。清军士气低落、全线溃退，在逃遁中带走皇帝的最后希望，以致皇帝只得往北逃窜。”

而按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的看法，清军兵力应为五六万人，其中骑兵 3 万左右。在这次与英法联军的交战中，中方损失兵力不过千余人（据某官吏称，高达 3000 来人）。相反，一个令人惊讶之处是，联军损失微乎其微：法军仅 3 人阵亡，17 人受伤；而英军 2 人死亡，29 人负伤。因而，英法联军只有 50 来人丧失战斗力。正如埃里松比喻的，“这场战役给人以做梦一般的感觉。我们光打死别人，自己却几乎丝毫无损。”

对这种奇怪的差异以及联军损失之少，该作何解释？损失何其小，使人难以理解战斗的激烈程度。

对这一问题，巴赞库尔的回答是：“尽管中国人抗击顽强，但我方损失很少，这只能从他们武库兵械居于劣势来解释。其实，可以这样说，我们士兵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保护着。这只无形的手，把敌人发来数量无可比拟的子弹和炮弹统统排开……如果没有仔细研究中国人使用的原始武器和他们笨拙的射击技术，那么中国人损兵折将，伤亡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没有一颗炮弹射中目标。”中国的火炮虽然口径很大，但发射的炮弹都打到树顶上去了。

吴士礼也认为，中国人数百年几乎使用同样的武器，可西方民族则不断改进完善他们的武器，无论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都是如此。中国闭关锁国，对外来影响，包括军备方面的进步，筑起难以进入的壁垒。他认为，中国遭受的屈辱与衰落，来自其极端盲目排外的思想。

其次，巴赞库尔还指出，中方军备劣势，加上作战不灵活，发射又笨拙，在不断移动的战场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人也许未很好地研究战争，因此不知如何打法。”不过，他认为，中国士兵，特别是蒙古士兵，表现勇猛，无可非议。

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出奇低劣，无多大杀伤力，阿尔芒医生是首次见识，感到最先发明火药的中国不该如此！中国人仅有些“鸟枪、火枪、抬枪、短枪、石炮和大小口径不一的炮，有的属自造，有的是从别国缴获或购置的”。他惊讶中国人“仍那么幼稚地使用弓箭作战。弓箭怎么能抵挡卡宾枪及刺刀，500米内射不到人家那里，人家却一下就能刺穿他们的胸膛。中国兵没有刺刀，只有长矛、梭镖、戟和各种大刀、短刀、长刀或双手拔刀等。忘记说了，除了弓箭及箭袋，他们还有一种盾牌，用柳条或竹子编制的，像一项中式大圆帽。两个把手一根横档，拿在左手臂上使用”。他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清军骑士，只是肩挎弓箭，左手持盾牌，右手举刀扬鞭，怎么竟敢朝枪炮全副武装的欧洲军队冲锋呢？岂能不惨遭溃败？”

看来，那部公元前五六世纪早已写成的名篇《孙子兵法》，大概未曾落到僧王手里！

相反，在英法联军方面，优势之中主要有两军协调一致，指挥得当。同时，武器装备的先进优势得到充分展现，如法军四个来复线炮队，英军阿姆斯特朗重炮队，引信兵发射的炮弹，以及连发枪等；尤其炮弹，因紧贴地面发射，打进对方马群中杀伤力极大。

联军两个“人质”，这一天死期降临。来自传教士团毛遂自荐充当“远征”军译员的年轻神甫杜吕克，和英军皇家炮兵上尉布拉巴宗，死在八里桥战败者将军胜保的祭坛上。此将率领八旗禁军，头戴红顶子帽，身穿黄马褂，策马扬鞭，在火线上指挥作战。显然为联军

众矢之的！他头部受致命伤，断气前下令处决两个“人质”。这是后来才得知的情况。两人的尸首可能被扔在运河里了。

9月22日

战役第二天，法军回到八里桥。满目惨象，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有的还被烧焦。原来，清兵每人腰间缠捆着一个火药袋，手臂缠着引爆线，以便点火枪。遭到机枪扫射后，引信着火，使火药爆炸。他们尸体破碎，场面可怖。另一些兵勇，脑袋被炮弹炸飞，倒在炸得开膛破肚的战马之间。

向北京挺进，便是下一个目标。越快越好，要充分利用清兵士气低落之机。不过成问题的是，这次战役中弹药消耗太多，几乎耗尽。故而，必须等待从天津调来新的弹药和增援部队。

中方吃败仗后，次日即恢复外交活动。额尔金和葛罗两使收到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奕的快函，即“奉旨议和”照会：

“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和硕恭亲王为照会事：现因怡亲王载、兵部尚书穆办理不善，已奉旨撤去钦差大臣。本亲王奉命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即派恒祺、蓝蔚雯等，前往面议和局。贵大臣暂息干戈，以敦和好。为此照会。”^①

^①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五），第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恭亲王未提及“人质”之事，要求英法停止敌对行动，以便重开和谈。

而两使节强硬地回复恭亲王，只要英法人质未放还，便谈不上停止敌对行动，更不必说和谈了。葛罗男爵还向亲王重申：“清军侵犯人权，违背起码信誉，致使作为谈判代表前去通州并和平返回的数名欧洲人死伤……”

恭亲王则答复，被扣之人“未受虐待，而受善待”。但和平尚未达成，不可能将其归还。交涉还算顺利，不过，亲王一句话使英法双方不安。他曾问道，既然你们军事上得胜，少几个军官会有何过错呢……

就在此期间，联军抢掠又起。周围村庄家家遭到英法军队勒索和抢掳。军营夜晚大开着门，士兵及部分随军广东苦力，溜出去抢劫、奸淫村妇和姑娘。乡民愤怒不已，抓住其

中3个强贼，当场打死。英军借此枪毙第四个苦力，鞭打另一些人。葛罗再次致书图韦奈尔外交大臣，表示愤慨心情：“一个物产出奇丰盈的地方，又遭劫毁坏。清兵之后，及联军抢走一切，毁掉一切。各个村寨、农庄，空无一人。两司令声称阻止不了劫掠，真叫我羞惭不已，无地自容。”

9月25日

在致恭亲王的一封总结性长信中，葛罗特使强调，中国政府不诚实的态度只能加剧局势恶化。他呼吁亲王表现出“文明国家间应有的荣誉感和公正性”，并“预防可能再发生的不幸”。但他又发出毫不含糊的警告：

“本人认为应当向殿下和清政府成员郑重声明，法兰西政府希望保持贵国现帝制王朝，不忍京城被毁，故愿我们两帝国之间恢复和平。但是，如果中国由于不识时务而断然拒绝我们两大盟国的正当要求，或者仍如屡次发生的那样玩弄花招，拒绝我们两大盟国的正当要求，那只能靠武器说了算。”

这便是给恭亲王提供的选择：要么屈服，要么摧毁北京、推翻清朝！葛罗特使还补充道，天朝如果不屈从英法两国条件，最坏的情况还会临头。他限亲王3天之内了断。“要么在通州达成和平，要么英法向北京进兵。”

等待答复期间，格兰特和蒙托邦派兵占领各城门。为避免意外，联军士兵一律禁止入城。同时，清兵俘虏被派去收敛阵亡同胞的尸体（许多尸体从运河中捞出），并转交通州知府。

第14章 北京啊！北京！

北京城墙下侦察

恭亲王不让步

军人重掌战事

巴夏礼和罗亨利来信

八里桥好运

汉白玉龟座雕龙石碑

北京啊！北京
砖瓦场高处看京城
皇帝的尴尬
咸丰帝逃往热河
懿妃的影响
京城一片恐慌
格兰特等待时机的态度受到批评
烦恼：“人质”的命运

9月26日

英法联军两帅派出一支庞大的侦察队，潜入北京城下。任务在于探明通往京城的道路，摸清城防的各个要点，同时也是为了震慑中国政府。法军方面，带队的有参谋部骑兵少校康普农，蒙将军特派的一个“十分机智、刚毅的军官”；英军方面有普罗宾少校。

联合侦察回来，康普农少校作了汇报。他们沿着石板马路前行 8 公里，留下一支配有炮兵的分队作为支撑点，再向前走 4 公里，遭遇清军骑哨向他们齐射。随后，进入近郊。这是他们初次看见中华帝国首都。“我们终于接近这座向往已久的京城，那宏伟的城墙和城门高楼在天际清楚地勾勒出来，距我们驻足之处的桥梁仅 1200 来米。”康普农要普罗宾陪他走近城墙看个究竟，可对方不同意，情愿带领锡克兵朝北再行一段路，以查明有无清军兵营。

而康普农不放弃自己的想法。由两名军官和十来个炮手陪同，深入离城很近的镇子。

“我们穿过一条很宽的大街，两旁多为木结构的房屋，正面雕门画栋。靠近镇子中心，有两座牌坊，间隔不远。家家户户房门紧闭。街上行人面无表情，但人数众多，很难保持距离。我们于是走到离城门只有百来米之处。我估计城墙有 12 到 14 米高，城门比城墙高出约一半，而上部有 4 层射击孔，每层 12 个，形状像船上的舷墙炮口似的。”

街上人多，有点拥挤。法军侦察员感到有几个清兵尾随。他们决定不再滞留。半路上康普农遇到英军同伴，他们也未发现任何清军兵营的影子。由这次侦察可见，北京之路将通行无阻。

同一天，葛罗致函蒙托邦说，如果最迟至 9 月 29 日还得不到恭亲王令人满意的答

复，那么自次日起，两司令便可如商定的那样，向北京进军。

对和平解决可能性一直持怀疑态度的蒙托邦，比任何时候都确信：“两位特使总喜欢认为，以外交行动排除所有障碍，是几天内就可实现的事情。”他表示不再采纳看来纯系幻想的做法，故而已做出向北京进军的部署。事实上，他相信和平只能在北京实现，因为中国人“害怕都城遭劫，朝廷被赶走”。

恭亲王立即予以回复，再次强调以前“不能尽心和议”之事与己无关。但对那种幻想清朝会垮台的警告方式，他表示不予理会。他重申，京师将由清军英勇保卫，誓死保卫。他宣布将进行新的决战。最后，恭亲王保证，人质并未处决，只待和约批准后放回。换句话说，这等于是对联军的要求不予理睬。

葛罗和额尔金认为，此信“很糟”。恭亲王仍然拒绝释放人质，这不是好兆头。葛罗叹道：“倘若本人害怕之事出现，那将是这次远征中最令人痛苦的一段。”

格兰特将军和额尔金勋爵前去拜望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英法联军北进以来，俄使一直跟随在后，并在通州住下。伊氏向他们献出亲手绘制的一张北京地图；而同样一张早在上海时已提供给蒙托邦将军。他曾让人在马车轮子上安装一种里程计数器，把京城所有马路和街道的长度全都测出！他还给他们描述了北京城内的情况，北属满族区，包括紫禁城在内；南为汉人区。俄使答应把这张珍贵的地图借给格兰特将军，将军遂请随军照相师毕托将北京地图拍下来。

9月27日

拿皮耳少将的两个团及攻城炮队，从河西务赶来增援，准备参与攻夺北京城门。格兰特司令先前等得简直不耐烦，因为如果等不到增援部队及弹药，他不愿继续作战。

9月28日

普罗宾少校又去进行新的侦察。这回，他终于摸清北京东北郊清军兵营的方位。两位特使再次重申释放人质的要求，并且要求第二天就得放回！

9月29日

恭亲王马上回复，要英法联军停止威胁京城，并撤回到张家湾。在给葛罗的照会中，

他强调说：

“贵国之兵，现在逼近京师，彼此俱有戒心，疑难画押用印。应请贵大臣先行退兵张家湾一带后，三日内，本爵将续约缮写清楚，派员赍送至通州、张家湾适中之地画押后，再行定期会晤，以坚永远和好之意……至从前被获之人，现皆以礼相待，并未难为，俟退兵立约之后，定即派人相伴送还。所有本爵之为人，前照已经说明，决不食言失信。”

读罢此信，葛罗悲叹清政府“不识时务”，声称不明其中缘由。他致函蒙托邦说：“清政府正在把一场令人遗憾的灾难引向国都，也可能引向清王朝。我们将起码有权说，我方为防止这种灾难做了该做的一切。”

对于人质的命运，至少其中一些人的命运，联军不再抱有多大幻想。其实，很明显，恭亲王之所以一再强调人质要在和约签字后才释放，是因为担心联军发现他们遭受虐待后会借以报复，并强加更为苛刻的和局条件。葛罗就此写道：“他又在骗我们，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担心，他根本无权把他们还给我方。”

汉学家高第认为，这仍然是同样的拖延手法，早已在上海、大沽、天津及河西务用过，旨在延缓英法联军挺进北京。蒙托邦不如两特使那样易于和解，他要求第二天在法军大营召开作战会议。

9月30日

额尔金和葛罗两使节、格兰特司令，以及雷布尔和弗利两联络官，聚在蒙托邦将军左右开会。蒙将军先分析局势。联军得到休整，精神饱满；军需供应很有保障，尤其牛肉充足。现就等从天津运来粮食和弹药，他保证说，肯定不会延误。蒙托邦说，他感觉恭亲王的外交函件必定有诈，旨在让僧格林沁调集新的人马于北京城下。

蒙将军介绍了他想像到的两种假设。要么是清军“试图再碰最后一次运气”，以阻止英法联军进发北京。他说，这正好求之不得，因为联军在北京城门前取得新的最后胜利，将加速和约签署。要么，联军不放一枪即可抵北京城下，尽管围城炮火不足，也可将京城一举拿下。这般铤而走险，也许会旷日持久！他一再强调，鉴于冬天来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决定11月1日离开北京。在后一种设想下，联军要撤回到天津，并在那里过冬。

借此机会，蒙托邦要求中止外交关系，把全权交到联军两司令手中，以便毫不延迟地恢复军事行动。这方面的决定当下做出。额尔金和葛罗两使随即通告恭亲王。

于是，征战事务重又由联军将领执掌。拉否例就此指出：“在这次二合一远征中，事情总是那样，主导权时而由使节转到将帅手中，时而由将帅转到使节手中。”

10月1日

葛罗男爵收到恭亲王带威胁性的回复。照会警告说：“本亲王前已言明，和约未经议定，若草草送还，转非以礼相待之意。……至贵国若用兵力威迫，不独已成之和局可惜，且恐贵国在京之人亦必难保也。”^①

^①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七册，第240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很显然，意思是，联军若犯京城，那人质就会被斩立决。但恭亲王表示：“现因英国巴领事官素能汉文汉语，本亲王现正派员与其商定英法两国会晤用印画押各事宜。”由此，联军宽慰地得出结论，这位驻广州领事还活着。

晚上，额尔金勋爵也收到恭亲王的急件，附有巴夏礼写的中文信。巴夏礼要求英军暂停军事行动，给予一次新的议和机会。信中说：“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我两人闻得是恭亲王令其如此。恭亲王人甚明，能作主意。既能如此，伏谅暂可免战议和。”

随此官文函件，顺附一句个人之事，希望给他和罗亨利送来几件衣服。并用英文写了又及，“我俩均受善待”。而罗亨利，却在信的一角用罗马字母写了一句兴都斯坦语：“此信是按中国政府授意而写的。”换句话说，须把巴夏礼乞求停战的信视为无效……

随即，一些衣服及零星用品送到他们手中。而一手绢上也附有几句仍用罗马字母写的兴都斯坦语，由海军上校海约翰手绣，专致罗亨利，让中方无法译出。其中除额尔金口授的鼓励话之外，还告知两位被扣留者说，最后通牒3天期限一过，联军就向北京城墙发起炮轰。人们不知他们是否感到欢欣鼓舞！两人确已被告知，一旦炮声响起，他们就人头落地……人们同样无法得知，当威妥玛告诉他们，若被处死，将以烧光北京全城为其报仇雪恨，他们是否倍觉欣慰。威妥玛还问他们，到底被关在京城何处。

巴夏礼和罗亨利遂回信说，他们和另外2人已从城内那个污秽不堪的刑部“北监”，被移禁到邻近的一个寺庙里（即高庙——译者），离城北德胜门不远。他们二人仍然有办法用兴都斯坦语，注明那个寺庙及附近街道的名字。中国人因无军事检查经验，故什么也看不出来。信件便原封不动地送到英国人手里！

10月2日

联军还未出动，北京商贩们就向英法特使写来请求书，希望他们停止进军京城，而且答应向联军赠送粮食、牛羊肉及猪肉，白酒和各种蔬菜水果等……白费功夫！联军认为，这种出人意料之举，只能出自清政府。

10月3日

蒙托邦盼望的增援车队仍未到达……两位特使没有其他更好之事可做，就用这个时间继续与恭亲王通信交涉。恭亲王在巴夏礼名字之后，又加上洛图尔的名字，借口后者也会汉语，可作为中间人！洛图尔照样活着，法国人甚为高兴；但对这种选择感到惊讶，因他是学者并非外交官。而此时，他们也在猜测杜吕克神甫命运如何，这位传教士和洛图尔一样很精通中文。

蒙托邦终于接收到期待已久的增援部队和弹药，其中有整个101战列团、1个工兵连、4个炮兵连和270名海军陆战队等。在致朗东元帅的信中，蒙托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以如此少的兵力占领北京呢，还是火烧满人城区呢？这将视未来事态发展而定！本人所定的计划是，不能等到北京寒冬到来之时，因为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而且，如若全城被焚毁，我军将无足够的军需供应。”蒙托邦还说，他打算带4000人马挺进北京（其中有3500名“拼刺刀兵”，即步兵和工兵；四个炮兵连，其中1个连为引信兵），即与格兰特将军所率的兵马相等。

英法联军决定10月5日向北京挺进。

10月4日

法军即将辞别从此成为他们胜利象征的八里桥。过后不久，蒙托邦将军荣获“八里桥伯爵”封号。

他们在八里桥度过极为愉快的半个月。埃里松写道：“部队吃饱喝足，充分休整，非常欢娱，生龙活虎。士兵们吃到了可口的饭菜，到运河里洗衣服，有的去钓鱼，或像儿童那样玩耍。此时，大家只要求继续进军。”在一支小军队里，人人都相互认识，成了“大家庭”。吴士礼中校满意的是，他在附近一个村子找到了味道很好的葡萄。只有鸭子不称心如意——原本曾在运河畔成群结队游弋，可联军刚到那天就全都无踪影了……军官们都住进乡间豪宅，其实就是北京朝廷高官们的避暑府邸。

在八里桥，法国和俄国的外交官也往来频繁。两国公使早在上海就有交情，到了天津，成为邻居，友好关系进一步增强。凯鲁莱满意地提及与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及其副官巴留捷克少校结下“令人喜悦的情谊”。两国使节彼此怀有好感，交往密切，观点一致，而且可用法语交流……

八里桥给人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那片肃穆神奇的墓地。距桥不远处，屹立着高大的汉白玉龟座雕柱。据埃里松描述，神龟直径4米左右，背甲托起那高耸的雕龙石碑，非常宏伟壮观。蒙将军曾想将此奇特的纪念碑运到法国，安设在巴黎某一广场上，如协和广场上的埃及方尖碑那样，供人瞻仰。可是，法国海军表示难以把如此巨大的龟柱运走。他是何等遗憾！

10月5日

为确保后勤运输线，法军把两个连队留在八里桥，在那里建一座粮食仓库。

英军则留400来人在通州。格兰特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已稍先行一步。部队群情激昂，欢快行进。要长驱直入陌生之地，希望路上再遇敌人，这些实在令他们兴奋不已。每个士兵却只带3天的干粮。然而，这回进军北京，行程虽短，但路途复杂，到处都有树丛，很容易迷路，故行军缓慢、相当困难。法军决定在一个烧制有名琉璃瓦的村庄停下来，那里有10来个砖窑，为京城供应盖房用的砖瓦。据说，这些砖厂属宫廷所有。蒙托邦将军撞见北非骑兵正在抢劫当地一户人家，遂收缴他们的赃物，如数退还原主，主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从砖窑高处，可遥望京城。大家争先恐后地上去观看！蒙托邦特邀格兰特沿螺旋形梯子，一同登上那座最高砖窑的顶端，出神地观赏北京的城楼与屋顶。

就在砖厂，联军听到风声，说咸丰皇帝已经离开圆明园，躲避到长城外距京城东北250公里的热河（今承德）行宫了。

原来，八里桥战役当晚，咸丰帝由懿贵妃（后来的慈禧太后）等陪伴，在圆明园福海上游船赏景。忽听禀报僧格林沁对蛮夷作战大败的消息，皇帝及妃嫔不禁大惊，惟有懿贵妃劝告镇定，力劝皇上御驾亲征，以振军心。

而在京城，一片震惊。王公、宫廷要员和内阁大臣，同样恭请皇上暂舍圆明园，速回紫禁城，亲自统督都城防务。他们认为，若皇帝打算“巡幸木兰”，那只会加剧局势混乱。

而且，“长毛”（指太平军）必更嚣张，朝廷军队定将失去斗志。在主战派看来，还有一线补救希望：夷兵不过万把人，清军兵多将广，且可从蒙古调来援兵。总之，尚须最后一搏，必能稳操胜券……

僧格林沁不赞同这种“绝望”中的乐观主张。他已领教过英法联军的打法，生怕皇上落入蛮夷手中。因此，他竭力恳求皇上“启銮北狩”。其实，这一清室习惯，自 1820 年以来本已废弃，现在成了托词。

反对皇帝离京者提出各种异议。他们引证历史教训说：皇上一旦出了长城，就永难回来。况且，蛮夷还可能前去热河找他。巡幸北狩，看来系逃避，将带来灾难性后果。有人会乘机篡位！在呈递皇帝的陈情书中，虽未提僧格林沁的名字，但也有所暗示……

陈情书中，有一位监察御史力劝皇上不要躲到关外。大意是，圣上何以面对社稷黎民百姓？何以面对先帝们及诸神牌位？焉能把祖宗基业如履轻弃？千秋万代，将如何评说？国运危难之时，从无君王择“木兰之举”，欲以避之……

然而，在僧格林沁的再三恳求之下，咸丰皇帝还是最终选择了出走。9 月 21 日晚间，皇上决定离京前往热河避暑山庄。次日凌晨，他痛心疾首，先去“鸿慈永祐”祭祖，向先帝牌位和保佑王朝的诸神牌位辞别；然后接见了宫中五大亲王和大学士。而早朝时，皇帝以办和局不善解除载垣、穆荫之职，授恭亲王为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留守京师及圆明园，主持抚局，由桂良大学士协办。

随后，咸丰帝仓促离开圆明园，经长春园东大门直往热河；后妃、皇子、要臣，以及太监等数百人，“一律扈蹕”，另有 2000 禁军步骑护驾。此次出行极为艰难，队伍庞大，但无供应保障，既不带御厨，也未备御帐。皇帝和所有随行者一样，7 天 7 夜像逃难似的，一路经受着颠簸与困苦。在去承德路上，他平生第一次只有一般人那样的饭菜可吃，如仅有稀米粥充作晚餐，睡一般人那样没有褥子的床铺……

美籍华裔史学家汪荣祖写道，如所预见的那样，咸丰皇帝突然北去，使北京城恐慌不安，几道城门随之关闭。全城百姓一派慌乱，富人穷人竞相逃离处于威胁中的城区，简直是乱作一团。

英法双方本来害怕出现中国皇帝北逃的情况，那样将使他们没有打交道的对象，现在这竟成了事实。葛罗男爵担心地说：“在这个奇特的国家，一切都难以预料。要是在北京

找不到可以谈判的人，我们的处境将很困难。”

幸亏，恭亲王留在北京。不过，能留多久呢？

在9月21日决胜八里桥至10月5日出师北京，两周时间业已过去。的确，这一期间，联军将领们正好充分用来调兵遣将，扩充给养；但是，这使随后的事态有所迟误。

八里桥获胜后，格兰特本该乘清兵士气低落，下令追击，强行进军北京，他是否显得过于谨慎，以至谨慎得有罪？如此行动救得了人质的命吗？他身边一个年轻军官这样问道。因对司令官等待时机的做法灰心失望，他曾希望两位副手拿皮耳和米启尔少将能取代格兰特将军任英军主帅。

海军上尉巴吕当时也认为，直接向北京挺进，比外交行动更为有效。对进军暂停和将帅们过于审慎，葛罗男爵最先表示遗憾。10月3日在八里桥营地致函图韦奈尔外交大臣，他这样写道：

“若弹药像期待的那样明天运到，那我们就可向北京进发。我们已经不得不多次对中国政府假意示好，以掩饰我们的无能为力。如果9月21日，僧格林沁败走的第二天，我们能从我写信的营地继续挺进北京，一切早就在今日完成了。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北京将变成一座空城，而最害怕被扣在京城的人质惨遭不测。”

和葛罗一样，英法联军上下，无不对人质的命运忧心忡忡。

至于中国首都北京在望，英法官兵欣喜若狂的表现，一些随军纪实作者曾有生动的描写。

法军主帅蒙托邦惊叹地写道：“北京这座都市，以其高大的城墙和方正的城楼，首次映入我们的眼帘。大家离那儿不过2000米而已。激动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辞表达的，我初见这座城池的心情便是如此。儿时，我把它归结到无数童话之中，今天它却全然真实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埃里松初次看见北京的城墙，就大发诗兴地赞道：“北京，神奇而广袤之城！北京，在我们欧洲人的梦里是何其遥远，当说起要到遥远的北京去，就仿佛说要去月球一样。”

凯鲁莱不只是感叹，更庆幸是时势把他们带到中华帝国京城门前。他说道：“每个人都把这个令人神往之都的建筑名胜一一指给人看。从前，没有几个欧洲人深入到这座城

里。北京啊！北京！一见这座陌生而宏伟的京城，每个人都从心底里发出这一惊叫声。直至此时，它的城墙是蛮夷之辈不可侵犯的，而且也从未被蛮夷之辈侵犯过。远离亲爱的祖国8个月来，我们早就形成一个信念——要迈着胜利的步伐开进北京城。这种信念在我们心中已根深蒂固，而且何其强烈，谁都没想打算在天津签约就算完结。不去北京，简直是不可想像！”

所有随军纪实作者都记叙他们首次发现北京的激动心情，但也都找不出合适的辞藻来描写他们对这座浩大城市的印象；尤其是城墙与城楼和房屋以及奇特的大建筑物融于一体的壮观视野，他们更难作恰如其分的比喻。

如阿尔芒医生在描绘那些四角形建筑物时，就把它们比作巴黎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眺望“那落日霞光映照下的广阔绚丽景象”，他的眼中只有一个舞台布景，“它简直就是剧场里由豪华的图版和装饰作为古尼尼夫或巴比伦的场景来展现的最神奇的画面”。

巴赞库尔男爵则对北京城有着更细腻的描绘：“首先，大家的目光环视着那长长的城墙，及各道城门上站立的卫兵队。近处可见那座人造山丘和山上的五大亭台。稍远之处便是皇宫，中间耸立着风格独特的白塔，周围环绕着各式风格的建筑，黄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闪耀。可以看到满汉城区的分界线，有皇宫区、军营区、居民区及商业区等。”

内格罗尼中尉也想妙笔生辉，写道：“这座浩瀚广袤的皇城，神秘神圣的天子之城，首次让欧洲人尽收眼底，使他们惊叹不已。”他欣赏着“这座华丽的巴比伦里仅有的几座高度超过城墙的大型建筑。而在京城中央，可见那座巍峨的人工山丘，上有亭台，俯视着皇城、满人城和汉民城三位一体的大都会”。